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23



2022/6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二年六月（总第三十六期第六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一、参考主题

- (一)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 统一战线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五) 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 (六)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研究述评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作者向我刊投稿，视为同意将文稿的汇编权、发行权、翻译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我刊。

三、基本要求

对符合如下基本要求的稿件，我刊优先审稿，审稿通过后优先刊用。

(一) 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鲜明体现大统战视角。

(二) 立题。问题提出部分要有精到、深入的文献综述，能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三) 结构。论证框架合理，论文一般应有一二级标题，结构有相当的系统性。各级标题能够明确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内在逻辑严密。行文善于运用主题句、观点句。

(四) 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文法规范，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引文差错(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和参考文献著录信息)；无逻辑错误；坚持学术化表达和学理化阐释。

(五) 体例。论文须包含规范的题目、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著录及作者有关信息。参照《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和我刊已出版论文体例进行撰写和排版。

(六) 篇幅。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宏富，优秀论文不限篇幅。

(七) 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不高于15%。请作者慎重投稿：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八) 审稿周期。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欢迎作者通过投稿邮箱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咨询有关情况。联系电话：(023) 62874725。

(九) 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 关于我刊。微信公众号：tyzxyjy，全刊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 年第 6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华正学
齐鹏飞 严安林 李春玲 李 捷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建 张 峰 陈先才 陈奕平
范柏乃 罗振建 罗来军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郭朝先 袁 征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36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6 卷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 徐理响 胡文婷
- 12 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 / 吕 鹏 毕斯鹏
- 2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 许忠明
- 33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视角 / 徐光木
- 45 融合发展：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
/ 王浩宇 罗 卓
- 5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 陈 纪 曾泓凯
- 67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 贺鹏皓 宋 煜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81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 陈桂清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 94 民进党打“宗教牌”谋“独”的动向、原因及影响 / 韩 冰
- 105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 于 镭 于飞洋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 116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 / 刘林波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129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 / 龚静阳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147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 / 徐瑞珂

- 163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总目次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2 No.6(Sum No.36) Vol.6

- 01 An Analysis of Unity Politics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United Front Perspective XU Lixiang&HU Wenting
- 12 The Solidarity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in Meta-Universe Era
LV Peng&BI Sipeng
- 22 The Cultural Mechanis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arxism Activates Chinese Civilization XU Zhongming
- 33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wi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XU Guangmu
- 45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Haoyu&LUO Zhuo
- 57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Construction of All Nationalities CHEN Ji&ZENG Hongkai
- 67 Historical Evolution, Pres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Special Auditor System
HE Penghao&SONG Yu
- 81 The Party 's Overall Strategy to Solve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New Era: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Core Connotation
CHEN Guiqing
- 94 The DPP's Trend, Reason and Influence of Playing "Religious Card" for "Independence" HAN Bing
- 105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ustralia's Taiwan Strai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YU Lei&Yu Feiyang
- 116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Hong Kong '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LIU Linbo
- 129 The Construction of United Front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merican and Western
Stigmatization of China: Combing and Responding GONG Jingyang
- 147 The Prospect of National Separatism in Northern Ireland in Post-Queen XU Ruike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徐理响 胡文婷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团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话语叙事与实践经验。作为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以及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通过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体系整合、过程吸纳、政策包容等机制，使团结落地为实践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治理成效，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形态。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础，以将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和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方式，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走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则易于不稳定”的时代之困。团结政治的重要性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伟任和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发展环境，团结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政治，要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处理好刚性与弹性、民主与团结、精英团结与大众团结的关系。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1

作者简介：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主任；胡文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22ZDA03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以安徽实践为例”（AHSKXZX2021D09）

引用格式：徐理响，胡文婷.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1-11.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政治；大团结大联合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2) 06-0001-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谈到现代化，人们不免提及盛行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发展问题的现代化理论。虽然西方语境中的现代化理论有推动第三世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初衷，但其对“现代”的界定、对现代化道路的设计等，都源自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2]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探索，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和方案的超越。基于这一认识，当前相关研究或基于比较视角，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及道路优势；或基于历史实践，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这些研究都试图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原创性理论^[3]。

进一步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并构建相应主体性原创性理论，需要注意挖掘中国实践形成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2] 7}对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团结联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团结可以增进合作，团结能够凝心聚力；团结可以化约分歧，团结能够促进稳定。中国共产党构建和领导的团结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经验，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重要密码，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重要视角。从团结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底色。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各个时期始终注重运用统一战线法宝，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凝聚最广泛的人民基础。由此，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团结政治的重要载体。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4]，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了多元包容的主体力量、创新资源，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鉴于这些实践经验，团结一直以来也是学界研究统一战线的主要视角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通过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敌人，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5]。在国家建设中，统一战线创造和促进了人民共和^[6]，起到了团结大众、整合社会、协调利益的作用，促进了国家的内在统一与团结^[7]。从国家治理来看，统一战线通过大团结大联合解决了政治上的“人心”和治理中的“力量”问题^[8]。新时代，面向强国目标，构建多维团结形态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使命^[9]。总体来看，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团结功能，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展“人民”的力量，动员最大范围的力量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10]。本文吸收既有研究成果，把团结视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种独特政治形态，对团结政治的理论意涵、生成逻辑、实践机制等方面进行探析。

一、现代化视域中团结政治的理论意涵

虽然人们对现代化充满着憧憬，但现代化的过程却远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总是充满繁荣和稳定。

从理想主义维度看,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人们赋予了现代化诸多美好的内涵, 设想“每个传统的社会都想要现代化, 而且每个传统的社会最后一定会现代化”^[11]。但从现实主义维度观测, 现代化却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12]。这种复杂性, 一方面表现在现代化是个系统的工程, 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 同时也包含着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变迁, 这对特定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对政治系统的压力。艾森斯塔德认为, 现代化中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与不同的新群体和阶层登上政治舞台有着必然的联系”^[13], “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 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 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 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13] 23}。从比较政治实践来看, 现代化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 不断提升的社会动员水平和社会分化程度, 在一些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往往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问题。亨廷顿就曾直观地描述了这种现象: 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 骚动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军事政变接二连三, 城市政治集团纷纷离异, 各种政党四分五裂, “笼罩在这里的景象, 不是政治的发展, 而是它的衰朽”^[14]。正因为此, 阿普特认为“现代化制造了严峻的政治问题”^[12], 亨廷顿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乱”^{[14] 34}。

对于如何化解现代化中社会分化和多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如何应对艰巨的现代化任务给国家治理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 学界作出了一些解答。艾森斯塔德认为, 关键的变量是“容纳变迁的制度的发展”^{[13] 43}, “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 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 换言之, 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題, 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13] 49}。亨廷顿同样强调: 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 当政治参与提高时, 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4] 60}。制度的包容性、复杂性实际上强调的是如何将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维度上, 中西方呈现出了巨大的实践差异和理论分野。

面对现代化中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和多元化, 西方国家根据其历史文化特点, 建构了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基于竞争型政治和权力分立制衡机制的现代政治体系。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化”、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都是对这种实践的形象描述。在西方政治发展逻辑中, “代议制民主政府是高度复杂的, 是发达的工业社会解决严重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合适手段”^{[12] 1}; “政治上平等组织之间的竞争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基础”, “权力应当被分化, 应当设计不同的制度来确保这种权力分化”^{[12] 21}。不过, 这种基于竞争型政治的多元化政治体系并不一定适合“后来者”^[15], 这已为亚非拉一些国家的实践情况所证明。随着二战后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政治不稳定问题的出现, 人们开始反思基于西方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所开出的药方“是否真的适应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治需要”^{[11] 116}。即便在当代西方国家, 无休止的政治竞争、频繁的权力掣肘所演绎的“否决政治”“极化政治”也引发了人们类似的思考。2021年1月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之时, 在演讲中多次强调超越党派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说: “需要的不仅是言语, 更要求民主中最难以捉摸的事物: 团结, 团结。”^[16]显然, 无论何种形态的民主政治, 其初衷都不是为了制造分歧与对抗, 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联合与团结, 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正如阿普特所言, “制

度必须体现团结、增长和发展的价值”^{[12] 24}。

不同于西方国家建立在政治竞争、权力分立制衡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联合、团结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词。正如有的研究指出的：“以‘分’彰显众意是西方政治的逻辑，以‘合’汇聚民心是中国政治的逻辑。”^[17] 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基于联合和团结的政治理念，通过包容性的制度与政策，调适国家与社会、政治权力与权利关系，构建多元政治主体间同心同向同行的合作型政治秩序。从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团结政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机制，是推进政治运行秩序化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探索形成了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以团结政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当然，从一般性来看，团结政治并不必然与竞争政治相对立。竞争政治同样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为目标。但相对而言，团结政治更致力于促进社会方方面面的联合而非分化、统一而非分裂、合作而非竞争、共识而非歧异。

二、团结政治的生成逻辑：统一战线如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综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团结话语既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如强调“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2] 49}；也融入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如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2] 34}。更直观地看，团结话语呈现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践中，如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团结政治的重要性缘于中国式现代化之“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的巨大，不仅表现为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现代化的压力，更表现为多元的人口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人口越多、社会结构越复杂，现代化的任务就越艰巨、风险挑战就越大，团结的重要性就越凸显。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政治的战略性和枢纽性机制，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 13}。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1]，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成为党的奋斗目标。与很多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民族危机。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8]。“内忧外患”“一盘散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面对破碎的政治格局、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起构建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历史使命是伟大而又艰巨的，因为这一使命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在国内外高度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氛围中，在强制资源高度积累集中、而民主资源极度稀缺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由于中国革命的阻力异常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尚为弱小，必须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此，党

的统一战线思想应运而生, 党的团结政治也就此开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通过统一战线, 团结、联合和动员各方面的民主革命力量, 组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 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也正是通过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1949年9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得以召开, 并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同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所强调的: “这次会议, 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19] 在联合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开展革命的进程中, 统一战线所塑造和推进的团结政治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展现无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但起点的贫乏、目标的远大、任务的艰巨、阻力的巨大, 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独特性。考察1949年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定要注意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目标系统与党为实现社会发展所能利用的现实物质要素系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20]。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团结的意义在于壮大革命的力量,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团结的基本意涵则在于汇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 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 必须要“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 各民主阶级,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 广大华侨, 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 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21]。这其中就包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在党看来, 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国内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尚未肃清, 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 必须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 也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 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21] 146-147}。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重大课题。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答案: “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 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22]。在其后党的八大开幕词中, 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 “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 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必须认真地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23]

改革开放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由此,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也成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24]。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统一战线的对象随之拓展。1979年,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强调: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24] 52}1990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指出: “发展统一战线, 必须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团结。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 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 哪一个党派、集团, 哪一个人, 我们都要团结。”^[25]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26]。于是，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开始纳入到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空前广泛。统一战线团结政治功能的发挥，需要提升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的包容性，但关键还在于协调和处理好这些多元主体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即“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27]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目标和内容。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统一战线的团结政治意义愈加明显。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总结的：“我们的事业越发展，我们就越要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优势越得到发挥，团结的人越多，我们的力量就越强大，我们的事业就越能更好地向前发展。”^[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29]他指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30]。

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不仅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还在于广泛凝聚共识，为现代化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史，实质同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相一致。”^[10]总体来看：为什么需要团结政治？大国大党的国情党情民情、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艰巨，决定了团结政治的内在需求。何以能够生成团结政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构建团结政治的初心使命和胸怀。怎样才能推进团结政治？在于将统一战线精神原则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构建团结政治的实践机制。

三、团结政治的实践机制：统一战线何以构建大团结大联合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3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统一战线作为团结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为团结政治的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构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政治格局。作为一种不同于竞争政治的政治发展观，团结政治的有序运转、团结目标的有效实现，也有赖于统一战线所构建的一系列制度机制。

第一，政治领导机制：固守“圆心”画出最大“同心圆”。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不能理解中国式团结政治。从比较政治看，团结政治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呈现不同的面相。它既可能是多元政治力量妥协和均势的结果，也可能是建立在“中心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整合过程。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当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多党联合政府就是前者的典型例证。当代中国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显然不是西方的多党联合政府、联盟政治。在长期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

中的一个问题”^[32]。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实现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中,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权力”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整合。只不过这个“中心权力”在西方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体现为伴随着民族国家兴起所建构和强化的国家主权:按照韦伯的界定,就是在一片固定的疆域内垄断了正当强制性权力的政治组织^[33];按照托马斯·埃特曼的理解,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34]。由于“建构起有核心的民众与民族的凝聚结构和联合团结的体系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议题”^{[7] 364},中国的现代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个中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18] 65}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构建了基于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正是固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圆心”,使得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行稳致远。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与团结政治包容的“多样性”并不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5]也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1]。政治领导机制构筑了圆心坚实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第二,价值引领机制:凝聚政治共识。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对基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基本政治议题形成的相对一致的立场。一个政治共同体若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重则可能导致制度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危机,轻则可能出现“政治极化”问题。利普哈特认为:“除非共识民主能得到一种寻求共识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否则它不可能扎下根来并茁壮成长。”^[36]凝心聚力、增进共识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本功效。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论述中,“思想政治引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寻求最大公约数”“广泛凝聚共识”等是最为常见的话语。团结政治中团结的重点就是这些具有“多样性”的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重要特征也是“多样性”。显然,要将这些利益、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力量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如果不能凝聚基本的共识,党的“团结带领”目标恐怕很难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尊重多样性,更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通过思想政治引领推进“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以及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加强思想引领,凝聚政治共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等,都凸显了这一价值引领机制。价值引领机制构筑了认同巩固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化了认同基础。

第三,体系整合机制:构建包容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其核心是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发展^[37]。综观中外,如何将不同地域、族群、阶层、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们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最为基础性的政治工程。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38]他认为:“凡能包含较多因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38] 67}

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大体证明了这一论点：“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性原则的政治机构”^{[14] 9}；“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其中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39]。团结政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一个更具广泛代表性包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将多元社会政治力量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整合进国家政治生活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就能很好理解 1950 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非党人士要有职有权”“有组织比没有组织更好”^{[32] 172}的论断。在当代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一方面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来自一线的基层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的数量又作了保障性规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作了详细的安排。通过这一系列中国特色“安排”机制，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代表性、包容性。体系整合机制构筑了认同巩固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制度基础。

第四，过程吸纳机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的过程，按政治系统论的观点，即为“输入—输出”的过程。在政治过程中充分吸纳、整合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推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当然内涵，也是推进团结政治的应然路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为社会各界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形式共商国是、凝聚共识提供了制度保障。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至 2021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党和国家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与党外人士召开协商会、座谈会等达 178 次。自 2016 年起，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 8 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为期 5 年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共有 3.6 万余人次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向对口省区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 2 400 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 80 余份。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战略实施，提出意见建议 800 余件，一批重要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决策^[40]。这些无不展现了统一战线在政治过程中所具有的政治吸纳、政策整合功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使团结政治运转起来的重要机制。过程吸纳机制构筑了有序参与的团结政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畅通了民主渠道。

第五，政策包容机制：包容性经济社会政策。包容性公共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社会团结具有直接的意义。观以诸多亚非拉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不公平、非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包容机制一方面体现为调适性包容，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重视社会上出现的新群体，并将他们适时纳入统一战线工作中^{[35] 561}。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就鲜明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这种适应性、包容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包容机制另一方面体现为公平性包容，即保障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中的多元群体享受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权利，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在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以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和“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都直观呈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包容性经济社会政策功能。统一战线构建的政策包容机制，对于夯实团结政治的经济社会

徐理响, 胡文婷.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11.

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团结不断增进而非社会不断分化的现代化。政策包容机制构筑了共有共享的团结政治,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社会基础。

四、结语

以统一战线为重要载体的中国特色团结政治的构建, 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和重要优势。它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础, 以将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和力量凝聚在党的周围为方式, 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所构建的团结政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动员更具团结效能,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治整合更具团结特色, 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走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易于导致不稳定”的时代之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面对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团结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为凸显。

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赋予统一战线新的使命任务。不同于政治斗争、政治统治等刚性政治活动, 团结政治更多呈现包容性治理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政治, 要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特色优势。一是处理好刚性与弹性的关系。刚性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当代中国团结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弹性则表现在制度的包容性、调适性上, 团结政治要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变化, 适应现代化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使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工作对象更具包容性。“刚性、稳定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 辅以合理的弹性空间, 也正为当代中国制度自信与制度生命力之所在。”^[41] 二是处理好民主与团结的关系。将社会多元主体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离不开充分发扬民主, 要把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只有更好地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才能更好地发挥各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而这也正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三是处理好精英团结与大众团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是党外人士, 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 但“党外代表人士安排的意义不在于个体意义, 而在于其所联系的特定组织与群体”^[42]。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与其所联系群体的关系, 进一步完善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机制,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统一战线进一步服务团结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3.
- [3] 邱水平.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原创性理论 [J] .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1）：5-8.
- [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 [5] 陈明明.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5-14.
- [6] 林尚立.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J] .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1-6.
- [7]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161.
- [8]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J] .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68-76.
- [9] 林华山，龚静阳，刘涪菡. 多维团结：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4）：12-25.
- [10] 李应瑞.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J] .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22-34.
- [11] 吴文程. 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比较政治理论的检视与批判 [M]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11.
- [12] 戴维·E. 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 [M] . 陈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
- [13] S.N. 艾森斯塔德.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M] . 张旅平，沈原，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
- [14]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
- [15]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M] . 陶骅，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
- [16]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speech transcript, annotated [EB/OL] . （2021-01-20） [2022-10-20]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nteractive/2021/01/20/biden-inauguration-speech>.
- [17] 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 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
- [19]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91.
- [20] 陈明明. 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 [M]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40.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8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43.
- [2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4 册 [G]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1.
-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8.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92.
- [27]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37.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40.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94.
-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4.

徐理响, 胡文婷.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 统一战线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11.

- [3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32]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09.
- [33]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钱永祥, 等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197.
- [34] 托马斯·埃特曼. 利维坦的诞生: 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 [M]. 郭台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78-379.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62.
- [36] 阿伦·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 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 [M]. 陈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06.
- [37] 燕继荣, 王江成. 政党驱动的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道路及经验 [J]. 北大政治学评论, 2021 (3): 77-95.
- [38]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89.
- [39] 德隆·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M]. 李增刚,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57.
- [40] 画出最大同心圆 携手共筑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综述 [N]. 人民日报, 2022-07-29 (3).
- [41] 徐理响. 构建包容性政治结构的经验——基于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结构功能分析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1): 117-124.
- [42] 徐理响, 周旭霞. 党外代表人士安排: 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代表性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6): 37-44.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

吕鹏 毕斯鹏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5)

摘 要: 元宇宙为人际互动、社会交往、国际交往、全人类交往拓展了新的场景。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来看, 元宇宙技术赋能国际关系的改善, 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普遍性、全球性、社会性联结。元宇宙时代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能够在化解原子化风险、丰富个体联结、强化国家交往、密切全球联结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微观层面, 元宇宙能够丰富个体生活场景、扩展互动机会、设置联合任务, 实现时空自由、属性自由和互动自由, 激发个体创造自主联结。在国家与社会层面, 元宇宙社会治理、元宇宙政府建设、元宇宙社会活力塑造、元宇宙国家形象营造、元宇宙中华文化体验等, 能够强化国家的元宇宙空间展示。在国际层面, 建设全球元宇宙公共场域、推动中西方文明互鉴交流、开展元宇宙民间外交工作, 有利于通过元宇宙跨国别体验、打造元宇宙文化产品增进全球人民交流。元宇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技术呈现, 能够全息、立体地展示社会主义的历史、当下和未来, 增强全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将显著增加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的双向联系,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迈向世界人民大团结。

关键词: 元宇宙; 统一战线; 国际统一战线; 数字统战; 世界人民大团结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6-0012-10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2

作者简介: 吕鹏, 中南大学教授、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 青年长江学者, 之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智能社会治理); 毕斯鹏,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技术应用背景下数字社会特征研究”(19ZDA143)、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项目“符号亲附、品味杂食与阶层流动: 青年微信朋友圈‘晒结婚’”(2021zzts0006)

引用格式: 吕鹏, 毕斯鹏. 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 12-21.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元宇宙元年)以来,元宇宙迅速地从美国IT产业界新闻演变成学术界大讨论,并拓展到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民族文化、科学普及等深度应用领域^[1]。随着2021年巴巴多斯等国家提出“元宇宙大使馆”,人们开始意识到,元宇宙是可以在国际交往、国际关系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新技术。在宏观方面,国际关系出现巨大不确定性,存在改善国际关系的重大需求。中美关系长期是全球稳定的“压舱石”,但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2],对华进行战略围堵。美国联合盟友,在全球场域对中国极限施压,对全球安全、人类命运都造成了系统性危害^[3]。全球都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切实改善国际关系、增进全球民众交流。在中观层面,人类进入“平台社会”,层级结构愈发扁平化,社会互动的真实场域被压缩。在社会生活各细分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算法、智能应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个体生活需求都可以被1至2家巨大的平台公司所满足^[4]。平台型社会已经形成,平台发挥着社会公共服务职能^[5]。在疫情期间,平台(如健康码、行程卡工具)甚至具备了“准政府”职能^[6]。在微观层面,个体存在属性发生变化,呈现孤立、独立、原子化倾向^[7]。个体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减少了对集体、网络、组织的依赖度^[8],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政治权威。这些现象也给各国内部、世界人民的联系与互动带来了新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9]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领域,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同时在个体、机构、国家等层面开展团结联合。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社会加强团结贡献了重要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9]。基于正向引导、合理运用,元宇宙能够有效防范原子化风险,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空间、平台和场域。面对国际社会加强团结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国际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和平发展环境的影响,应积极前瞻探索新技术的运用价值。元宇宙技术与生态能够有效解决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个体、国家和国际联结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实践国际统一战线的新形态、新模式。

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合作共赢是我国国际统一战线的核心要素和本质诉求^[10]。元宇宙技术能够为“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诉求和方向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生态支持、用户支持、评估支撑。国内学界已有元宇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论及元宇宙对国际传播的影响^[11]。有研究指出,在元宇宙以无界传播为终点将社会推延至远方的过程中,国家、社会正以一种自下而上、去中心化、泛传播的虚拟世界主义模式连接起来,逐步消弭符号与意义、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带来全球同质化的“跨域共同体”与世界去中心化的“自治共同体”^[12]。笔者相关研究认为,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精神文化产品,是元宇宙新技术赋能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机制创新^[13]。相关研究尚未对元宇宙技术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次影响团结的机理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尚未深入对元宇宙如何赋能国际统一战线进行讨论。鉴于此,本文对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

结机理与实践图景进行探析。

二、个体层面的国际统一战线：激发个体创造自主联结

丰富个体联结，能够为元宇宙技术赋能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奠定微观基础。对任何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过程而言，个体是基本元素，也是施加社会影响、产生预期结果的着力点。从丰富社会联结、促进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其核心是增加个体互动与联系、克服原子化风险，对此元宇宙技术可以起到赋能作用。

（一）个体原子化风险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长期以来从事社会性、群体性生活^[14]。但在当前社会，个体原子化的风险日益增加。所谓个体原子化，是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变得疏远、疏离，个体自身的独立性、自我性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元宇宙时代个体原子化的风险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元宇宙引发个体纠纷。元宇宙这一平行世界虽然与现实物理世界有所不同，但人与人交往的底层逻辑是大致不变、总体稳定的，依然存在合作、竞争、冲突等社会互动类型。个体在进行元宇宙活动时，由于利益关系和情绪因素可能导致元宇宙空间的谩骂、斗殴等个体纠纷依然存在，只是变现形式和物理伤害与现实世界不同。二是元宇宙引发家庭伦理问题。由于元宇宙给予个体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极大的自由，个体之间的交往形式更加多变，甚至会大量存在个体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身份差异，进一步带来元宇宙世界角色的同性别、跨性别、跨年龄的婚恋问题。以下因素将放大个体原子化风险。

其一，流动性的加剧。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流动性逐渐加速，使得原子化不断强化。第一，时空流动导致原子化。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流动性甚至可以突破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人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急剧扩大，使得人们相遇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巨大的流动性导致人们对物理居住地的归属感减少，对故乡的眷恋减少，物理空间邻里属性的关联度降低。第二，社会身份流动导致原子化。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个体的身份、角色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社会身份愈发有可能与父辈们相左，对社群的信仰和习俗的传承不再是确定、必然的。第三，归属感降低带来个体原子化。在现代社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份工作（行业）到另一份工作（行业），人们可以自由加入、退出不同的社群与场域，导致相对稳固的归属感较难形成。

其二，新技术的兴起。个体原子化是相对于真实物理社会而言的。传统的村落、聚落、邻里、社区互动的减少，是个体原子化的主要表现。在技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个体的主要生活需求、知识需求、交往需求、资金需求，都可以通过京东、知乎、微信、支付宝等网络平台公司解决。这就使得个体势必减少和真实个体的线下互动，导致原子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跨时间、跨地区的社会交往导致物理上的个体原子化风险。在元宇宙时代，这种趋势仍然会加强。元宇宙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极大促进团结的可能，也有加剧原子化的风险。元宇宙个体不仅有物理上的原子化风险，还存在精神层面的原子化风险的可能^[15]。元宇宙的核心特征是在个体物质生活之外，创造独立的精神生活场域，个体的生理、心理、性格、互动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体原子化倾向愈发明显^[16]。

（二）元宇宙如何化解原子化风险

我国已经具备发展元宇宙产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物质层面, 我国是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GDP 居世界第二。物质条件成熟后, 精神文化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化解原子化风险, 核心是增强个体联系与互动。在此方面, 元宇宙能够通过丰富生活场景、扩展互动机会以及设置联合任务, 强化个人联系、集体行动能力, 走向社会团结^[17]。元宇宙化解原子化风险的主要做法如下。

其一, 丰富个体生活场景。这是通过个体生活化场景设计, 增强个体的生活化联系。例如在“元宇宙家庭场景”中, 客厅、卧室、健身房、影音厅等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设计, 可以重现逝去的历史元素, 回味温馨的感觉。通过构建“元宇宙邻里生活场景”, 过去的生活场景可以再现, 个体可以沉浸式体验前辈人的生活。元宇宙重现生活方式、基础设施, 将勾起儿时的回忆。在“元宇宙社交场景”中, 个体可以在办公环境、用户化身、内容展示、形象展示等方面自主创作或定制, 完成更加丰富的在线社交行为, 产生广泛的个体化联系。

其二, 扩展个体互动机会。元宇宙空间有大量、海量玩家。个体不仅可与本国人交流, 还可以借助智能技术与外国人交流, 即与海量国内外玩家、NPC 玩家等进行互动。个体不仅可与虚拟形象背后的人类交流, 还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交流。当然, 现有技术下的机器人尚未完全达到人类行为所拥有的复杂性、非线性、智能化, 元宇宙玩家虽然可以与机器人交流, 但与真实玩家互动仍然更为灵活有趣^[18]。在元宇宙社会, 玩家之间可以产生大量的互动过程。这促使个体放下手机, 进行群体互动, 解决了当前社会个体原子化问题。元宇宙个体的社会关系具有两方面意义: 实现个体生命互动和生命互换, 以及在物理世界无法完成的更深刻的个体互动体验^[18]。

其三, 设置玩家联合任务。通过元宇宙剧本、内容、角色设计来设置联合任务, 降低个体原子化风险, 团结合作能够得到更好实现。通过一系列剧本角色设计来设置联合任务, 提供公共精神文化产品, 能够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联系, 实现个体属性状态的自由切换和选择, 更好地参与群体互动。比如, 自由定义元宇宙身份(性别、外貌、阶层、角色、任务等), 可以提高各国人民精神层面的团结感、群体感和满足感。再如, 通过设置联合任务, 个体可以体验在别国元宇宙的工作经历。外国人可以在“元宇宙中国”做任务, 中国人也可以在美、英、日等国的元宇宙世界做联合任务, 促进具有不同思想、文化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联系, 降低原子化风险。

（三）元宇宙激发个体自主联结

元宇宙在技术层面可以化解原子化风险, 在更高层面实现个体的多维度的自由与解放, 加快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其一, 实现个体时空自由。个体是社会的原子化细胞, 个体自由是社会活力的来源。通过剧本设计, 元宇宙可以实现个体活动时间和空间的极大扩展^[19]。个体可以穿越过去和未来, 或者定格某一瞬间、时间序列, 以突破生物时间的限制; 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场景中自由活动, 形成包括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孪生社会、未来社会的全息时代。通过时间扩展, 玩家可以跨越物理时空障碍, 沉浸式地体验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基于元宇宙统一战线, 人们能够实现全国人民“时间共同体”式大团结。元宇宙能够显著增强“人民大团结”理念在微观个体层面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在空间方面, 元宇宙实现了极大的扩展。个体可以在“元宇宙中国”“元宇

宙地球”“元宇宙月球”“元宇宙火星”等空间中进行探索、体验与劳动^[20]。这可以激发全世界人民探索宇宙、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热情与氛围，培育“空间共同体”价值追求与共同信仰。

其二，实现个体属性自由。在物理世界中，个体的生物属性是相对固定的，如民族、性别、相貌等。但在元宇宙中，个体的生物属性可以自由切换，体验不同个体属性的生命周期历程。个体可以在男人和女人、老人与小孩、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体型的属性中自由切换，体验物理世界中无法体验的属性感觉，增进人民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理解和认同。甚至更进一步，就如电影《阿凡达》中的场景一样，人们可以从一个物种转化为另一个物种，体验地球生命的丰富多彩，形成世界生命互联的格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友爱。由此，世界人民可以团结为各类公益团体，如素食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低碳主义者等各类团体^[20]。个体还可以体验从生命体转化为非生命体，如一滴水、一粒沙、一片云、一辆汽车等，在生命周期之内完成各自的既定任务，体验不同“存在”的生命周期历程^[20]。这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其三，促进个体互动自由。在真实物理世界中，个体在性格、阶层、角色、任务、进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隔阂，个体与个体的互动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元宇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此问题，形成非依赖性行为，在情感、利益、地位等社会关系上实现“互动自由”。一是“语言互动自由”。在现实世界，不同地域者拥有不同的语言、方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存在语言障碍。元宇宙通过人工智能实时翻译，将解除这一交流限制。二是“角色互动自由”。在现实世界，个体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元宇宙个体可以按照主观意愿选择角色进行互动。三是“群体互动自由”。现实世界由于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群体聚集的数量规模会受到限制。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围绕某一事件进行互动，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消耗资源等问题。而在元宇宙，聚集的数量规模几乎可以无限大，而且个体互动不存在物理安全风险。

三、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国际统一战线：强化元宇宙空间治理

基于社会有机体视角，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21]。元宇宙解决社会原子化问题，对世界各国都适用。就各国内部而言，通过元宇宙技术强化国内社会有机体联系，是做好国际交流的基础。我国应把握历史机遇，用好元宇宙统一战线工作创新载体，提升国内社会团结水平，加强国家和社会有机团结，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统一战线创造内部基础。强化国家与社会联结的元宇宙方案如下。

（一）元宇宙促进人类社会普遍关联

在现实世界，由于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军事等方面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各种社会关联无法达到全然和谐融洽。元宇宙是一个更为多元包容的世界，可以形成更为和谐的社会关联，实现社会关联自由。元宇宙社会关联包括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广泛联系。在元宇宙空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关联将会更加灵活自由，在共同规则体系内的个体可以随时开启或中断一个社会关联节点。群体与群体的社会关联也将产生更多合作关系和良性竞争关系。元宇宙所链接的资源比现实世界丰富，较少出现恶性竞争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以摒弃经济、

政治、文化偏见，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普遍关联。

（二）元宇宙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

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确保元宇宙空间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平衡活力与秩序^[20]。在活力方面，需要激发元宇宙社会的参与活力、参与热情；在秩序的维度，需要加强公共权力的介入与治理。社会治理核心是对人心的治理，即对人的内在意识、精神世界进行关怀。元宇宙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元宇宙公共利益最大化。元宇宙社会治理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应发挥元宇宙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不断激发人民维护元宇宙社会生态的热情，促进元宇宙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推广至全球元宇宙，可以发挥各国人民的智慧，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全球元宇宙生态环境，让世界各国人民在元宇宙实现民心相通、相互熟络，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精神世界、情感表达、信仰自由，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

（三）强化元宇宙报酬制度确保个体活力

元宇宙社会治理面向社会有机体，是元宇宙群众参与的维护元宇宙存在和发展的公共事务。在元宇宙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将通过剧本内容设计、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得到更好满足。个体在元宇宙世界的劳动，亦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个体在元宇宙通过持续劳动创造财富（积分），能够体现生命价值、实践生命意义，进而融入元宇宙群体、组织、社会和国家，增进全球人际联系。个体在元宇宙中能够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品质能力去寻求契合个体属性的工作机会。在元宇宙劳动报酬体系方面，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元宇宙财富积累与分配。元宇宙中的每一次劳动，都将被赋予唯一、可追溯的积分。应坚持公平正义的元宇宙报酬规则，体现劳动和报酬的正相关^[20]。区块链货币能够真实记录个体的工作与努力，并直接兑换。通过强化个体劳动报酬，元宇宙将实现劳动者的“生命财富自由”。

（四）建设元宇宙政府维护系统秩序

在“数字政府”之后，人类社会还将进入“元宇宙政府”建设阶段。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启动计划，将元宇宙空间管理起来，行使政府职能。在国际社会，“元宇宙政府”将拉近国家之间的距离，提高国际交往效率，有助于中美、中俄、中欧等重大国际关系和谐。元宇宙政府从事元宇宙空间的管理工作，同时具有国家职能。一是元宇宙管理职能，即通过元宇宙技术，将元宇宙玩家的个体身份信息、行为轨迹进行确认、确权。二是元宇宙外交，即在民间外交方面，对外国玩家进行服务、管理工作，协助其以最大的效率实现与国内玩家的交流、匹配、协作；在正式外交方面，与外国的元宇宙政府进行积极对接，共同就两国关心的问题协商、磋商、达成协议。这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具有重要、迫切的实践价值。

（五）建设“元宇宙中国”提升国家形象

尽管全球每年存在大规模的跨国、跨境旅游，但出国（境）人口仍然占很低的比例，绝大多数民众仍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世界和其他国家。各国民众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媒体环境影响，对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片面认知现象。对各国而言，元宇宙政府有助于国家形象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我国同样可以基于元宇宙呈现真实、立体、生动的国家形象：通过“元宇宙中国”，将中国文化、中国特色、中国精神等呈现给全世界；将热爱和平、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气质，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让各国人民沉浸式体验中国自然风光、人文气质、精神追求、美好品质，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带有

偏见的观念，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其核心诉求是通过展示新中国改革、发展成果，真实地呈现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内在优势。

（六）元宇宙全面深化中华文化体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基于元宇宙技术，各国人民可以全过程、全息体验中华文化。一是体验历史文化，例如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和中国各历史朝代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自由选择 and 体验。二是体验中国古代发明与科技。外国人可以体验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的发展过程，领略中国古代的科技魅力。三是体验中国古代人文，如体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唐代以来的“四艺”（琴棋书画）。四是体验中国生活用品文化。外国人通过体验汉服，可了解其服饰属性、基本特点、基本形制和组成结构，了解不同服饰结构、纹饰配件和形制类型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五是体验中华礼仪文化。如通过元宇宙技术，将中国礼仪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使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拥有更生动、更形象、更全面的体验，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全球传播。

四、国际层面的国际统一战线：迈向世界人民大团结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如何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共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关键课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22]。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具有迫切需求。元宇宙技术能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技术路线、实践支撑。

（一）建设全球元宇宙公共活动场域

公共活动场所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由相对独立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建设元宇宙空间的世界人民公共活动场所，能够显著增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在元宇宙公共活动场域，个体可以进行精神文化生活、体验享受型消费活动，同时在真实物理社会进行生存型消费活动。此外，个体具有多重身份属性、工作属性、实践属性，更好进行跨国、跨地区、跨文化、跨语种交流。全球元宇宙市民社会，不能脱离各国公共权力的管理，否则会导致元宇宙分配不公、资源垄断问题。因此，元宇宙公共活动场所与元宇宙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依存的关系。在此框架下，“元宇宙全球市民”可进行自由活动，各国公民互动变得密切，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

（二）元宇宙技术助推中西文明互鉴

运用元宇宙技术，不仅要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特色，同时也要推动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文明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基础，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目前，西方有关势力存在试图使用“文明冲突论”维系全球霸权的企图。文明互鉴有利于破解“文明冲突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元宇宙提供了绝佳平台，有利于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足不出户就可以进入中国文明中进行沉浸式体验，形成立体、完整的中国印象。这突破了国家界限、地域界限、语言界限，让抨击中国文明、中华文化的言论无立足之地。可见，元宇宙方案能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度，形成世界多

样性文明交流互鉴的良好格局。

（三）开展全球元宇宙民间外交工作

国家之间的交往应该具有多层次性，体现在公民、组织、政治等层面。作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创举，民间外交具有人民性^[23]，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民间外交的主体是中国公民，宗旨是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大团结、大合作，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元宇宙时代，民间外交工作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合作、互动。元宇宙民间外交工作，首先需要建立元宇宙空间的民间外交组织并举办活动。在操作方面，“元宇宙政府”审批同意成立“元宇宙民间外交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与他国“元宇宙民间外交组织”进行访问、交流、讨论、互动。在元宇宙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民间外交大使”，这增加了国家形象的丰富性、故事性、微观性。元宇宙民间外交实现民心相通，将有力促进世界人民大团结早日实现。

（四）基于元宇宙空间开展跨国别体验

国别或国籍是个体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依据。在真实物理世界，个体同时拥有的国籍数量是有限的，变换国籍的比例是极少的（不少国家只承认一个国籍）。在元宇宙空间，个体可以进行多次、低成本国籍体验，弥补人生遗憾，提升生命过程价值。通过加载特定的国家制度、政治传统、理念文化，个体可以深刻理解做一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外国人在元宇宙体验中国，了解中国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将感受到强烈的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此项举措将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国家、公民的全息认识，更加客观、友善地看待中国。

（五）元宇宙战争体验与世界和平模拟

目前，美国和北约等频繁挑起世界纷争，激化全球安全形势。与之相反，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我们需要通过理念教育，在全世界广泛联合，提升全世界珍惜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认知，而采用元宇宙形式是最佳的选项之一。在元宇宙开展“世界大战”全息战争模拟，能够使各国人民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比如，可重点以“二战”为背景，选择轴心国、同盟国和中立国中的角色（将军、士兵、秘书、随从、医生等）。在地域方面，可选择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北非战场等。在剧本方面，可使用德国闪电战、敦刻尔克大撤退、日本偷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等。通过沉浸式体验、角色扮演，全世界人民将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争的残酷性，成为珍惜和平、反对战争的全球正义力量。

（六）全息立体呈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当前西方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重重^[24]，内部不断爆发危机，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美西方有关国家不仅不反思自身，反而长期敌视共产主义理念，持续对中国发展、中国形象进行抹黑、打压。我国在国际舆论战场仍相对缺乏有力的理论、宣传抓手，这种局面将在元宇宙时代迎来转机。通过元宇宙技术，我国可以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全息、立体呈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国既要反击无端的抹黑，又要促进全世界从意识形态对抗中走出来，反对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基于元宇宙体验，全球人民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元宇宙阶层”人士将转化为促进人类公平正义的力量，成为全球元宇宙社会的民心基础、和平基础。

五、结语

马克思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这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元宇宙技术能够基于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25],实现全世界“自由人联合体”目标。依托元宇宙技术,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力将得到重新整合。“自由人联合体”内涵丰富,在伦理层面是人性的解放,在经济层面是摆脱货币的束缚,在政治层面是摆脱压迫和剥削^[26]。在元宇宙时代,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多了新的理念、技术和路径。元宇宙扬弃劳动的异化,消灭人与人的对立,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彰显“本真的人”,有利于实现人的全方位的自由、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根本上是指人的劳动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的充分发展。对此,元宇宙能够提供丰富的实现技术和实践场景。基于实现全面发展与社会生活条件紧密相连,元宇宙可以保障丰富、和谐、充分的社会生活条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自由选择劳动,不受压迫和剥削。同时,人们又能以自由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按照自身合理的计划自觉联合起来从事劳动,实现不受剥削的自由的劳动。元宇宙自由人联合体为走向世界人民大团结创造了重要条件。

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是争取发展环境、促进国际友好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基于元宇宙模式的国际统一战线,将是一种创新。强化个体、国家、国际联结的元宇宙方案,将显著促进政府、社会、民间之间的联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要优化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服务讲好中国故事,服务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元宇宙技术赋予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极大的场景丰富性、主观感受性、过程动态性。在个体层面,元宇宙通过丰富生活场景、扩展互动机会、设置联合任务等实践路径化解个体原子化风险,实现个体时空自由、属性自由和互动自由,激发个体创造自主联结。在国家层面,通过元宇宙政府建设、元宇宙社会治理工作、强化社会劳动报酬、促进社会关联自由、促进中华文化体验和加强中西文明互鉴等密切国家联结,推动国家建造有序联结。在国际层面,建设全球元宇宙公共活动场所、开展元宇宙民间外交工作、开展跨国别体验、引导西方社会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战争与和平模拟体验和元宇宙自由人联合体等实践模块,有利于世界人民大团结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赵星,乔利利,叶鹰.元宇宙研究与应用综述[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4):12-23+45.
- [2] 胡键.中美竞合关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何以可能?[J].国际观察,2022(1):54-75.
- [3] 史本叶,杨馥嘉.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与中国应对[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87-99.
- [4] 李韬,冯贺霞.平台经济的市场逻辑、价值逻辑与治理逻辑研究[J].电子政务,2022(3):66-76.
- [5] 杨芳勇,张晓霞.平台型社会组织模糊综合评估体系的构建与验证[J].社会工作,2019(3):87-98+112.
- [6] 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J].法学研究,2021(4):149-170.

- 吕鹏, 毕斯鹏. 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21.
- [7] 李南枢, 何荣山. 社会组织嵌入韧性乡村建设的逻辑与路径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2): 98-116.
- [8] 豆勇超. 泛娱乐主义的基本症候、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130-136.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10] 门洪华, 李次园. 构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 [J]. 社会科学, 2021 (11): 3-16.
- [11] 张龙, 曹晔阳. 数据主权、数字基础设施与元宇宙: 平台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2 (6): 166-175.
- [12] 杨禧焱, 喻国明. 数字化“天下”版图: 元宇宙视阈下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J]. 对外传播, 2022 (4): 8-11.
- [13] 吕鹏, 毕斯鹏. 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机制与实践图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0-21.
- [14] 储昭华, 李文希. 在天人合一中诗意栖居——中国人的居住哲学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 (2): 108-111.
- [15] 张艳梅. 对现实的突破与想象重置——元宇宙时代的叙事拓展 [J]. 传媒观察, 2022 (6): 22-28.
- [16] 吕鹏. 元宇宙的潜在风险与治理原则 [J]. 国家治理, 2022 (2): 27-32.
- [17] 石英. 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J]. 人文杂志, 2022 (4): 1-14.
- [18] 吕鹏. 元宇宙技术与人类“数字永生” [J]. 人民论坛, 2022 (7): 21-25.
- [19] 陈云松, 郭未. 元宇宙的社会学议题: 平行社会的理论视野与实证向度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 (2): 138-146+243.
- [20] 吕鹏. 国家“元宇宙社会”治理前瞻性研究 [J]. 科学·经济·社会, 2022 (4): 1-12.
- [21] 田毅鹏, 吕方. 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 (5): 68-73.
- [22] 肖存良. 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关系再研究 [J]. 中共党史研究, 2021 (5): 103-111.
- [23] 于宏源. 多元化和网络化: 新时代民间外交发展研究 [J]. 国际关系研究, 2019 (5): 3-18+155.
- [24] 海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态势研究述要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 (3): 99-107+109.
- [25] 吕鹏. “元宇宙”技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J]. 产业经济评论, 2022 (1): 20-27.
-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2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许忠明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政党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353)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双向耦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以自强不息和脚踏实地为核心信念的中华文明的当代表现形式。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而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此洞若观火，敏锐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机制，以精神的力量、科学真理的力量、社会革命的力量、物质实践的力量走出了中华文明在近代徘徊不前的历史困境，全面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双向互动、深度融合，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升华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7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2) 06-0022-11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实现机制研究”(20BKS086)

作者简介：许忠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引用格式：许忠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 22-32.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明确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得到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双向耦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2]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3]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性:“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4]这些重要论述启发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存在互通互容互助互荣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活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还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联系在一起,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再次进行确认。“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6]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特质。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耦合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郭建宁、王炳林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融相通,在知行观、辩证法、大同理想等方面都有契合之处^[7]和内在契合性^[8]。王伟光等则对这种融通关系的实践方式和历史背景进行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合是通过“两个结合”来实现的,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之中^[9]。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达成的。他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只有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10]。傅凯华、唐洲雁

等侧重论证马克思主义“用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11]。辛鸣等侧重指出：中华文明从“精神力量”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12]。郑飞等认为，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而达成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13]。还有学者以“两个结合”为视角，着力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部机理。奚洁人把“两个创造”与“两个结合”联系起来，认为“两个结合”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奥秘^[14]。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不同场域内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要求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深层原因。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分析框架，尝试在大历史场景中揭示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场景、过程和结果，以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

二、激活场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全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理论，对中华民族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对任何专制制度都会猛烈开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起源于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理论，通过中国化和时代化成为指导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武器，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巨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发生于近代以来中国探寻现代化之路的历史背景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识启动了这一激活机制。

（一）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蒙尘的原因

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国家，历来受到西方重视。在明清之际，资本在欧洲快速发展，西方对华交流出现重要转折。清廷与罗马教廷分别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由此引发莱布尼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导致欧洲形成对中国的固化认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了“否定”。黑格尔把中华文明贬低为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声称“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的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自然的愚昧状态。一切属于精神性的东西，都离中国人很远”^[15]。随着 1792—1793 年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1816 年阿美士德勋爵访华、1834 年苏格兰海军军官内皮士（律劳卑）访华，西方殖民主义者借此把“华夷之辩”和“跪拜之礼”曲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掀起一场妖魔化中国的“伤害控诉”。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其特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偏见夸大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素，造成中西两种文明的严重隔阂和尖锐对立。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的际遇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切同情。鸦片战争后，中国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马克思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等，恩格斯写成《波斯和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等。马克思强烈谴责“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认为这是中国人受辱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援引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同鸦

片贸易比较起来, 奴隶贸易是仁慈的; 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 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 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 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之后, 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16]。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冲突的深层原因。西方列强把贸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政府不守诚信”, 但实际不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 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7] 他们还认为, 除了经济基础这个根本原因之外, 处于愚昧状态、持有“东方宿命论”、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天朝帝国”这个“半文明制度”^{[17] 622}, 即封建专制制度, 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他们认为: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 安于现状, 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 632}

(二) 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观察中国, 高度评价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世界经济一体化, 开放的市场一开始就要把全世界的资源和商品卷入其中。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决定着封建王朝的前现代性质。马克思把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世界的历史时刻视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 中国从此走向世界, 而世界因为中国的加入而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16] 779}。恩格斯预见中华文明在告别古老帝国后的再生, 认为中华文明将迎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6] 800}。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种理想社会, 并将社会革命视为构建理想社会的必然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欧洲革命、美国发展和俄国形势, 而且对中国革命寄予很高的希望。他们认为, 中国变局下的民族革命与欧洲的工人革命密切相关, 决定着共产主义革命的未来走向。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必须建立“兄弟联盟”^{[16] 313}。恩格斯认为压迫别的民族是一个“民族的污点”,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 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16] 314}。遵循这一思路, 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野中展开对中华文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认识。1853年5月, 马克思在对立统一规律下思考中国的作用, 认为“天朝帝国”是“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16] 778}。马克思认为, 中国革命将是超过俄国因素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中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决定因素, 中国的强大革命必将引发欧洲的财政危机和商业危机, 而这种危机恰恰是引发欧洲革命的导火索。马克思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视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他大胆预言: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 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 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 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6] 783}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 中国走向现代化具有世界性意义。

列宁在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中看待中国革命, 高度评价中华文明的作用。1900年, 列宁揭露沙俄充当“文明使者”侵略中国的面目: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18]。1905年, 列宁写下《旅顺口的陷落》一文, 评价俄国在旅顺口的投降“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 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1912年7月, 中华民国建立不久, 列宁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展望。他认为, 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蓬勃高涨, 能激发劳动群众, 使得中

国人民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获得解放。民主主义者要对中国劳动群众给予“最真挚的同情”，“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20]。民主主义一旦唤醒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革命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就会振兴中国^{[20] 295}。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内忧外患，俄国共产党更加认识到中国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作用。1920 年，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向东方民族提出了革命口号——“全世界无产者与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将中华民族纳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文明形态中，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科学指南。中华文明蕴含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正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具有能够不断适应环境、迎接内外挑战的历史主动精神。”^[21]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素来重视历史的教化作用，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历史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既蕴含中华民族的自我认知，又蕴藏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讲仁爱、重民本、求和谐，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这是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文化来源。虽然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曾经面临困境，但中华民族内在的历史自觉一次又一次唤醒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命脉从未中断，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从未消失，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诞生和成功的深厚土壤。

三、激活过程：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本机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马克思主义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照亮了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纽带在于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种文明的精神对接，以科学真理的吸引力量、社会革命的强大洪流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唤醒了在稳定系统中处于沉睡状态的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凤凰涅槃和时代升华。

（一）马克思主义以精神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的整体性危机从深处来说是一种文化的危机。正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2]中华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这种以宗法制度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在“成己”与“成物”的伦理实践中形成安于现状、安分守己、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道德化的人文主义，促成中华文明的成熟稳定形态，但也留下了整体竞争活力不足的痼疾。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高速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异质文明，以理性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显然处于以礼义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之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提供能够应对内外危机的现代化解决方案。“中国怎么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关键。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种文明的激活,首先是文化上的激活。文化作为文明的灵魂和根脉,不但直达文明的深处,而且引领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精神上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指导地位。从此,中国人民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有力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把精神力量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转化为激活中华文明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经过长期的繁荣后在近代进入一个下降期,在进入 19 世纪后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中华文明一度彷徨与徘徊,但在遇到马克思主义之后,二者立即发生了耦合和共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激活中华文明,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介达成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斗争精神很好对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两种精神一经相遇,中华文明的澎湃活力立即被激发。“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6] 16} 马克思主义的“闪电”一旦击中中华文明的“园地”,便激活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经验一再表明,外来文化内化为本土文化,会深入到社会群体的性格结构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牢牢锚定在中华文明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生理想和信念嵌入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二)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最为基础、最为根本的则是它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多次谈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思想”和“核心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对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和精神现象之间关系的精准把握。1883 年的德文版序言把此对关系以“基本思想”形式突出强调出来。“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16] 380} 1888 年的英文版序言以“核心的基本原理”的形式突出强调此对关系。“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16] 385}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一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文化尚未做到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伦理文化体系往往把“天”或“天道”作为世界本源和终极规律,从天道中导出君主一元化统治和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思维方式和阐述方式显然不是将政治统治和社会存在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思维方式桎梏了社会内部的

活力,不容易产生政治文化回应经济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虽然康有为等人通过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指出传统文化中存在“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3]的智慧,但这种“全变”论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进化论,没有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中。只有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才深刻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只有服从于这一规律才能获得自由。

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决定着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三大规律一经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很快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华文明开始焕然一新。

(三) 马克思主义以社会革命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革命与改良是清末民初不同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虽推翻了皇权专制,却无法消灭封建专制。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它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但没有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无力扭转中华民族近代不断衰落的历史趋势。究根溯源,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能唤起的有限革命力量,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无力唤起民众千千万万,无力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也表明,掌握革命的理论具有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伦理文化与封建专制统治互相耦合,士人依靠经学传统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垄断了君主之下的政治活动。政治与文化结成共同体,文化从思想上强化政治,政治又反过来从行动上支持文化,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化—政治—经济”秩序的实质是“儒家的文化设计”^[24]。“仁政”是“仁”与“政”的结合,“德政”是“德”与“政”的结合,二者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政治与文化的深度勾连。这种政治与文化勾连机制奠基于农耕社会基础之上,顽强主导着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属于同一种社会形态。近代以前的王朝轮替、治乱循环中,社会结构基本恒定不变,文化与权力高度结合,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的独特政治现象,出现了“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合一的士大夫政治”^[25]。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互相耦合并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成为“超稳定系统”,虽然有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却由于内部缺乏互动和外部缺乏应变力而长期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

封建专制制度遭遇历史性危机,造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困境。中华民族这种境遇一旦被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察,一场文化自救运动立即展开。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为具有民主与科学特质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文化观念上的接引。其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从唯物史观角度介绍和推崇马克思主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这种理论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革命,即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学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第二步,接受“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的变革方案;第三步,建立“强国精密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26],即中国共产党。

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存在合理性。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所处的“困迫不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联结果,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的无产阶级”。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

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众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了困迫不安的现象。”^{[26] 143-144}为此，中国人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受到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社会革命实现自身解放具有自然性。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节点一步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社会革命的行动方案。为达此目标，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社会革命为基本方式的救国救民方案被确定下来。社会革命广泛动员了处于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破解了中国高度一致的文化结构与权力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榫接”，改变了长期以来压迫人民群众的社会结构，全面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活力。

（四）马克思主义以伟大实践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

“激活”是一种双向互动，经历从“马克思主义唤醒中华文化”到“中华文化从觉醒到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再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双向互动结合”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激活中华文明，从客观上来说，是因为中华文明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主观上来说，深层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接受和主动接受。能够将主观与客观有机结合则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以其先锋队的自觉能动作用，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创造性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奥秘。在这些创造性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自觉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焕发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改变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不断衰落的历史命运。“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并举，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邃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从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维度唤醒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双重坐标中重构中华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激活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经过百年融通结合、双向互动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社会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逻辑，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包含着中华文明要素、社会主义要素和现代化要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明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现代化要素同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明交融共生、相得益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崭新选择。

（一）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保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创造。中华民族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历史自觉和伟大历史主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创造。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走不通、走不顺利，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事关人类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与西方现代化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基本问题、研究范式、概念命题、理论阐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全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社会出现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课题作出回答，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一社会形态有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支撑，有着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支撑，构筑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同心圆格局。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的成果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条件。

（二）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底色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精神标识，冲破了所谓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的两元划分，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垄断。中国式现代化既继承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一统文明形态，又有继往开来拥抱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无限活力。中华文化源于自然、反映人伦、注重情感，擅长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极化、对立思维明显不同。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知情意三者统一的伦理特性，与西方偏重理性的文化知识明显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之下的和谐稳定，推动形成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文化既有守正创新的思想伟力，又有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既有立己达人的大国担当，又有开放包容的精神理念。这种文明形态既追求大团结大联合的和谐状态，又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文化具有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文明底蕴，又有坚守公平正义的文明基线，还有容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张力，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激发出来，形成全民族守正创新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磅礴伟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走出了非升即降、非赢即输的竞争逻辑，摆脱了你赢我输、分裂动荡的极度焦虑，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执其两端、允执厥中、和平共处的智慧，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包容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

西方不能垄断现代化话语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日益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在国内形成了福利病、民粹主义、政党极化、社会撕裂等弊病，在国际上造成了信任赤字、民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一系列后患，严重波及国际社会团结稳定。西方现代社会中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自由观念，消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聚力，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对立，在现实中演变成族群对立、政党恶斗、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和否决政治等各种社会顽症。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二者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迥然不同。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视角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明确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团结合作思想，对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和而不同等理念，形成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蕴含鲜明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新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核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推动中华文明升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新文化以人民为本位，追求天下大同、美美与共，主张海纳百川、文明互鉴，注重和而不同、和生万物，超越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有力遏制了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现代病，有力地维护了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

五、结语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力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既有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未来的理想精神，又有中华民族穿越万年的文明底色；既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作为基础，又有中华民族坚守公平正义的道德支撑；既有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的鲜明品格，又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与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融通起来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力量根基在于立足中华文明并坚持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其时代价值在于创造以人民为中心而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3]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1（7）：4-17.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N]. 人民日报. 2022-05-29（1）.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1-11-17（1）.
- [7] 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相融相通 [N]. 人民日报, 2021-05-24（13）.

- [8] 王炳林.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12): 12-13.
- [9] 王伟光. 坚持理论创新, 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展现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N]. 光明日报, 2021-12-15 (8).
- [10]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 [N]. 光明日报, 2015-07-03 (1).
- [11] 傅凯华.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N]. 光明日报, 2021-11-25 (6).
- [12] 辛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逻辑 [N]. 光明日报, 2021-12-29 (11).
- [13] 郑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J]. 哲学研究, 2021 (12): 5-13+123.
- [14] 奚洁人.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之基 [J]. 中国领导科学, 2022 (4): 62-71.
- [15]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143.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02.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72.
- [18] 列宁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82.
- [19] 列宁全集: 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35.
- [20] 列宁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93.
- [21] 张志强.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4): 20-26+97-98.
- [22] 贺麟. 文化与人生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5.
- [23] 康有为政论集: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11.
- [24] 金耀基. 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65.
- [25] 杨国强. 士人政治: 科举制度下的权力与文化 [J]. 学术月刊, 2021 (11): 200-216.
- [26] 李大钊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7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徐光木

（湖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联系紧密，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方式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两者是主体和工具、手段和目标的关系，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些关系具体表现为：以民为本、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历史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互转互促；党的领导、为了人民、契合国情、紧密联系，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通约。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更加团结奋进、更加坚强有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033-12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2.06.004

作者简介：徐光木，湖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员会委员、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引用格式：徐光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33-44.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生在中国这一巨型规模国家、中国人民发挥巨大主观能动性的伟大变革，具有特定的主体和场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形成更具整体性的政治社会力量——中华民族，在国家建设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开展高度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伟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命题，内在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两个重要元素。为此，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命题，有必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进行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论述和谋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时，强调通过建设巩固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加强中国人民大团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 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联系紧密，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由中国人民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主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路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面对强起来进程中的内外风险与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自然而然地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文献主要沿着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内含各族人民共同走向现代化、实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总体脉络展开研究。有的研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于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共富^[3-4]。有的研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以现代化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载体^[5]，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6]。有的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反映^[7]，通过塑造中华儿女的“我们感”^[8]，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9]，为全体中华儿女确立了共同的社会目标和人生事业^[10]。还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与人民团结奋斗的紧密结合，使全体人民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结成命运相依的共同体^[11]。

徐光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33-44.

有的研究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应落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每个人的现代化上来^[12]。这一系列文献为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参考, 但单独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成果居多, 较少就二者的联系进行分析。鉴于此, 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视角,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源、互促与交融等方面, 论证二者的内在关联性, 为深入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命题提供参考。

二、历史与文化同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共同场域

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特色”的重要原因和重要内涵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在不断发展壮大、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 进一步丰富和滋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理想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宝贵资源。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传承和运用历史文化资源,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结起来。

(一) 以民为本: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立心”

以民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民本思想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 就有“商罪贯盈, 天命诛之”的说法。天命的表达载体则是“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这里所谓“天命”其实是指民众的态度, 认为百姓拥戴与否都是上天的意思表示。此后, 民本思想经历代圣贤的发展得以发扬光大。比如, 孔子阐明仁政思想, 墨子提出兼爱思想, 老子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等等。诸子百家对于民本的理解虽然有所不同,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发展以及民本观念的确立。秦汉以后, 民众逐渐从天命思想中走出来, 特别是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和集权制度的发展, 使得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态度事实上构成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基础。民本思想因而朝着“民为邦本”的方向进一步演进。代表性观点有董仲舒的“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 君为客”(《明夷待访录》)等。近代以后, 面对腐朽的封建统治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人民经受战乱、贫穷、分裂的剧痛, 中华民族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一些进步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改造, 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比如, 谭嗣同提出“非君择民, 而民择君也”(《仁学》), 康有为提出“君主立宪以申民贵”(《大同书》)等, 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思潮相结合的产物, 目的是通过改良后的政策主张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然而, 近代以来的惨痛教训表明, “君主立宪”改良并不适合中国, 也无法凝聚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政府, 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此也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由于受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他们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致使辛亥革命没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能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被迫继续求索。在这个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 革命运动的目的落脚到每个人身上，体现了与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等价值理念的呼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仅因为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日益深刻认识到，不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足以抵御外辱；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不足以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力量。

民本思想的千年演进史有力地证明，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把人民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国家现代化也无从推进。民本思想不是片面的、静止的，而是全面的、发展的。此处的“民”指人民大众的“民”、整体意义上的“民”，而不是个别、少数意义上的“民”，要求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建设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均坚持人民至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

（二）天下大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立命”

中国人自古就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孔子看来，“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便是一个国家的理想状态。墨子也认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应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礼记·礼运》进一步对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进行了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理想在我国历史上虽然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数千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拼搏进取。

秦汉以后，统一王朝的建立使得大同社会建设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基础，思想家们寄希望于依托统一国家框架实现国家大同。思想家们对“天下”与“国家”进行了区分，并提出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14]。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都代表着这种努力。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且屈辱的生活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康有为在《大同书》进行了详细描绘：“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大同书》虽然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蓝图，勾勒出臆想中的没有压迫和剥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却没有能够为实现大同社会指出可行道路。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关于大同社会

的向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将其中的天下为公精神转化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要求, 将其中的对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等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

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给中国式现代化以有益启示。第一, 天下大同要求中国必须完成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保全中国”前提下展开, 这是中国内在的发展逻辑要求^[15], 是贯穿在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政治传统和经验事实^[16]。第二, 天下大同要求做到天下为公, 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反对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局部利益, 漠视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第三, 天下大同并不是指建立在低发展水平上的平均主义, 而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整体利益观, 内含在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朴素认知源头。天下大同从历史和文化出发,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镜鉴。

(三) 和而不同: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立身”

早在 2 000 多年以前, 中国人就开始了和而不同的探讨。《左传·昭公》记载的景公与晏子的对话, 阐述了“和”与“同”的区别。在晏子看来, “和”是把不同的东西调起来, 明显区别于“同”的混同、雷同。老子和孔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展, 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孔子更是直接指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此后, 和而不同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和发展, 如张载的“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 刘宝楠的“和因义起, 同由利生”(《论语正义》), 康有为关于“有公心爱物”“独立不惧, 各行其是”(《论语注》)的注解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和而不同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 对和而不同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体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灵活运用, 转化为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运用。

中国共产党运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重视运用统一战线团结各方力量, 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涵括范围的扩大与巩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相继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地凝聚团结奋斗的合力。建立在各民族大团结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对立统一关系: 如果没有各民族共同发展, 就谈不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如果没有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特色发展道路, 就无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也就谈不上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 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17]。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找到了一个共同前提, 即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数千年来, 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共同抵御外辱, 使得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关系得到不断强化, 最终形成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理念。这种大一统是包容、多元的大一统, 既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的, 也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

经过千百年的陶冶, 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和而不同观念随着时代进步得到不断升华,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与融合, 发展形成既外在差异又完整统一的中华文化共同体^[18]。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奋图强、改革开放, 涵养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历史文化的同源性, 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共同场域得以不断延展、相互促进。

三、理论与政策互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互转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民族、社会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逐渐转化为政治和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成功建构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现代中国。这既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升华，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融合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人口大国来说，强大的政治实体必须要有宏伟的发展目标与之相适应，而且宏伟目标还必须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得不到保障，中国将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被中国共产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进入新时代，中国一方面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又面临极为严峻的外部挑战，机遇与风险共存。在这种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被历史性地提升到新的高度，必须新的层面加以统筹推进，更好地达到理论和政策互促的效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互依关系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打开了中国进步的大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使得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开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思考。李大钊 1917 年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混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19]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20]¹⁰⁷，“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20]²⁶⁵，“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21]。李大钊主张建立的新中国必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1935 年，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22]1940 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毛泽东对于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所应加强的方面进行了强调：“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3]对于“先进的中国”的具体内容，毛泽东 1945 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进行了专门阐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24]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民族精神的胜利。战争不仅锤炼了中华民族意志，而且大大深化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成员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对此，费孝通有过精辟论述：只是由于 1840 年以前，没有遇到来自中华大地以外足以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对

徐光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33-44.

立面,所以才不可能在与外部势力的矛盾、冲突中显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存在^[25]。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才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想要依靠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还需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的中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有能力抵御外部威胁、维系内部团结。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开始建立互依关系。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互促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26]在这次大会上,他还郑重宣布:“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26] 405}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27],而且“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27] 338}。在依靠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反过来又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工业基地和骨干企业、发展交通运输业、恢复和发展城乡贸易、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开展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汇聚了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整合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构想到现实的质的转变,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其次,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行动。如开展民族识别,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上报的400多个民族最终确认为56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系列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力量,形成更加强大的中华民族合力。最后,借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交互推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全国各民族一条心、全国一盘棋,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正如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指出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28] 11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各族人民的团结也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28] 85-86}1987 年，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明确提出“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第一步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0 世纪 80 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 20 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 1 000 美元；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 21 世纪用 30 年到 50 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29]。1990 年，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29] 357}。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在发展中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成为当时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9] 240-24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凝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创造性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联结在一起，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30]。第二，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31]。“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进一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目标和方向。第三，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把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通过鼓励投资、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使得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从而开辟出一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推动实现发展成果由全国各族人民共享、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融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2]。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列重要论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向新高度。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3]2018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中华民族”首次写入宪法。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 346-347}。2022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新修订的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

在中国式现代化方面，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

徐光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33-44.

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 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151}他强调, “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2] 123}, 具体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 5 个方面。他指出: “实践表明, 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 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 124}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科学描绘。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这主要体现为: 一是深度论述和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两大理论命题, 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二是把共同富裕等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明确提出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三是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地位,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地位,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把“中华民族”写入宪法, 强调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发展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实践与价值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通约

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传统文化,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为两者的交融提供了实践平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既为历史文化所延展, 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所联结, 促成了两者之间的价值通约。

(一) 党的领导: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 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政治领导与西方国家存在质的区别。拥有核心领导力量, 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观和现代化观区别于西方民族观、国家观和现代化观的最本质地方。在这个意义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就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最突出位置。具体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到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只有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最突出位置, 才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才能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一百余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 到改革开放后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从土地革命到包产到户、取消农业税、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兴边富民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国家的每一步发展都以全国各

族人民为本,以改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充实各族人民精神生活为目标^[3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只有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最突出位置,才能真正做到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35]。

（二）为了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来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坚定拥护。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来源于人民对政治大一统的内在追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大一统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只有统一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因此稳定的现代国家离不开多元一体的国族塑造。特别是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不断生成和强化国族意识。中华民族成为国族,核心机制恰恰在于内部各民族联合为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建构实践^[36]。基于这一认识,追求政治大一统得以成为世代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中国共产党必定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一以贯之的根本政治立场。只有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获得持久动力来源,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这里达成高度一致。

（三）契合国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于对国情的准确把握。每个国家都应该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制度体制、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要素,走出来一条能够致力于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37]。当前,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机遇方面,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挑战方面,一是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不够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二是能源、产业和金融领域还存在风险问题亟待解决,三是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难题,生态环保任务依然艰巨,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个动态过程,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国情是其立足之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契合国情,才能获得持续的驱动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输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等正是通过这条传输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紧密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步推进离不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支撑。中华

徐光木.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33-44.

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 就必须自立自强; 而自立自强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必须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并建立新中国, 中华民族真正迈上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以‘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2] 6-7}。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 “一百年来,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 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2] 7}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离不开各民族继续团结奋斗, 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只有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才能稳步推进。具体来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密切联系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上, 各族人民凝聚成的整体力量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二是在互动机制上, 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又反过来反哺和滋润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在作用对象上,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对象是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对象也是各族人民, 两者在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完全一致。四是在文明形态上,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也追求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 两者紧密联系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实践支撑。

五、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高度统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命题的提出, 为两者互转互促、同步推进提供了共同目标和场域。首先, 两者高度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这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推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和最大优势。其次, 两者高度统一于主体和对象, 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同时将其贯穿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再次, 两者高度统一于内容实质,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 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联动纽带和最大公约数。最后, 两者高度统一于实现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都必须服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新征程上,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以更加团结奋进、更加强有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4.
- [3] 孙代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16-24.
- [4] 李莹洁.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 [J]. 学术探索, 2022 (9): 33-39.
- [5] 徐坤.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与时代价值 [J]. 求索, 2022 (1): 40-49.

- [6] 王灵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3): 77-96+205-206.
- [7] 管健, 杭宁. 知情意行: 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6): 53-67.
- [8] 常轶军, 徐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意涵 [J]. 学习与探索, 2021 (8): 62-67+189.
- [9] 孟凡东, 田园, 孟成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属性与科学内涵 [J].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4): 8-22.
- [10] 王潇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J]. 人民论坛, 2022 (Z1): 123-125.
- [11] 李友梅.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民共同体建设 [J]. 探索与争鸣, 2021 (11): 8-10+177.
- [12] 逢锦聚.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协同推进共同富裕 [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1): 3-13.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1.
- [14] 张岂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207-208.
- [15] 林尚立. 大一统与共和: 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 [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6 (1): 3-54.
- [16] 汪仕凯. 论政治大一统: 内涵、本质和演进 [J]. 学海, 2022 (5): 21-31.
- [17] 严庆. 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体团结悖论”的破解——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6): 14-20.
- [18] 方堃, 明珠. 多民族文化共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 9-15.
- [19] 李大钊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88.
- [20] 李大钊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07.
- [21] 李大钊文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71.
- [22]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9.
- [23]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
- [24]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79.
- [2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297.
- [26]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95.
- [27] 毛泽东文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62.
- [28]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11.
- [29]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26.
- [30] 李应瑞.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22-34.
- [31]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240.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8-9.
-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1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4.
- [34] 马成明, 崔莉.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健康发展的“五位一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民族学刊, 2022 (11): 11-19.
- [35] 徐光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认同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及实践要求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5): 95-103.
- [36]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泮菡. 多维团结: 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2-25.
- [37] 陈培永. 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J]. 求索, 2022 (5): 5-1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融合发展：民族地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

王浩宇 罗卓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和多语言、多文种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前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在各领域的发展进步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是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举措，既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现代化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也为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探索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开启新征程，在继续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同时，也应关注和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传承，为中华民族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实现“美美与共”的语言格局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地区；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045-12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此后，中国到底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5

作者简介：王浩宇，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罗卓，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少数民族青少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同教育研究”（ZK20210109）

引用格式：王浩宇，罗卓. 融合发展：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45-56.

成为每个时代都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个重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生逻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论述,系统、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特征,即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不仅充分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也为全面理解和透视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指明了研究方向。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方面,相关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等宏观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分析^[1]。另一方面,历史条件、政治主导力量以及意识形态属性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及其价值取向的不同^[2]。越来越多的研究基于特定学科理论^[3]、实践路径^[4]、价值意蕴^[5]等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深入考察,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案例。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通用语或共同语对于现代化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在促进教育发展、知识创新、文化传播以及推动各民族交流互动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已有一些研究从语言能力^[6]、语言规划^[7]和语言事业发展^[8]等角度分析了语言文字在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和国家民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仍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以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为切入点,基于 1949 年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考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民族地区现代化互促互进的作用机理,以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通用语言文字与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

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使用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最直接体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虽然中国的汉族人口数量远多于少数民族人口,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体多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不仅能够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能建立超大规模和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现代中国的“大一统”^[9]。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整合与团结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将人口规模巨大和民族众多等客观国情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和“红利”。当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漫长曲折的推广普及过程同时说明,这些客观国情也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语言文字的融合发展,既是对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回应,也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自己使

用的语言中却不同程度地缺少反映新思想、新概念的术语, 不得不从汉语中吸收大批新词语来补充自己的词汇, 如许多语言都借用了汉语的“工业、农业、教育、银行、供销社、医院、科学、技术、发展、改革、现代化”等新词语。同时, 在一些民族地区还出现了特殊的混合型语言形式。例如, 在交谈时, 汉族的语言表达中夹杂着少数民族语借词和混合型词, 句子按少数民族习惯组织排序, 语调也向对方靠拢; 少数民族的语言表达中夹杂着汉语借词和混合型词, 简化民族语语法, 加入了汉语的虚词表示语法意义。出现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 主要是因为汉族感觉这种语言接近少数民族语言, 而少数民族也觉得这种语言接近汉语, 包含着互相照顾对方心理需求的因素, 反映出各民族之间密切的接触关系^[10]。

多语言、多文种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特征。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各族群众在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语言使用的“一体多元”格局。但在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 民族语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 而语言文字的差异又是导致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的原因之一^[11]。因此, 在民族地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与“双语教育”就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措施。特别是1949年之后, 中国开启了和平建设时期, 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整合、贸易发展、人口流动等不断推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打破传统的、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 而人口规模庞大、最先接受西方现代知识教育体系的汉族群体, 又逐渐建立起一个现代经济、文化和科技知识的教育与出版体系^[12]。种种客观因素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少数民族全面进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工具基础。

漫长的语言文字融合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的普及推广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反映出基本国情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艰巨挑战。有观点认为, 如果让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所有语言都获得同等的使用功能和地位, 抑或是不必下大力气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就能够让所有语言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事实上, 对于一个独立统一且具有多语言、多方言的现代国家而言, 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使每种语言或方言都成为国家的政府工作语言,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无法做到为所有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同样多的资源支持, 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会进一步扩大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社会分层, 使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更加不利的局面。分析特定语言功能与发展问题, 不仅要看到历史上这种语言的使用情况, 还要考虑到目前社会交流中这种语言的使用情况, 而且需要有一个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长远眼光, 即哪些语言提供的信息能够最好地帮助本民族在各个领域达到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时, 人们更需要的是理性的思考, 而不是感情的执着, 在短期使用的便利和长远发展的利益之间的权衡中, 我们应当依据理性而不是单纯感性的判断^[13]。

二、中国式现代化中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同阶段持续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化建设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社会环境和工作目标, 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断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and 变化,大致经历了从“民族单语”教育到“民汉双语”教育再到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主的演进过程^[14]。语言存在于社会,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语言的社会变化和交际活动,必然促使语言价值及对语言价值认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中的重要因素,决定了语言规划必须具有动态性,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和规定,对不同环境和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要求,而且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并具有一定的预见性^{[15] 184}。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既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同阶段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的作用,体现了语言文字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一) 民国时期: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尝试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开启了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在中国古代社会,为实现有效和统一的政治治理,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直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追求以汉字和北方(中原)音为基础,主要为政治文化精英通用的语言^[16]。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很多仁人志士认识到语言文字改革对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要通过制定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和规范,使语言文字能够便捷地传递信息,更好地服务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进步,从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奠定基础^[17]。“国语运动”的兴起则体现出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发展。“国语运动”不仅对于共同语本身的建立和推行具有重要贡献,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它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18]。1926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指出“国语运动”的方针为“两纲四目”。“何谓两纲?一曰国语统一,二曰国语普及。何谓四目?因为国语统一含有两种意义:一曰统一,二曰不统一。国语普及也含有两种意义:一曰普及;二曰不普及。但‘国语统一’者,为的是全民族精神的团结,而‘不统一’者,为的是各地方特性的利导;‘国语普及’者,为的是全民众文化的发展,而‘不普及’者,为的是各专家创造之增进。”^[19]192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其后的委员构成中有蒙(蒙古)新(新疆)特务委员会和南洋特务委员会;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调查蒙藏情况、革新行政制度、兴办教育和筹备自治等,这是民国时期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比较重要的文件,具有开拓意义^[20]。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纷纭变幻,试图以语言文字为抓手来提升国家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也是早期探索现代化阶段中华民族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尝试和努力。

(二) 1949 年至改革开放初期:从“民族单语”向“民汉双语”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主要以本民族语言为主。1949年后,伴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逐步确立,多语言、多文种的现实情况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迫切需要推广通用语言文字来缓解这一矛盾局面。如同当时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胡乔木所言:“我们全国人民是在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下,要把革命的统一意志能够有效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就得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工具。”^[21]但考虑到当时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以及民族语言使用人数多、范围广,因此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问题。此次会议指出:“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

古、朝鲜、藏、维吾尔、哈萨克族等, 小学、中学必须用本民族语文教学, 可按当地需要和自愿设汉文课。”^[22] 这一决定在当时为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确立了发展方向, 并得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可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既符合广大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和少数民族同胞的意愿, 也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规律相适应。

改革开放初期, 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逐渐向“民汉双语”教育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同时制定了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民汉双语”教育在实践层面主要是以民族语言教育为主、以汉语教育为辅, 即更多地采用“民加汉”的模式进行教学活动。在当时的条件下, 国家鼓励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教学, 是因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和普及条件仍然非常有限, 尚不具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教育教学语言的条件^[23]。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信息传播和技术学习等方面需求的日益提升, 这种语言教育模式逐渐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2002 年第五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提出: “要在认真做好学校教育工作中有关民族语言学习的同时, 还要尽快研究并采取有力措施来改进和完善民族地区关于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学模式, 达到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质量的效果。”自此, 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改变了之前过于偏重民族语言学习的不足^[24]。当时, 国家为了加快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 依据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教育发展水平, 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采取了以母语为基本教学语言或以汉语为基本教学语言的两种教育模式。从整体上看, 两种语言模式的共同使用既适应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语言环境, 也为推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21 世纪初: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现实需求

进入 21 世纪, 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教育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势在必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继续加快,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社会语言环境和各民族的语言使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已识别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20 多种, 少数民族文字有 28 种, 不同语言又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五大语系^[15]¹⁴。这些语言各具特征, 有的内部还存在较大的方言差异。如果少数民族都把本族语作为课程教学与教育体系的基本语言, 那么国家就会形成非常复杂的、语言上难以沟通且无法互相兼容的教育系统。这不仅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 也会直接影响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 从而阻碍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使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2010 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较之以往相关文件和表述, 《纲要》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教育教学上的提法发生了新的变化, 即“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 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5]。这一变化符合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也标志着民族地区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的重心发生了转移。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26] 2016 年,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 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进一步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作用。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 确保少数民族学生

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7]。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言之基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特殊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搞好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为新时代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28]。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29]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30]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民族地区要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充分说明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国家建设、民族进步和个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各民族全面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和连接纽带。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站在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民族地区也迈向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在这一背景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各民族群众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愿更为强烈。其中，国家陆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使用国家统编《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教材便是典型体现。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三科统编教材，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直接体现，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科教材统编统用，是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对于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具有独特优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1]。同时，推行三科统编教材，也大幅提升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教育教学中的比例，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为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政治策略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从强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沟通的基本工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就业、融入社会都有利，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等，到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书记多次讲话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包含着深刻的逻辑关系，体现了不同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创新发展和工作着力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23]。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和印发了如此之多关于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文件^[23]。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政策和法规体系, 既体现了党和国家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点和政策导向, 也客观反映了广大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总之,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少数民族的意义就愈发重要。这一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推动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也说明现代化进程本身对语言文字使用人数、社会功能和传播范围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可以说,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整合、国族建构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融合功能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集体商品”。语言不会随着使用者人数的增加而导致其价值减少。相反, 一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 潜在的以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人数就越多, 使用该语言的文本也就越多, 这种效应会促进已经熟练掌握该语言的人继续使用它, 其声誉也会传递给其他语言习得者, 进一步强化该语言的吸引力^[32]。由于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具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 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里的非竞争性是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减少他人语言使用所获得的利益, 非排他性则是指任何人在学习和使用某种语言的同时并不会排除或降低他人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33]。在一个语言异质性的社会环境中, 语言使用可以被认为是公共产品的消费, 因为语言传播所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便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效益, 即语言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与管理^[34]。同时, 基于语言的公共产品属性, 个人所获得的网络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也并不冲突, 因而语言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又会进一步促进语言外部网络性的扩张。从理论上讲, 除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影响之外, 某种语言特别是族际通用语、共同语等对于真正想要学习它的个体而言总是开放的, 语言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决定了其“集体商品”和公共产品属性是一个“众人合作”的结果。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具有促进各民族经济融合发展的功能。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因为其本身具备很高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这也是一个强化语言“溢出效益”的过程, 有利于广大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经济融合发展, 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技术革新、信息传播、人才培养等, 符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追求。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交通和通讯事业迅速发展, 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从族际交往的视角来看, 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的劳动力流向本地城镇、东中部汉族劳动力流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城镇、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向沿海和中部汉族聚居城镇等四类人口流动方向, 构成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人口跨地域和跨城乡流动的主要格局^[35]。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市场经济发展, 也是通过语言文字这一重要的交流和信息工具, 给各民族成员创造共同的交际和经济空间, 使其能够充分获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溢出效益”, 从而在收入、消费、投资等方面与汉族社会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济融合功能为实现各民族群众共同富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微观层面来

看,任何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发展都存在对某种通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要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安排,所以在民语体系学习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不存在就业竞争的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持续加快,计划经济体制保障的就业安置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替代,“统分统包、统一安排”的就业格局被逐渐打破。各民族劳动者掌握工具性语言方面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一度被隐藏于行政命令的就业保障中,则公开展现在市场竞争中并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衡量和调节^[36]。所以,能否成功帮助少数民族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真正达到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求,是推动各民族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根据布迪厄的语言社会学理论,如果将掌握某种语言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本身又能够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本,促进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那么在各类社会情境特别是教育系统中掌握强势文化资本的个体,更容易获得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渠道^[37]。由此可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以及民族地区全面现代化等方面具有关键意义。

进一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激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特殊载体。作为日常经济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语言知识和技能具有“元知识”“元技能”的属性,是个体获得其他知识、技能、信息的重要基础^[38]。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环境和特征决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人民掌握绝大部分知识和信息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帮助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获得内生动力,从“输血式”发展模式走向“造血式”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基础。2018 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计划》提出“要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39]。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溢出效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国家内部,语言的兼用和转用现象通常都是个体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并不是直接的政治压力的结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同样需要关注民族语言发展的“长尾效应”,重视民族语言在边疆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特色产业、创新创业方面的独特经济优势^[40],以此为基础来营造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的社会氛围。这本身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和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目标。

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价值融合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1983 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4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2]在具有“高度的文明”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必然是协调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 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 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 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4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价值融合功能, 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必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 守望相助、手足情深。”^[30]语言文字具有工具性和文化(情感)性双重属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具属性为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升学、就业等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文化属性则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创造了必不可少的传播条件, 有利于同时丰富汉族和少数民族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是由许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复杂整体, 语言对于文化的构建和传承则是以符号的体系形式整体发挥作用的。一种语言的发生、扩布、流传总是与相应的文化的发生、扩布和流传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一致, 但这一过程又具有可变性的一面, 因为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 而社会的发展变化, 归根到底是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不在语言中有所表现^[44]。自秦汉以来, 我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伴随着各民族成员交流交往的加深, 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早已形成互补融合的发展关系。从语言本身来看, 今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是哪个民族的语言文字, 而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壮大, 逐渐形成的族际通用语言文字, 体现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历史进程^[45]。语言作为文化的结晶、文化载体和文化象征, 具有无可取代的社会整合力量, 是社会的基石和心灵的稳定剂。语言的统一稳定, 可大大减缓各种冲击带来的风险、震荡和不确定性, 是社会良性运转的精神保障, 它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性保障手段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46]。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来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和普及, 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凝聚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具有代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特殊象征意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价值融合功能的发挥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并行不悖。人类的语言行为是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化精神表征, 这些表征与道德感、价值观、认识论等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密切联系。以语言为内核的国家文化, 如历史书写、道德伦理、艺术审美、文学神话等, 最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特殊的文化气质, 也最能唤醒国民内心的历史感和使命感, 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传递精神力量^[47]。语言可以用来表达“国家”(或其他政体)身份, 这种身份通常蕴含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中, 语言也可以用来体现“意识形态”, 因为它总是与团结、忠诚、凝聚力、爱国主义等期望相连^[48]。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 同时具备正式与非正式整合手段的优势, 表现出更为强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凝聚力。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文化的趋同,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背景下, 部分少数民族担心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不同语言的功能变化, 是由人口、教育、文化、经济以及族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语言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 只有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发挥使用功能的语言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每种语言由此都具有各自的演变规律和路径。更为重要的是, 虽然一种语

言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不能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也不意味着一种语言不能传递另一种文化，否则拥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就不能有效进行交流，跨文化交际也不可能成为现实^[49]。总之，语言文化的交流与精神世界的形塑不可能是一元化的状态，而是一种多元互补、互促互进的社会进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价值融合功能有利于构建各民族“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本身也有利于少数民族的精神文明发展。进一步说，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社会所面临的发展挑战已经不再是物质生产力的短缺，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转型发展，为少数民族社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步创造强大、丰富的精神内核。从这一长远发展的视角来看，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不会对民族语言的传承带来负面影响，还会通过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和文化性不断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型和繁荣。也只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获得更多的转型与发展机会，才能为深层次融合和真正实现“美美与共”创造有利条件，使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国家文化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参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五、结语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任何一条现代化道路都凝聚与展现特定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确立起的价值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的超越，具有真实性、科学性、道义性的鲜明特点与价值品格，从价值层面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5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51]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丰富、发展、升级了现代化的标准，探索出了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频繁，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现实国情势必会持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而各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使用功能方面的变化也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少数民族在经济、教育、就业、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进步创造了基础性和先导性条件，是推进共同富裕、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举措，深刻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中的现代化要素与社会主义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开启新征程，要继续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提升普及程度和质量，这是加快构建东西部协同发展新格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积极关注和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使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多元一体”格局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王浩宇, 罗卓. 融合发展: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45-56.

参考文献:

- [1] 张润峰.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与独特内涵 [J]. 探索, 2022 (2): 13-26.
- [2] 王韶兴. 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 (3): 26-45+204.
- [3] 张素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 (4): 5-13.
- [4] 臧峰宇.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7): 39-55+204-205.
- [5] 董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意蕴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2 (3): 133-142.
- [6] 黄德宽. 语言能力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刍议 [J]. 语言科学, 2016 (4): 339-342.
- [7] 郭龙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4): 34-38.
- [8] 李志忠, 周宇. 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言现代化事业 [J]. 大理大学学报, 2021 (11): 10-16.
- [9] 胡鞍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1): 21-38.
- [10] 何俊芳. 语言人类学教程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175-176.
- [11] 马戎. 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民族群的现代化 [J]. 社会政策研究, 2017 (1): 110-124.
- [12] 马戎. 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 [J]. 中国藏学, 2011 (2): 108-139.
- [13] 马戎.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 6-18.
- [14] 李瑞华. 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转型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5): 132-138.
- [15] 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6] 苏力. 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书同文”和“官话”为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2): 78-95+206.
- [17] 李英姿. 语言改革、教育普及与现代国家——浅议严修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推动 [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 126-133.
- [18] 王建刚.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J]. 广东社会科学, 2021 (1): 166-174.
- [19] 黎锦熙. 国语运动史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59-260.
- [20] 黄晓蕾.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04-205.
- [21] 崔明海. 1956—1960年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开展及其影响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1 (4): 109-125+159.
- [22] 第一至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EB/OL]. (2012-11-08) [2022-09-14]. <http://www.qinghai.gov.cn/mzfw/system/2012/11/08/010009815.shtml>.
- [23] 万明钢, 安洁.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 52-58.
- [24] 丁赛, 阎竣.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J]. 民族研究, 2021 (1): 52-65+140.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011-10-29) [2022-09-16]. http://www.gov.cn/jrzq/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EB/OL]. (2015-12-27) [2022-09-16].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107/t20210730_547843.html.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印发〈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16-09-13) [2022-09-17].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94901.htm.

- [28] 王敏. 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N]. 人民日报, 2021-05-10 (17).
- [29] 龚亮, 等. 奋发有为在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N]. 光明日报, 2021-03-06 (2).
- [30]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31] 袁硕, 周梦圆. 以统编语文教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特征、机理与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2): 24-33.
- [32] 吉布森·弗格森. 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 [M]. 张天伟,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124.
- [33] 樊勇明. 公共经济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47.
- [34] 张卫国. 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 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J]. 经济研究, 2008 (2): 144-154.
- [35] 马戎. 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9 (6): 2-13+111.
- [36] 马戎. 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2 (3): 136-156+191-192.
- [37] 王浩宇. 流动视域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1): 16-23.
- [38] 王海兰. 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2): 89-96.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 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语委关于印发《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切实发挥语言文字在教育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 [EB/OL]. (2018-02-28) [2022-09-17].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2/t20180226_327822.html.
- [40] 王浩宇.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 以天祝县为例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1): 67-75.
- [41]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8.
- [4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43] 贾丽民, 赵天淼.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度的文明” [N]. 光明日报, 2022-01-14 (11).
- [44] 戴昭铭. 文化语言学导论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25-27.
- [45] 王浩宇, 张亦潇. 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与政治整合——基于日本与印度的比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44-154.
- [46] 赵世举. 语言与国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74.
- [47] 王浩宇. 多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国家通用语及其相关问题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 79-84.
- [48] 艾拉娜·肖哈米. 语言政策: 隐意图与新方法 [M]. 尹小荣,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42.
- [49] 鲍曼. 语言与社会 [M]. 朱跃, 朱小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 [50] 项久雨.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N]. 光明日报, 2022-08-24 (11).
- [5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 [N]. 光明日报, 2022-09-01 (1).

责任编辑: 刘涓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陈纪 曾泓凯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从社会建设层面为当前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现实生活中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及由此不断增进共同性，不仅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能够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由此让各民族在微观层面强化一种多维度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就是要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建成互惠规范、增进彼此信任，分别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在强化多维度共同体意识中彰显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现阶段，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社会化路径，同时也是推进新时代基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资本建设；关系网络；互惠规范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057-10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6

作者简介：陈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泓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下大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研究”（20CMZ032）

引用格式：陈纪，曾泓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57-66．

一、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推动各族群众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从现实生活角度看,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居住空间相对隔离,文化差异客观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各民族之间心理适应能力有待提升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和共同性不断增进,成为影响当前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点问题。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更有力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现实生活中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及由此不断增进共同性,不仅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社会资本作为考量各民族间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彼此信任的重要因素,关乎着能否实现各民族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及能否增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共同性等。

进一步讲,在基层民族工作中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实质上就是要促进各民族能够共同参与当地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之中,逐步实现全方位嵌入并由此不断增进各民族共同性,让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强化多维度的共同体意识。实地调研发现,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状况,即各民族间是否形成了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彼此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民族能否共同参与当地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然而,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人口大流动背景下,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间关系网络比较松散,互惠规范相对缺失,彼此间信任有待加强等问题客观存在,从而制约着当地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基层民族工作中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能够推进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在逐步实现全方位嵌入和不断增进共同性中让各民族在微观层面强化多维度共同体意识,为现阶段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社会化路径。

当前,学界从不同研究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涉及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例如,从各民族心理认知角度提出应增强国家认同^[3]、国歌认同^[4]、文化认同^[5]、社会认同^[6]等,从制度供给角度强调要积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促进作用^[7],从文化发掘角度认为应整合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化^[8],从教育培养角度指出应加强象征教育、情感教育、价值观教育^[9],从现代技术和传播途径角度认为应加强基层融媒体中心建设^[10]。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或是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条件,或是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然而,目前学界从社会建设层面专门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成果相对缺少,尤其是从社会资本建设角度探讨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成果更是少见。在文献梳理中发现,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1],社会资本有助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12],以及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3]。因此,当前以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作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

陈纪, 曾泓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57-66.

经济、政治生活实践的必要条件, 并由此从现实生活角度探讨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 人类正是在改造社会存在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社会意识。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各民族共同参与那些具有文化、经济、政治意义的生活实践, 能够让各民族逐步产生一种多维度共同体意识。实际上, 各民族在这些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强化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意识, 也是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中反映。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联系、社会荣誉和社会尊敬的资本”^[15], “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集合体”^[16]。可见, 各民族社会资本是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源, 它集中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各民族间社会联系是否紧密, 是否生成了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 以及彼此间信任、支持、合作程度的高低等。从实践与意识之间关系上看, 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能否共同参与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 而各民族能否共同参与各种生活实践则是多维度共同体意识能否得以产生和强化的关键。因此, 在基层民族工作中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从社会建设层面为当前探讨各民族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二、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时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概念, 认为它是指个体或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后来,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被运用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 其中罗伯特·普特南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罗伯特·普特南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促进了群体间自发的合作, 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17]。据此可以说, 各民族社会资本是各民族之间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彼此信任等要素的一种集合体, 在性质上它属于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社会资源。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如果各民族能够形成或拥有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将促进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 由此让各民族强化一种多维度共同体意识。正是在此意义上, 各民族社会资本是各民族多维度共同体意识得以强化的一种重要考量, 将有助于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天生是政治动物, 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8] 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并不同于自然界的动物, 共同参与那些具有文化、经济、政治意义的生活实践理应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各民族作为当地的社会主体, 在共同参与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中体现了这种社会属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9] 然而, 当前由于各民族文化差异客观存在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加之各民族在城乡间及区域间流动加速, 导致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间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彼此信任等社会资源较为匮乏,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因此, 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目的就是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经济、政治生活实践提供必要条件, 让各民族在微观层面上强化多维度共同体意识, 即从社会建设层面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民族间关系网络能够为各民族实现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提供重要保障, 也是调动和促成各

民族产生集体行动不可或缺的一种结构性资源。各民族群体或个体“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最终与所有成员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20]，从而保障他们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各民族间互惠规范是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目的是让这种实践活动有序、规范，实现互利共赢，并且能够促使各民族间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集体行动状态。而各民族间彼此信任是在关系网络和互惠规范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的社会效应，由此产生的合作行为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效能，而且也能够让彼此间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意识。就此而言，从现实生活角度看，当前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能够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由此让各民族在微观层面强化一种多维度共同体意识。

（一）各民族间关系网络与文化共同体意识

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就是要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文化生活实践，由此逐步让各民族强化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当前，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需要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居委会等多方主体加大制度、政策、技术及物力、财力、人力等资源供给，为这种结构性资源的生成提供必要的支持，逐步打造各民族共同参与文化交流互动的公共空间。然而，实地调研发现，大多数地方各民族间人际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网络等尚未深度形成，尤其是城市当地人口与流动少数民族群体之间更是缺乏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在有些沿海大城市中，各民族间甚至处于相互隔离或彼此间无任何联系的状态。即使有些地方各民族居住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如居住在同一城市社区或民族村落中，但是当地各民族之间因各自生产生活方式的相对独立，彼此之间并不具有建立这种关系网络的主观意愿。并且，少数民族参加本民族传统节日、民俗、信仰、文艺、体育活动较多，而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文化生活实践则较为少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说明了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间关系网络较为匮乏。因此，当前与民族工作相关的多方主体应当针对这些问题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着力构建各民族间关系网络。从现实角度看，在各民族之间着力构造关系网络，能够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文化生活实践提供保障，即能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这一集体行动提供保障。正是在构造关系网络中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进而加强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及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各民族间互惠规范与经济共同体意识

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就是要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由此逐步让各民族强化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通常情况下，各民族的行为规范既包括道德、习俗、权威、礼仪等非正式规范，也涉及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各民族互惠规范具有利他、互助、互利、共赢等特点。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就是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提供必要的行为标准，在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中逐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导致各自遵守的道德、习俗、权威、礼仪等非正式规范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有些非正式规范比较保守或者已经过时。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建成一种统一的、互惠的非正式规范。同时，在实地调研中还发现，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如何建成有助于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经济生活实践的地方性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仍然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因此，当前与民族工作相关的多方主体应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手段建成各民族间互惠规范。经济伦理规范是指导和评价经济

陈纪, 曾泓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57-66.

主体行为的善恶价值取向、调整主体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21]。在此意义上, 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就是要制定和实施那些能够约束各民族经济主体行为、调整各民族之间利益关系, 并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一种行为标准, 其目的是促成各民族在共同参与经济实践活动中实现互利共赢。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2]。正是在互惠规范的制约下, 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及美好生活愿望, 由此逐步形成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

（三）各民族间彼此信任与政治共同体意识

在各民族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就是要促成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政治生活实践, 由此逐步让各民族强化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各民族之间彼此信任是共同参与当地公共事务治理并实现合作治理的前提条件, 也是由此提升当地公共事务治理效能的一种重要路径。在现实生活中, 若各民族之间信任缺失或彼此间不信任, 或者说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猜疑或不理解, 会让各民族对当地公共事务治理难以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实地调研发现, 有些地方由于各民族之间社会联系松散, 日常性关系网络尚未形成, 以及相互之间更是缺乏一些“共事”的载体, 难以获得相互了解、相互认知的机会等, 这种情况容易让彼此间建立信任失去重要的现实基础。同时, 由于有些地方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观念信仰等方面不同, 导致当地各民族心理上“双向不适应”现象客观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显然也不利于各民族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 与民族工作相关的多方主体应针对这些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增进各民族间彼此信任。进而言之,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增进各民族彼此信任能够让各民族之间产生和强化相互合作,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提升当地环境卫生、邻里纠纷、私搭乱建、公共安全、噪音扰民、垃圾乱放、社会治安等管理型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同时, 当前要借助于增进彼此信任来推动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 在满足各民族公共服务需求中不断提升各民族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现实生活角度看, 增进彼此信任是促成各民族对公共事务治理实现协同合作的关键所在。正是在增进彼此信任中, 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管理型和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 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

三、加强社会资本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现阶段, 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就是要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建成互惠规范、增进彼此信任, 分别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 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 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 在强化多维度共同体意识中呈现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一）构造关系网络: 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

各民族之间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 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文化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前, 以构造各民族之间关系网络来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文化方面促进各民族交流互动, 让各民族逐步强化一种文化共同体意识。经过文献研究和经验观察发现, 当前从构造关系网络层面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互动, 就是为了加强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和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 在文化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以促进文化交流互动来加强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从社会建设层面看，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文化实践活动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条件，且这种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推动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如前所述，大多数地方各民族之间文化方面的关系网络尚未完全构建起来，有些地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带，甚至还存在居住“孤岛”现象。同时，即使是居住同一城市社区或民族村社的各民族之间多处于陌生人或社会关系松散状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于各民族之间这种关系网络及由此导致的文化交流互动不足，导致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当地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等难以被充分吸纳和借鉴到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中来。文化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23]。因此，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等多方主体，当前要以推动建立居住互嵌为条件，以地缘、业缘、趣缘为基础，以加强交往互动为手段，以构建社交平台为支撑，着力构造当地各民族关系网络，在培育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中让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文化生活实践，在加强各民族共有文化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二，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以促进文化交流互动来加强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24]。历史已经证明，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25]。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在范围较大的时空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因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并由此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及共同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现实生活角度看，一方面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构造各民族关系网络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条件，且只有在这种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互动中，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当前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过程。并且，当前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这一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只有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中才能更好地吸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好地借鉴现代文明优秀成果等，将它们融入中华文化发展和壮大之中，从而实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中华共同文化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同、归属的共享性、同一性、共识性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26]。可见，在各民族间构建关系网络及由此实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能够从文化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建成互惠规范：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

各民族之间互惠规范作为一种行为标准，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前，以建成各民族之间互惠规范来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经济方面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让各民族逐步强化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经过文献研究和经验观察发现，当前从建成互惠规范层面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就是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及美好生活愿望，在经济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以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当前，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要素配置差异相关。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尤其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比重过高，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等，即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其市场竞争力弱和产业

效益不高, 让不同区域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互惠是人们之间交换物品和服务以相互满足的社会交往模式^[27], 而规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28]。所以, 当前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 如建立制度、政策、法律等正式规范, 完善道德、习俗、权威等非正式规范, 目的是让当地各民族之间加强企业联动、实现产业合作及发展项目共建等,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尽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 各民族产业在原材料、半成品、劳动力、资金、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配置上存在差异, 如原材料、半成品、劳动力等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主要生产要素。主要依据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原则, 这种情况将不利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因此,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要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 促成那些具有不同生产效益的生产要素在各民族经济发展中得到均衡配置, 从而保障各民族在收益分配中真正实现利益共享。此外, 当前要让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 以建成的互惠规范推动各民族共同参与当地经济活动实践, 并逐步融入经济新发展格局之中。

其二, 在各民族之间建成互惠规范, 以保障各民族利益共享来实现各民族美好生活愿望。借助于建成的互惠规范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是从整体上让各民族形成和强化一种经济共同体意识; 而借助于建成的互惠规范来实现各民族美好生活愿望, 则是从个体上让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 一方面, 在人口大流动背景下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 主要面临就业条件不足、就业能力偏弱、就业收入较低及创业创新水平不高等诸多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实现增收致富, 进而导致城市民族社区各民族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另一方面,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务工人员尤其是少数民族返乡务工人员同样在就业、创业等方面仍一定程度缺乏必要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等现实问题。因此, 在各民族之间建成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互惠规范, 有助于推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实现充分就业并由此带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 地方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及市场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 应制定针对性的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的互惠规范, 同时还要建成统一的道德、习俗、权威、礼仪等非正式的互惠规范, 大力支持和帮助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了解相关就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发掘就业资源、拓展创业渠道、提供创业保障等, 让各民族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可见, 一定地域范围内建成互惠规范有助于从个体上实现各民族美好生活愿望, 让各民族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增进彼此信任: 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

各民族之间彼此信任作为一种协同合作的必要条件, 为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政治生活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前, 以增进各民族之间彼此信任来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公共事务治理方面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 让各民族逐步强化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经过文献研究和经验观察发现, 当前从增进彼此信任层面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 主要是为了提升各民族管理型公共事务和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效能, 在政治方面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 在各民族之间增进彼此信任, 以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来提升各民族管理型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在现实生活中, 管理型公共事务主要是指那些由政府层面要求治理的, 但按照属地原则分担到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 如环境卫生、邻里纠纷、私搭乱建、公共安全、噪音扰民、垃圾乱放、社会治安等事务。当前, 伴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这些管理型公共事务增多, 且在短时间内难以自行解决, 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管理型公共事务, 更是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并进行协

同共治才能有效解决。若这些管理型公共事务未得到有效治理,将影响当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有研究者认为,信任无疑是一个黏合剂,可以将各民族居民有机地粘合起来,促使他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29]。现阶段,当地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居委会等多方主体,要采取加强民族互信宣传教育,开展民族互信专题活动,搭建民族互信媒介平台等手段,增进各民族之间彼此信任。在各民族之间增进彼此互信中,推动各民族对当地管理型事务治理实现协同合作并提升治理效能,在此实践过程中增强各民族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这显然有助于让各民族强化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

其二,在各民族之间增进彼此信任,以推动各民族协同合作来提升各民族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在现实生活中,服务型公共事务意指地方政府及市场、社会主体等,在为当地企业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本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公共事务,如常见的社区企业、居住、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型公共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人口大流动背景下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涉及的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服务型公共事务,直接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现实需要有关。逐步解决少数民族成员在跨区域流动过程中的居住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事关各民族群众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30]。然而,实地调研发现,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尤其是有些地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享有不足、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偏弱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当地政府、民族工作部门、街道、居委会等多方主体要在构建关系网络、建成互惠规范的基础上增进各民族之间彼此信任,由此推动各民族在服务型公共事务治理中加强协同合作。进一步讲,借助于增进彼此信任来推动各民族之间协同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各民族共同参与服务型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这种治理效能的提升,意味着能够维护和保障各民族切身利益和现实需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享有合法的公共服务权利,由此让各民族逐步形成一种政治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从现实生活角度看,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能够将各民族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并由此形成稳定的关系结构,这对于组织和调动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正是在各民族共同参与日常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实践中,在微观层面逐步强化多维度共同体意识,从而让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铸牢。可见,现阶段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社会化路径,同时也是推进新时代基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和改进基层民族工作。在加强和改进基层民族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还是建立互惠规范,抑或是增进彼此信任,都必须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当前,在加强和改进基层民族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中的领导作用,以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显著制度优势统领多方主体、协调各方资源,形成合力,为打造这一特殊的社会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同时,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社会资本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并积极组织和动员当地各民族群众主动参与到社会资本建设中来。推动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陈纪, 曾泓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57-66.

让各民族强化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意识, 从现实生活角度推动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 要调动多方主体为当地社会资本建设提供资源支持。从资源转换角度看, 各民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对其加强建设则需要当地政府、民族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街道、居委会等多方主体提供制度、政策、技术、信息及物力、财力、人力等多种资源的大力支持。针对一定地域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网络松散、互惠规范缺失、彼此间信任有待加强这一现实问题, 要从条件创造、组织动员、互动实践、搭建平台等诸多方面加强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 而促进和实施这一工作则需要多方主体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实际上, 在加强基层民族工作中调动多方主体资源支持的过程, 也是在各民族之间构造关系网络、建成互惠规范、增进彼此信任的过程, 进而有助于从文化、经济、政治层面让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铸牢。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N]. 人民日报, 2022-07-16 (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 陈纪. 多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基于 W 县居民国家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0 (4): 22-32.
- [4] 刘春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歌认同进路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 34-45.
- [5] 郝时远. 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6): 1-10.
- [6] 郝亚明. 社会认同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0 (1): 19-26.
- [7] 岳凤兰.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红旗文稿, 2020 (8): 17-19.
- [8] 宫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 11-15.
- [9] 蒋文静, 祖力亚提·司马义.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及实践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 (1): 13-21.
- [10] 严庆, 谭野. 在融媒体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3): 1-6.
- [11] 陈纪, 李论. 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6 (3): 32-38.
- [12] 严庆, 于浩宇.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 (1): 38-47.
- [13] 郭小弦, 李晓光. 族际交往中的“石榴籽效应”——个体特征、网络结构与社会效应 [J]. 民族研究, 2022 (2): 1-20+138.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1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73.
- [16] 包亚明.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02.
- [17] 罗伯特·D.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 王列, 赖海榕, 译. 南昌: 江西人

- 民出版社, 2001: 195-196.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363.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3.
- [20] Coleman J.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48.
- [21] 龚天平, 李海英. 经济伦理内涵的反思——意识、规范与实践的统一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3 (1): 24-30+158.
- [22] 陈纪, 冯辉.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视角下的民族互嵌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新思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6): 31-38.
- [23] 孙秀玲. 新时代西部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方略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 1-8.
- [24]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7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2).
- [25] 马瑞雪, 李建军, 周普元, 李蕾. 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 35-46.
- [26] 左岫仙. 中华共同文化的内涵、意义及建设进路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5): 49-57.
- [27] 方亚琴. 社区互惠规范: 形成机制、类型与特征 [J]. 学习与实践, 2016 (1): 98-107.
- [28]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刘守英,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
- [29] 唐贤秋. 信任: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 [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 (2): 6-12.
- [30] 秦玉莹.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困境与优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6): 39-44.

责任编辑: 刘涓菡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贺鹏皓¹ 宋煜²

(1.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30 多年来, 特约审计员制度经历了初创探索、发展完善和改革创新三个阶段, 相关政策法规不断丰富和完善。本文以审计署聘请的五届 61 位特约审计员为样本, 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 分析和研究了特约审计员在反映工作问题、履行民主监督、参与审计项目、开展专题调研、提供咨询参谋、宣传审计工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也发现了现行特约审计员制度中存在的诸如监督职能理解有偏差、界别和规模偏少、监督实效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协同配合不畅等问题。本文从强化履职责任保障、适度扩大界别范围和规模、推动特约审计员工作落实、完善管理机制、优化协调配合五个方面, 对进一步完善特约审计员制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特约审计员;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新型政党制度; 民主监督; 审计监督

中图分类号: F239.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6-0067-14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2.06.007

作者简介: 贺鹏皓, 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讲师, 致公党党员, 审计师; 宋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信息系统监理工程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2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19JZD027); 致公党北京市委 2019 年调研课题“完善特约审计员制度”

引用格式: 贺鹏皓, 宋煜.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7-80.

一、问题的提出

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国家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济监督功能来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发挥着“治己病、防未病”的重要作用。然而，任何一种权力的效用都是双重性的，既能造福于民也能祸乱苍生。国家审计本身也是一种权力，需要对其进行监督。

特约审计员制度是通过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对审计机关进行外部监督的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审计制度的微观组成，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将民主监督与审计监督相结合的创新性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实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优势。特约审计员通过参与重大审计项目和审计工作调研，参加审计执法巡回检查、专业性会议和其他重要的审计活动，提出对审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21 年 4 月 29 日，审计署召开第五届特约审计员聘任会议，来自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等社会各界的 13 名代表分别接受聘书，正式上岗履职。

自 1989 年中共中央提出要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有关部门特邀工作人员的意见以来，理论界就开始从多个角度关注特约人员这一领域，形成一些理论观点。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来看，特约人员制度以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为目的和归宿^[2]，是民主权利、民主形式和民主渠道的体现^[3]。从统一战线与政治文明的辩证关系来看，特约人员制度是统一战线对我国监督机制的一项创新和贡献^[4]，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5]。从依法治国与民主政治法治化进程来看，特约人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法治化、加强党外民主监督制度的产物^[6]，其法治形态是典型的“软法之治”^[7]。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来看，特约人员的参政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8]，其政治资源配置仍处在“量”的扩张阶段，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求^[9]。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来看，必须健全民主监督制度体系，完善特约人员工作制度^[10]。

总体来看，学界对特约人员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专门针对特约审计员制度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文献从审计事业发展^[11]、审计工作实践^[12]等角度有所涉及，缺乏系统性分析与理论深度探讨。本研究通过回顾特约审计员制度的演变历程，以审计署聘请的五届 61 位特约审计员为样本，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广泛获取相关信息，分析其总体成效，审视其不足，探寻其完善路径。

二、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沿革

特约审计员制度自 1991 年创立至今，已走过 30 多年的历程。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的特约人员制度为逻辑起点，其制度演变大

致经历了初创探索、巩固完善、改革创新三个阶段。

（一）初创探索阶段（1991—1995 年）

特约审计员制度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正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 但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完全建立,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和违反财经法纪的问题, 也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失职渎职的问题。新形势下党中央开始探索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1989 年 1 月 2 日, 邓小平在批阅《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时指出: “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 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 并在一年内完成, 明年开始实行。”^[13] 1 月 27 日通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指出: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事务以及群众生活、爱国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政治协商, 并通过提出建议和批评, 发挥民主监督作用。”1989 年 5 月, 国家监察部聘请了第一批“特邀监察员”, 成为首个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的部门。1989 年 12 月 30 日, 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 号) 中明确提到了“聘请一批符合条件的和有专门知识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等”, 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要开展特约审计员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审计署与中央统战部就关于聘请特约审计员的制度进行研究。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积极推荐人选, 征得本人同意后, 1991 年 3 月 7 日, 首届特约审计员聘用大会召开, 审计署共聘请 13 名同志担任首届特约审计员。1991 年 3 月 15 日, 中央统战部与审计署联合下发《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审办发〔1991〕89 号), 特约审计员制度正式确立。《意见》要求各级审计机关应在本地区、同级民主党派组织向统战部门推荐的人选中聘请特约审计员, 并对聘请范围及数额、受聘条件、工作任务、权利义务、聘请程序和聘任期限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截至 1995 年, 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湖北、四川等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哈尔滨、长春、南京等 12 个大中城市的审计厅(局) 聘请了 443 位特约审计员。特约审计员参加了工交、商贸、基建、财政、金融等行业 135 个项目的审计, 参加审计事项的研究、咨询和审计调查 310 余项。此外, 特约审计员还参加了审计执法检查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审计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审计法律法规的起草^[14]。

（二）发展完善阶段（1995—2012 年）

随着特约审计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细化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机制。审计署于 1995 年制定了《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审办发〔1995〕292 号), 对特约审计员的工作职责、工作联系制度和会议制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1995 年 6 月 22 日, 审计署聘请了第二届共 13 名特约审计员。1999 年 11 月 20 日,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实践充分证明, 特约人员工作是我国民主监督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渠道, 是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途径, 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生动体现。”

2005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 号)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特约人员工作制度,拓宽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聘任特约人员的领域,明确特约人员的职责和权利,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发〔2006〕15 号)第十三条明确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可在党外人士中开展聘请特约人员工作,充分发挥各类特约人员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章程规定的参政党建设目标和原则,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推动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2006 年 9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加强特约人员工作的意见》(统发〔2006〕11 号),对特约人员工作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规定。

审计署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特约人员工作的要求,在总结了聘请前两届特约审计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7 年进一步修订了《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就加强与特约审计员的沟通联系,安排和落实特约审计员参与有关审计工作、审计业务会议或业务培训以及调研和召开座谈会等方面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2007 年 6 月,审计署对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1409 号提案中关于规范和健全特约审计员工作机制的提案进行了答复(审函〔2007〕122 号),提出将进一步完善特约审计员工作机制,不断推进特约审计员工作的制度化。

(三) 改革创新阶段(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民主监督作用,对新时期民主监督提出了许多新要求,特约审计员工作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将民主监督的内涵、方式、形式纳入法治化轨道。《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民主党派基本职能归纳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并明确规定了民主监督的内涵,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对象是明确的,即中国共产党;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民主监督的方式包括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特约审计员制度是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聘请党外代表人士担任特约人员。”这表明特约审计员制度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2015 年 12 月 8 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中办发〔2015〕58 号)及相关配套文件,其中第二部分第八条强调:“加强对审计机关的监督。……完善聘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制度。”为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审计署组织专题工作组对现行《审计署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涉及党的建设、工作规则、综合监督、人事管理、行政事务、审计业务、信息化建设七大类,对行政事务类中《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是进一步拓展民主监督的实施领域。在 2016 年 7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总体部署,并请各民主党派与 8 个省份对接,对脱贫攻坚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审计机关积极发挥特约审计员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组织特约审计

贺鹏皓, 宋煜.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7-80.

员深入扶贫一线, 赴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铜仁市石阡县, 走访调研审计署定点扶贫工作和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工作。各地方审计机关也组织特约审计员深入扶贫审计现场开展调研、建言献策。从 2021 年 6 月开始, 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共同牵头, 支持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为期 5 年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在中央层面安排无党派人士参与, 扩大了党外人士参与范围, 充分体现了党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审计署在 2018 年 3 月就沿江 11 个省份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中央决策部署情况开展资源环境审计, 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15]。特约审计员也积极参与到项目中来, 就审计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出了多项意见和建议。

三是进一步促进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党首次把“四个监督”作为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明确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 增强监督合力。”这为新时代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这一论述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健全监督体系的部署一脉相承。特约审计员既可以作为审计项目组的成员开展审计工作, 代表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同时也作为外部人员深入审计一线了解实情, 代表社会公众履行对国家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责, 具有双重监督的特征, 起到了民主监督与审计监督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三、特约审计员政策法规演变及其特征分析

特约审计员本质上属于特约人员的一种, 其工作开展兼顾政治性与专业性的统一。通过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梳理, 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些政策法规按照对象的不同划分为针对特约人员管理的政策法规和专门针对特约审计员的政策法规。其中由选聘主体——审计机关制定的对特约审计员进行规范的文件是核心制度, 包括《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审办发〔1991〕89 号)、《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审办发〔1995〕292 号)、《审计署关于印发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审发〔2007〕74 号)和《中共审计署党组关于印发〈审计署制度〉的通知》(审党发〔2018〕74 号)。

(一) 选聘条件: “政治强、业务精、热爱审计工作”

从特约审计员的选聘范围来看, 《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中规定“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层次较高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 体现出明显的统战工作特点。《审计署制度》则增加了“热爱审计工作”这一条, 体现了聘任要兼顾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意愿。从专业要求来看, 《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要求“从事过较长时间的财政经济工作, 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审计署制度》则在“具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科学文化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水平”之外, 强调了特约审计员要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能力”，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副厅（司、局）级以上行政领导职务”。从任职年龄来看，《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要求一般在 65 周岁以下，而《审计署制度》考虑到了审计工作的特点，提出“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的要求，使任职年龄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保持一致。在任期方面，《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提出两年任期的要求，《审计署制度》将任期调整为五年。《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规定一般不超过两届，到期未续聘即自动解聘。《审计署制度》删除了不超过两届的规定，调整为“任期届满，要及时聘任新一届特约审计员，对上一届特约审计员可根据情况续聘或解聘”。此外，《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规定“对违反法律、纪律和规定的特约审计员应予解聘，并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审计署制度》新增了“因工作调整、健康状况等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特约审计员”“无故或长期不参加特约审计员工作”“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特约审计员”的处理规定。

（二）工作制度：“强化沟通、定期会议、保证履职”

从《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开始，新增了特约审计员工作联系制度与会议制度，明确了由审计署办公厅负责特约审计员的组织管理，负责与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特约审计员所在单位的联系工作。《审计署关于印发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对有关司负责特约审计员的日常工作安排作了明确规定，每位特约审计员相对固定地参加一个司的业务活动。各有关司要有一位领导具体负责特约审计员的工作，每季度至少与特约审计员联系一次。《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和《审计署关于印发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办公厅要协调相关出版单位向特约审计员按期寄送审计方面重要期刊报纸，并不定期介绍特约审计员工作情况和工作经验。在会议组织方面，《审计署关于印发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将《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规定的每半年召开一次特约审计员座谈会，调整为每年召开一次特约审计员座谈会。

（三）权利与义务：“责任心强、一视同仁、严守纪律”

在特约审计员的职责方面，《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规定了特约审计员的工作任务，如“参加大型企业和大型建设项目的审计、参加重要审计事项结论和处理的研究、参与审计法规理论等相关工作的研究咨询、参与审计执法巡回检查”等。《审计署制度》则概括为“特约审计员参与有关审计工作积极发挥监督、咨询、联络作用，对审计工作方针、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权限方面，《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规定了特约审计员具有与审计机关工作人员同样的权力，并有权向统战部门和有关单位反映工作情况和问题。《审计署制度》更加细化，一是赋予了特约审计员调查研究的权限，如“特约审计员在与审计署办公厅沟通后，可到各级审计机关调查研究，了解有关审计工作情况”；二是可以向审计署报告的权限，如“特约审计员得到反映审计等方面的材料、情况，可及时转送（告）给审计署办公厅”。这为特约审计员与审计机关及时沟通交流提供了保障。

在待遇方面，《关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审计员的意见》规定：“特约审计员不脱离原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其行政关系和工资、福利等仍由原单位负责。参加审计工作时

差旅费、出差补助等，由审计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负责开支；对重要审计事项的咨询，有的酌情给予一定报酬。”《审计署特约审计员组织管理办法》则指出差旅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由审计机关填报，送机关服务局审核报销。而《审计署制度》不再涉及待遇要求。一方面，特约审计员部分为公职人员且为兼职，应严格遵循中央八项规定“不可兼职取酬”的规定；另一方面，则突出特约审计员的独立性和奉献精神，他们“不拿工资、不占编制”，但不是外人，他们参与审计相关工作与审计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和待遇相同^[16]。

四、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工作情况分析

（一）历届特约审计员总体情况分析

② 第一届特约审计员郭国庆, 27 岁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8 岁被聘为审计署特约审计员。

表 1 审计署历届特约审计员界别情况

	时间	民革	民盟	民建	民进	农工党	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盟	无党派人士	工商联	总数
一届	1991	1	4	2	1	2	1	1			1	13
二届	1995	2	2	2	1	2	2	1			1	13
三届	2007	1	1	1	1	1	1	1	1	1	1	10
四届	2013	1	2	2	1	1		1	1	2	1	12
五届	2021	1	2	2	1	1	1	1	1	2	1	13
合计		6	11	9	5	7	5	5	3	5	5	6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审计年鉴》《中国审计报》等公开资料整理

（二）历届特约审计员履职成效

一是反映问题情况，广泛凝聚共识。相关问题建议既紧扣社会热点和改革难点，又凸显民主党派特色和优势。在 2009 年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座谈会上，有的特约审计员针对当时银行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提出了应对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审计的建议；有的特约审计员认为各地上马的重大项目不断增多，有必要开展项目投资审计，避免重复建设和限制高排放、高污染项目；有的特约审计员针对近年来台资逐步向中部和西部转移，建议审计署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和土地出租价格的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17]。这些建议得到了审计署领导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列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中。

二是履行监督职能，增强审计机关公信力。2008 年审计署开展了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专项审计，多名特约审计员参与到抗震救灾审计项目中来，不仅加强对救灾款物的监督，同时也对审计工作进行监督，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工作进行^[18]。自 2011 年开始，审计署商请监察部同意，组成由驻署监察局牵头，由中央统战部推荐、审计署聘任的特约审计员和相关人员参加的检查组，开展由外部监督机构检查自身预算执行情况^[19]。部分特约审计员全程参与了对审计署的财务检查工作，为审计署加强和改进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20]。

三是参与审计项目，了解“一线实情”。部分特约审计员赴北京、上海等地金融审计项目点，与审计人员面对面交流，了解金融审计揭露重大违规问题和系统性风险等相关情况。还有的特约审计员参加机场建设项目审计，深入现场 20 余天，发现重大问题线索，为国家节约数千万建设资金^[14]。

四是开展专题调研，解决实际问题。有的特约审计员对长江三峡工程竣工决算审计进行专题调研，了解了三峡工程建设、管理、综合效益等情况^[21]。还有的特约审计员来到审计署的定点扶贫村进行调研，不仅对审计署定点帮扶工作进行监督，还形成了《加大各类财政专项资金整合力度》的专项提案^[22]。

五是提供咨询参谋，服务工作大局。有的特约审计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草案）》《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审计暂行办法》的起草和论证工作^[14]。还有的特约审计员发挥自身研究特长，为推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建立贡献了专业智慧。

六是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宣传审计工作。特约审计员充分利用其党外人士的特殊身份，向社

贺鹏皓, 宋煜.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7-80.

会不同群体积极介绍审计政策、宣传审计成果。如有的特约审计员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工作的提案》(提案号 2315), 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列为优秀提案^[23]。有的特约审计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 对《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24], 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国家审计^[25]。

五、现行特约审计员制度存在的不足

通过采用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 笔者听取了部分市县审计机关工作人员、特约审计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对特约审计员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经归纳整理, 笔者认为现行的特约审计员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 监督职能理解有偏差

审计机关对民主监督职能认知如何, 往往决定着特约审计员工作的成效。一种观点认为, 特约审计员的职责更侧重于发挥特约审计员的专业咨询功能和社会影响力, 而非监督功能。有的人提出: “专业人做专业事, 审计机关现在尤其需要聘请大数据、资源、环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为我们传经送宝。”同时, 特约审计员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身份有利于扩大审计机关影响力, 推动审计职业化、审计一级学科建设、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资源整合等工作的开展^[26]。另一种观点认为, 特约审计员毕竟是“外人”, 其定位应是“帮忙不添乱”^[27]。此外, 极个别基层审计机关仍未真正理解特约审计员的“党外”身份。有的以“特约审计监督员”的形式来替代特约审计员, 承担监督任务的大部分是审计机关外其他部门的公职人员或返聘审计机关已退休的领导干部, 并未突出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监督性质。

(二) 界别与规模偏少

从界别组成来看, 大部分基层审计机关特约审计员选聘范围仍局限于民主党派组织推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等为主体, 广泛分布在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如何提高社会整合能力, 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新考验^[28]。《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战工作 12 个方面对象之一。这也为今后一段时期审计机关特约审计员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人员规模来看, 曾有学者指出: “特约审计员聘请, 不宜过多, 也不宜太少, 省、市审计机关一般聘请 5 至 7 人为宜, 县级审计机关一般聘请 3 至 5 人为宜。”^[29]但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一建议已不符合现实的需要。相较其他部门的特约人员, 审计机关特约审计员规模偏小。原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从成立最初 1989 第一届的 21 人扩大到 2013 年第六届的 40 人, 累计 210 人^[30]。2018 年 8 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制定印发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 决定建立特约监察员制度。12 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员聘请会议, 共聘请特约监察员 50 名, 聘请人数进一步增加。2018 年 10 月, 最高人民法院聘任了第三届共 189 位特约监督员, 聘任人数创历史新高。2019 年修订的《海关特约监督员工作办法》(署政发〔2019〕139 号)也在条款中明确了要适当增加特约人员的聘任数量, 直属海关聘任特约监督员从 2009 年不超过 20 名或 25 名, 修改为 2019

年的不超过 30 名；隶属海关聘任特约监督员从 2009 年的不超过 10 名或 15 名，修改为 2019 年的不超过 20 名。

（三）监督实效不足

有的审计人员指出现行特约审计员的作用不够显著，有表面化、空泛化倾向，缺乏对审计工作实质性的推进和帮助，导致特约审计员的监督工作流于形式。一是重视程度不够。上级并未将特约审计员工作列入审计机关工作考核中，基层并未对此予以足够关注并付诸实施。二是任务安排不明。部分基层审计机关虽然聘请了特约审计员，任期内并未对特约审计员作出具体的任务安排。三是形式载体单一。一些基层审计机关主要以开会的形式来开展工作，如每年邀请特约审计员参与辖区内的审计工作会议、开展特约审计员座谈会等，对诸如撰写调研报告、参与审计项目、提交建议、廉政回访等形式涉及较少。四是履职时间未能保障。某些特约审计员履职意愿不强，沟通联系不够。许多特约审计员身兼数职，有的还是其他部门的特约人员，精力有限。

（四）管理机制不完善

一是奖惩退出机制不完善。考虑到特约人员身份特殊性，部分基层审计机关对特约审计员存在“说不得、惹不得”的心态，未制定或严格执行相应的特约人员考核机制，导致特约工作“干多干少”一个样。某些审计机关出现特约人员聘请“人情化”“私封化”“一聘到底”等不规范现象，对特约人员仅要求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此外，作为“三高”（高学历、高技术、高影响）、“三外”（体制外、党外、不少人有海外经历）群体，个别特约审计员具有思想多元、自我标榜、标新立异的特点，行为或言论如果不恰当，会给审计机关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存在回避、保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中办、国办《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审计机关要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国家机关、政党组织、人民团体、国家的事业组织、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其他管理、分配和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单位要纳入审计全覆盖范围。审计机关在对民主党派开展预算执行审计、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时，不应安排特约审计员参与与其自身党派相关审计项目，接触相关资料等，以防止“跑风漏气”“为人说情”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审计工作的专业性，特约审计员与审计机关人员共同开展审计工作时，将会不可避免地涉及被审计单位的秘密。实践中如果不加留意，就有可能造成执法“泄密”风险。如果特约审计员缺乏保密意识，无意中透露了审计相关计划安排，将会使审计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五）协同配合不畅

一是在选聘环节，未考虑“双重身份”特质，审计机关与统战部门、民主党派、所在单位的信息不对称。某些基层审计机关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审计员，并没有征询民主党派组织意见，更倾向于与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个人联系，或从本单位的需要出发选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社会知名人士，甚至通过“一个召集电话、会议、一本聘书”就确定了特约人员。民主党派组织甚至事后才知道具体哪一位成员是特约审计员，存在聘请无建议权、知情权滞后等问题。这也导致审计机关在聘请特约审计员时对其任职情况往往不太了解。

贺鹏皓, 宋煜.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7-80.

二是在后续管理环节, 存在衔接不畅。部分基层统战部门或民主党派组织在完成特约人员推荐工作后, 后续管理缺失, 对特约审计员的履职情况和工作困难等问题不关心不了解。一些基层审计机关也没有定期将该特约审计员的履职工作形成书面材料汇报给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组织与所在单位。由于特约审计员是兼职, 所在单位对这项工作了解不深, 如支持意愿不够也会进一步影响特约审计员的履职成效。

六、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特约审计员制度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 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 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亲自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体现了党对审计事业的高度重视^[31]。2018年5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要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 以审计精神立身, 以创新规范立业, 以自身建设立信。”审计机关选聘的特约审计员对审计机关履行监督职责, 不仅是对“谁来监督审计机关”的回应, 也是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 还是“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的内在要求, 更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应从强化履职责任保障、适度扩大界别范围和规模、推动工作落实、完善管理机制、优化协调机制等五个方面, 进一步完善特约审计员制度。

(一) 强化监督责任保障

一是审计机关要树立和表明主动接受监督、自觉支持监督的鲜明态度, 主动为特约审计员履行监督职责创造外在条件。比如, 在审计机关内部各项检查中邀请特约审计员参加, 积极采纳特约审计员在审计项目计划安排、审计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的意见^[32]。2019年1月11日, 13位特约监察员列席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这是特约监察员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次, 也是中央纪委全会历史上的首次^[33]。这是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重要举措^[34]。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各级审计委员会成立后, 更加凸显了审计工作的宏观性、全面性与重要性。我们认为可以参考借鉴特约监察员的模式, 邀请特约审计员列席审计委员会会议, 展示审计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意愿, 进一步提升对特约审计员工作的重视程度。

二是审计机关要有服务意识, 对特约审计员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各部门要有一位领导负责具体工作, 向特约审计员按期寄送审计方面重要期刊报纸, 定期召开会议, 保持联系沟通。可以邀请审计法律、党建专家来讲解授课, 强化特约审计员对审计法、党建法规等知识的掌握, 提高参政履职能力。

(二) 适度扩大界别范围和规模

一是适度扩大界别范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特约审计员工作开展的作用不容小觑^[35]。例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管理的民营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 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审计机关可聘请他们中的相关代表担任特约审计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项目为抓手, 助力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合理确定人员规模。由于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工作办法》对特约审计员聘任数量没有做强制性规定，很多地方在聘任时存在一定随意性。应结合各地审计机关数量、工作人员数量、民主党派成员数量，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合理确定。为方便沟通联系与业务开展，特约审计员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审计机关业务机构设置数量。

（三）推动特约审计员工作落实

一是上级审计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审计机关的指导，将特约审计员工作纳入年度考核，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考虑到地区情况差异，考核应作为加分项，而非强制性要求。

二是审计机关要定目标有计划。各地审计机关应将特约审计员工作与审计机关的中心任务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把工作及任务安排落在实处。如将特约审计员与相应的内设机构相对应，让特约审计员在 3 至 5 年任期内，聚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某个重大方面，参加 2 至 3 个审计项目，提交 1 至 2 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出 3 至 4 条有针对性的措施建议，必要时也可以利用新媒体进行一次宣传，甚至作为政协委员就审计相关方面形成一份提案。

三是要突出成果和实效。特约审计员工作不求多，但“求精、求真、求实”。审计机关要突出特约审计员自身的优势特点，可以征求特约审计员的工作意向，让他们围绕自己感兴趣的相关审计项目、调研主题、审计方法技术等领域开展工作。专题内容可以各不相同，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哪怕只有一个成果，取得一点点突破，对于审计工作的创新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四是重视选聘人员的履职时间保障。特约审计员的选聘机制凸显了其来源精英化趋势，但问题在于作为党外精英人士，大多身兼数职，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难以有充裕的时间履职监督。因此，应适当增加各行业之中非领导岗位人员的遴选，以便有较为充裕的履职时间保障。

（四）健全特约审计员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奖惩考核退出机制。审计机关是国家机关，更是政治机关。在选聘时，一定要重视特约审计员的政治素养，提高对其个人言行的关注度。同时，对于特约审计员参与审计项目、提供咨询服务、撰写调研报告、向社会公众宣传等提供相应的激励；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可以评为优秀特约审计员，进一步激发特约审计员的积极性。审计机关应对特约审计员一定聘用时期内的表现进行考核，对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特约审计员不再予以续聘或及时解聘。

二是加强过程控制，防范审计风险。严格按照《公务员法》《审计法》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回避范围的规定，特约审计员涉及利害关系或其他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应予以回避。审计机关要加强保密宣传教育，增强特约审计员的保密观念，提高特约审计员的保密知识技能水平，防止审计信息泄露造成风险隐患。

（五）优化部门间协调配合

一是要科学划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特约审计员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现有的唯一从事审计监督工作的群体，身份特殊。特约审计员工作绝不只是聘任方审计机关的事。实践中，统战部门是特约审计员的归口管理部门，负有对特约人员工作的统一协调、监督和检查职责。民主党派、审计机关及其所在单位对其工作领域也负有协管的义务，建议在涉及组织人事等方面工作时，以统战

贺鹏皓, 宋煜.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67-80.

部门协调为主; 在涉及具体审计工作业务时, 以审计机关为主。

二是重点环节与重大事项应有制度化保障。如在聘请程序方面, 党委统战部门、民主党派共同协商酝酿初步人选, 根据一名特约人员原则上只承担一个单位的特约工作的要求, 平衡协调好各部门人力资源。对特约人选进行考察和研究后, 向其所在单位正式推荐。在征求相关单位及本人意见后, 最终进行确认。对特约审计员的聘任信息要及时向外公布, 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在后续管理阶段, 审计机关应组织特约审计员参与思想政治、审计工作纪律、保密等相关学习, 通过定期汇报相关材料、召开相关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交流, 积极争取所在单位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刘洁. 试论我国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J]. 理论学刊, 2008 (7): 83-86.
- [3] 高会洪. “柔性监督”与强化约束力——关于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几点思考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1): 67-70.
- [4] 张锦炎. 解读统一战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4): 41-44.
- [5] 刘蓉宝, 宋光清. 论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 (4): 17-20.
- [6] 肖巧平. 特约 (邀) 人员制度法制化进程及法律完善——基于中央法规性文件的考察 [J]. 中共党史研究, 2011 (8): 56-63.
- [7] 丁小萍. 软法治理与参政党民主监督的实效性研究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1): 12-16.
- [8] 王伟达. 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视角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1): 10-12.
- [9] 王建华, 王云骏.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资源配置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考察视角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4): 70-75.
- [10] 曹伟. 健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体系: 基于政策文本与实践调研的分析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2): 47-54.
- [11] 张晓蕾. 发挥特约审计员作用 促进审计事业发展 [J]. 审计理论与实践, 1996 (2): 19-20.
- [12] 孙东杰. 做好特约审计员工作, 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努力 [J]. 审计理论与实践, 1995 (6): 53.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262.
- [14] 审计署聘请第二批特约审计员 [J]. 中国审计, 1995 (7): 3-4.
- [15] 本刊编辑部.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长江保护法——国家审计助力长江大保护 [J]. 审计观察, 2021 (3): 12-13.
- [16] 审计署新聘任 12 名特约审计员 多数来自民主党派[EB/OL]. (2013-10-16)[2022-07-2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6/c70731-23216837.html>.
- [17] 徐梓. “相信特约工作一定不负众望” [N]. 人民政协报, 2010-02-05 (3).

- [18] 杨志永,夏明.“灾后重建跟踪审计发挥了强大的免疫作用”——审计署特约审计员赴四川督导灾后重建审计工作侧记[J].中国审计,2009(20):14-16.
- [19] 肖华.“自抄家底”让审计更有底气[J].中国监察,2012(15):36.
- [20] 刘世昕.12名特约审计员受聘审计署,公众担任起审计监督重任[N].中国青年报,2013-10-16(5).
- [21] 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赴三峡工程调研[EB/OL].(2011-09-28)[2022-07-29].<https://gov.cn/oldweb/n4/n19/c44307/content.html>.
- [22] 审计署组织特约审计员和媒体赴贵州审计扶贫一线开展调研[J].中国审计,2016(22):21.
- [23] 九三学社13件提案被全国政协评选为优秀提案[EB/OL].(2017-09-11)[2022-07-29].<http://www.rmzxb.com.cn/c/2017-09-11/1784688.shtml>.
- [24] 人民网.国务院加强审计工作 强化腐败高发领域审计力度[EB/OL].(2014-11-02)[2022-07-29].<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2/c70731-25956966.html>.
- [25] 谢靓.让更多老百姓参与和了解审计工作[N].人民政协报,2010-02-03(3).
- [26] 李卓,秦荣生:专业视角履职尽责[J].财务与会计,2019(4):10-11.
- [27] 张晴阳.摆正位置 帮忙而不添乱[J].协商论坛,2000(10):14-15.
- [28] 中共中央统战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J].求是,2018(15):16-18.
- [29] 成浙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加强改进审计工作——关于做好特约审计员工作的几点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1996(5):30-33.
- [30] 王冠,任建明.特约(邀)监察员制度研究——基于规范性文件的考察与特邀监察员的实证分析[J].学术界,2019(1):116-128.
- [31] 孙宝厚.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审计研究,2018(4):3-6.
- [32] 欧阳涛.郑州市特约审计员参加审计项目计划听证会[J].理财,2017(5):98.
- [33] 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首次列席中央纪委全会[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1-12(1).
- [34] 王冠,任建明.“谁来监督纪委”:监督制约纪检监察机关机制的特征分析[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6):28-39.
- [35] 王亚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C]//进一步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2016统一战线前沿问题研究文集,2016:25-30.

责任编辑:刘泮菡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陈桂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 要：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2022 年 3 月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0 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结晶。从历史维度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诞生前经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两个交替发展阶段。从核心内涵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系统阐述了“统一目标论”“统一依靠论”“统一指引论”“统一理念论”“统一原则论”“统一路径论”等国家统一理论问题，包括“以心灵契合为目标”“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自身实力为依靠”“以历史任务为号召”“以民族复兴为使命”“以同胞亲情为纽带”“以命运与共为连结”“以一中原则为基础”“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基本方针”“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以融合发展为手段”“以民主协商为路径”等 12 个方面主要内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对开展新时代对台工作、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国家统一；历史形成；核心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081-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2.06.008

作者简介：陈桂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用格式：陈桂清.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81-93.

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 1949 年以来党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及实践，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针政策，形成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形成于党的对台工作实践，经历了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交替发展，再到“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包含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目标任务、思想理念、方针原则、步骤路径等方面内容，丰富和发展了党中央对台大政方针与国家统一理论，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智慧与思想光芒，具有重大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产生与研究述评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孕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进入新历史方位的时代背景，孕育在两岸关系形势发展的新变局，提法正式诞生于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2022 年 3 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2 年 10 月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纲领。

（一）提法的诞生与反响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首见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涉台部分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1]2022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政府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涉台部分指出：“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我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2]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动祖国统一大业。”^[3]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正式进入对台工作话语体系后，被对台工作部门负责人、发言人频频提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将其作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则在多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及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2022 年 7 月 7 日，刘结一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进一步总结提炼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主要内容，概括它的划时代重大历史、理论与实践意义。这篇文章指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对台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

陈桂清.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81-93.

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 70 多年来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认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现实与理论意义, “强化塑造了统一大势, 将祖国统一进程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丰富发展了党中央对台大政方针, 开辟了国家统一理论新境界”,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 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4]。

与此同时, 大陆有关媒体展开专题宣传。2021 年 12 月 21 日, 新华社新媒体推出《促成国家完全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权威专家谈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5], 采访朱卫东、王英津、周叶中等 3 位涉台专家, 分“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蕴含澎湃活力动力”三个部分进行阐述。2022 年 1 月 19 日, 新华网刊发《五组关键词读懂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6], 通过采访两岸涉台专家学者、台胞、台青进行解读, 以“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结束政治对立、实现持久和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反对‘台独’”“融合发展、共同市场”“文化传承、心灵契合”五组关键词概括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主要内容。

(二) 研究述评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产生后, 立即引起两岸各界高度关注与热烈回响。两岸学者撰文解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阐释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发展完善。

其一, 大陆学者进行初步阐述。2022 年 3 月 4 日, 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刊发王英津教授的《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一文, 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之重要意义、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与阐释。王英津认为, “该方略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内容丰富、主题集中、富有针对性, 勾勒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规划及实施策略”, 包括 12 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 第二, 以人民为中心; 第三, 以新理念为引领; 第四, 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基础; 第五, 以“一国两制”为统一架构; 第六, 以结束政治对立实现政权统一为目标; 第七,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指向; 第八, 以交融发展为推力; 第九, 以协商谈判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为手段; 第十, 以反对“台独”和外部干涉为要务; 第十一, 以国家实力为后盾; 第十二, 以法治为保障^[7]。3 月 9 日, 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刊发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的“两会专访”, 阐述其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与中国共产党对台大政方针关系的理解。杨毅周认为: “‘1·2’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构成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基本框架, ‘总体方略’是‘大政方针’在新形势下的具体落实, 不能撇掉‘大政方针’谈总体方略。”^[8]3 月 10 日, 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刊发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的文章《总体方略要破除孤岛思维》, 解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启示意义。李义虎认为: “‘总体方略’这一措辞出现有着很深的意义和内涵, 启示我们在研究台湾问题的时候要更深入、更全面, 既要超脱孤岛思维, 也不能自陷大陆思维, 要在更广的胸怀、更大的格局上看台湾问题。”^[9]

其二, 台湾学者密集解读。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撰文称: “年底中共廿大将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来解决台湾问题。”^[10]亚太和平基金会前董事长赵春山从“中国的历史观”“中共的发展观”“共产党人的战略观和策略观”三个角度观察, 认为“中共对台总体方略是‘阳谋’, 不是‘阴谋’, 台湾不能因选举挂帅, 刻意视而不见”^[11]。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称：“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已成为北京对台政策指导思想与战略部署，但总体方略是‘现在进行式’而非‘未来式’，是发展当中的对台政策顶层设计，从实践当中去实现，不是正在研讨一个新方略。”^[12]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受访时表示，“台湾问题已镶嵌进北京‘两个大局’，不再是孤立议题”，“总体方略会是中共对台的‘顶层设计’，包括对台战略与思维，如一中原则、‘一国两制’、两制台湾方案、九二共识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台政策将整合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等。时间轴上，涵盖统一前、过渡、统一后等”，预计二十大后具体内容将会明朗^[13]。此外，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邵宗海、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竞、《联合报》总主笔黄年、《新新闻》总主笔郭宏治等台湾学者、媒体工作者，亦发文评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从其与过去中国共产党对台大政方针的关系、新的时代内容等角度进行解读。

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历史形成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台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年度对台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台办负责同志的表述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提法诞生前经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两个交替发展阶段。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2014 年 9 月，时任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求是》杂志发表《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文章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连续性基础上，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大势，就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引领对台工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丰富发展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14]。

但是，这一提法并未定型。2015—2018 年，对台工作部门未再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多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提法。直至 2019 年 1 月刘结一在《求是》杂志发表《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时，再次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提法。文章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 1949 年以来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及实践，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针政策，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5]2019 年 12 月 12 日，刘结一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文章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新变化，深刻总结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

陈桂清.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81-93.

针及实践, 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重要理念、方针政策, 形成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16]此后, 刘结一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反分裂国家法》实施 15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20 年 11 月 6 日在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 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两度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2019—2021 年对台工作会议连续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提法。2019 年 1 月 22 日,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2020 年 1 月 19 日, 汪洋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2021 年 1 月 17—18 日, 汪洋再次强调“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提法首次出现在 2016 年对台工作会议。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提法标志着党中央开始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理论提炼。此后的 2017 年对台工作会议、2018 年对台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都被提到。俞正声、汪洋先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并将其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其一, 理论概括初步形成。2017 年 10 月 18 日, 张志军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台内容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充分肯定了过去 5 年对台工作取得的新进展, 在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 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理念、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和主要措施, 体现了我党对台大政方针一以贯之的坚定性、与时俱进的开创性, 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要求, 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做好新时期对台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7]10 月 24 日, 张志军在中共中央台办召开传达学习十九大精神大会上重提这一概念。以上两次讲话虽未直接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概念, 但已出现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初步理论概括, 界定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定位。

其二, 理论概括持续推进。2018 年 2 月 14 日, 张志军在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2018 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18]此次讲话首次界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两大政治定位。2018 年 3 月, 中共中央台办理论中心组在《求是》2018 年第 6 期发表《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对台工作》, 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提炼作了新提升。此文明确提出: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9]

党的十九大前后，为宣传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成就，梳理概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台工作中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台湾网、央广网等媒体接连推出“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解读”系列文章，香港中国评论新闻出版社策划出版《习近平对台思想研究》著作。不过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名称并未固定，有的媒体、学者在报道解读过程中亦交替使用“习近平对台思想”“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习近平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等提法。

经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铺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自觉逐渐形成、理论概括初步产生，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提炼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创造了条件、做了准备。

三、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包含“新时代”“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三个关键词。“新时代”界定这一理论的时代背景。“新时代”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台湾问题”界定这一理论的类型范围，它专门指党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成果。“总体方略”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构成，界定该理论的基本属性，是这一理论的落脚点。

具体来看，“总体方略”包含“总体”“方略”两个词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解释，“总体”指“若干个体所合成的事物；整体”。此处的“总体”应为“整体”。“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放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一语境中，其指“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全部”。“方略”为“全盘的计划和策略”。可见“方略”包含“全盘”“计划”“策略”三层意思。“全盘”指“全部的、全面的”。由此可见，“方略”已包含“全部”概念，与“总体”概念重叠。将“总体”加在“方略”前，应主要是为区分人们习惯使用的“基本方略”。“计划”指“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在对台工作语境中，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台工作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策略”指“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此概念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第二，行动方针；第三，斗争方式。可见，“总体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台海形势制定出来的。在当前对台工作语境中，其必然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以及台海地区形势发展变化的“区域形势”。“方针”指“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与目标”，在此指的是引导祖国统一事业前进的方向与目标；“方式”指“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在此指的是推动祖国统一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

总体来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与台海形势发展变化，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全部方面的，包含方向方针、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步骤路径等诸多内容的思想理论。新时代党解

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内容丰富、体系完整, 包含“统一目标论”“统一依靠论”“统一指引论”“统一理念论”“统一原则论”“统一路径论”等方面的核心内涵, 全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任务、基础条件、精神指引、方法理念、方针原则、手段路径等重大问题, 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统一理论的完整思想体系。

（一）“统一目标论”：以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式统一为追求目标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创造性提出“心灵契合式统一”目标, 赋予“统一目标论”新内涵。2014年9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 “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19]此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党的十九大报告、《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心灵契合”目标, 并将“实现同胞心灵契合, 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作为对台工作重要任务。这些重要论述首次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作为国家统一追求的目标, 突出强调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 增进共同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台湾问题产生历史背景的深刻了解, 丰富发展了国家统一理论。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清晰阐述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相互性, 提出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具体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 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 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陆13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 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20]这一重要论述呼应“一国两制”的核心意涵, 阐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双边性”“相互性”, 说明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绝不是祖国大陆的单方面迁就, 而是双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 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加深相互理解, 增进互信认同。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 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 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亲人之间, 没有解不开的心结。久久为功, 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21]由此可见, 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首先需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 秉持相互学习、相互包容态度开展交流对话, 然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站在对方角度, 秉持同胞情、同理心, 看待两岸差异、理解对方诉求, 进而达到“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的阶段性生活目标。在此过程中, 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如果没有正确的“三观”, 很难达成心灵契合目标。

（二）“统一依靠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靠祖国大陆发展进步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科学回答了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事业“依靠谁”的问题, 提升了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规律性认识。

其一, 推进祖国统一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条基本方略, 是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政治原则。对台工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必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对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对台工作牵涉面广, 涉及统战、宣传、军事、外交、经贸、文化、法制、国家安全、公安等各个方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够调动各方面资源, 顺利推动对台工作向前迈进。新时代对台工作任务艰巨, 既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又面临台

海地区复杂严峻形势，更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主心骨”“压舱石”和“定盘星”根本作用，才能推动新时代对台工作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

其二，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综合实力较量的过程，根本上取决于祖国大陆自身发展进步。2015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22]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规律和两岸关系发展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与实现祖国统一的逻辑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国家统一理论中“统一依靠论”认识。此论断的提出再次统一党内共识，回答解决台湾问题“到底依靠谁”的问题，深化对台工作中“保持自身发展势头”与“采取正确政策措施”辩证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三）“统一指引论”：以完成历史任务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号召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科学回答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时代命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担当，彰显中国共产党擘画祖国完全统一蓝图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

其一，再次将解决台湾问题上升到“党的历史任务”高度进行部署。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23]2021 年 10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24]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3]从历史任务的角度来看待、规划、部署对台工作，饱含中国共产党人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博大深邃的历史眼光和着眼长远的战略自信，彰显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决心与坚强意志。

其二，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谋划祖国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21]，“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25]，“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21]。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述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辩证关系，清楚揭示国家统一的必然性问题，回答“为什么要实现国家统一”“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为什么一定能够实现”等重大问题，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历史根源的深刻认识、对国家统一的高度历史自信。

（四）“统一理念论”：以人民为中心、“两岸一家亲”与“两岸命运共同体”

其一，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27]，“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21]，着重强调“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

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宗旨”^[28]。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治国理政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居于基础性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将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作为对台工作的“着眼点”“落脚点”与“宗旨”, 体现对台工作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 彰显对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关心关怀, 展现对台湾同胞最大的善意和关爱, 构成对台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二, 贯彻“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人”理念。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系统阐述“两岸一家亲”理念的来源, 提出贯彻“两岸一家亲”理念的工作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29], “两岸同胞一家亲, 植根于我们共同的血脉和精神, 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30]; 阐明“两岸一家亲”既由生物学上的共同血脉决定, 也由精神层面上共同历史文化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21]。此论述提出贯彻“两岸一家亲”理念的三点要求: 一是需要相互尊重, 尊重“台湾现有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 二是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三是“家里的事家里人商量着办”, 也就意味着不需外人插手, 排除外部干涉势力。“两岸一家亲”理念立足两岸同胞密不可分的血脉亲情和前途命运, 具有深厚历史情感, 既客观理性面对两岸关系历史与现实, 又设身处地考虑台湾同胞心态和感受。

其三, 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两岸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印证的, 也是现实存在的, 更是未来昭示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是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透过近代历史风云, 两岸同胞深刻体会到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31]。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显示, 台湾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两岸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生动现实。祖国衰弱, 两岸同胞共尝国耻; 祖国强盛, 两岸同胞共享荣光。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示, 两岸利益相关、命运相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就共享和平发展红利; 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两岸同胞就共担冲突加剧的风险。展望未来, 两岸同胞同样命运紧紧相连。统一后,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将进一步增强, 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将进一步提升。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 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 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五）“统一原则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与一个中国原则

其一,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这一基本方针与制度安排, 加强阐述“一国两制”优越性, 创造性提出“两制”台湾方案构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表示: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我们认为, 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32]此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党的二十大报告等场合重申“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体现了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提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21]。

这些论述阐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包含的智慧、带来的好处，描绘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的光明前景，展示出中央对台政策的包容性及“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21]。首次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与“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对和平统一后“一国两制”在台实现形式进行规划，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

其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关乎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程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回答的是国家统一的性质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本原则。”^[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28]

这些重要论述清晰阐述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突出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的重要作用。在对台工作具体实践中，坚持“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体两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它表明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24]，严肃指出“台独”危害性与严重后果。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对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分裂国家活动，13 亿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都绝不会答应”^[33]；声明“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23]。这些重要论述展现出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坚定信心与强大实力，表明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六）“统一路径论”：通过两岸融合发展与民主协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其一，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理念并进行系统理论阐述。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讲话中郑重提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全面系统阐述两岸融合发展的具体内涵、实施路径、工作目标，宣布“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

陈桂清.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81-93.

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 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 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21]。2019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两岸要应通尽通, 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29]。2021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34], 进一步充实两岸融合发展论述。

两岸融合发展理论是成系统的理论创新。从领域看, 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从内容看, 包括“同等待遇、经济合作制度化、应通尽通、文教医疗社保资源共享、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三化’”。从地域看, 既包括“全面铺开”, 在全国各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也包括“重点突破”, 突出在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从目标看, 是为“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从定位看, 是“统一前阶段”“和平发展的进阶”。从路径看, 有“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两岸融合发展理论把握了两岸同胞以心相交、增进认同的关键, 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明确了努力目标和方向, 提出了当前一段时间发展两岸关系的内容和路径, 对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

其二, 提出民主协商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着眼长远,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 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35] 这表明祖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态度、积极立场, 凸显出两岸政治分歧解决的必要性、必然性, 指明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基本思路 and 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明愿意协商对话的态度,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积极态度与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国共两党可以就此进行探讨”; “我们郑重倡议,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 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 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并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 广泛交换意见, 寻求社会共识, 推进政治谈判”^[23]。这些论述清晰阐明民主协商的政治基础、协商内容、协商方式、协商对象, 描绘以民主协商方式完成统一的美好蓝图。

四、结语

通过回顾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诞生过程, 总结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核心意涵发现,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境界高远、逻辑缜密、内涵丰富。这一重大思想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实践中形成的最新理论结晶, 是70多年来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历史经纬和岛内社情民意的深入体察, 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大局和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全面把握。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引领下,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2]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二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N]. 人民日报, 2022-03-13 (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4] 刘结一.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N]. 人民日报, 2022-07-07 (9).
- [5] 促成国家完全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权威专家谈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EB/OL]. (2021-12-22) [2022-08-03]. http://www.news.cn/tw/2021-12/22/c_1128188658.htm.
- [6] 五组关键词读懂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EB/OL]. (2022-01-19) [2022-08-03]. http://www.news.cn/tw/2022-01/19/c_1128277256.htm.
- [7] 王英津. 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EB/OL]. (2022-03-04) [2022-08-03]. <http://220.194.47.118/doc/1063/1/3/3/10631334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6313349&mdate=0304001959>.
- [8] 两会专访: 杨毅周析党对台总体方略 [EB/OL]. (2022-03-09) [2022-08-03]. <http://bj.crntt.com/doc/1063/1/7/8/106317821.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6317821>.
- [9] 李义虎: 总体方略要破除孤岛思维 [EB/OL]. (2022-03-10) [2022-08-03]. http://bj.crntt.com/doc/1063/1/8/1/106318103_2.html?coluid=93&kindid=19311&docid=106318103&mdate=0310153714.
- [10] 苏起. 中共将单方面处理台湾问题 [EB/OL]. (2022-01-21) [2022-08-03].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6048960>.
- [11] 赵春山. 解读中共对台总体方略: 三个观察点 [EB/OL]. (2022-01-26) [2022-08-03].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20126003700-262104?chdtv>.
- [12] 张五岳. 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是“现在进行式”而非未来式 [EB/OL]. (2022-03-05) [2022-08-0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305701960-260409?chdtv>.
- [13] 两会前瞻/两个大局 嵌进对台方略 [EB/OL]. (2022-03-03) [2022-08-0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2229/6136006>.
- [14] 张志军. 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J]. 求是, 2014 (18): 17-19.
- [15] 刘结一. 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B/OL]. (2019-01-16) [2022-08-03].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1/16/c_1123987051.htm?short_encode=iiQ7j2.
- [16] 刘结一. 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N]. 人民日报, 2019-12-12 (9).
- [17]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十九大报告为新时期对台工作指明方向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10-21 (4).
- [18] 张志军出席海研中心 2018 年兼职研究员会议 [EB/OL]. (2018-02-24) [2022-08-03]. http://www.taiwan.cn/xwzx/la/201802/t20180224_11926703.htm.
- [19] 中共中央台办理论中心组.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对台工作 [EB/OL]. (2018-04-08) [2022-08-03]. <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8/0408/c415590-29912774.html>.

陈桂清.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81-93.

- [20]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 [EB/OL]. (2014-09-26)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1354.htm.
- [21]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 [22] 习近平强调: 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EB/OL]. (2015-03-04)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4/c_1114523248.htm?isappinstalled=0.
- [2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24] 习近平. 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10 月 9 日) [N]. 人民日报, 2021-10-10 (2).
- [2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2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8-12-19 (2).
- [2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7 月 1 日) [N]. 人民日报, 2016-07-02 (2).
- [27] 习近平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EB/OL]. (2019-03-11) [2022-08-03].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9/03/11/ARTI1552262644388103.shtml>.
- [28] 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 [EB/OL]. (2015-11-07)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846.htm.
- [29] 习近平: 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 [EB/OL]. (2015-03-28) [2022-08-0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8/c1024-26764814.html>.
- [30]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 [N]. 光明日报, 2014-02-19 (1).
- [31] 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 [EB/OL]. (2018-07-13)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7/13/c_1123123392.htm.
- [32]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 [EB/OL]. (2014-09-26)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1354.htm.
- [33]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EB/OL]. (2016-11-01)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1/c_1119830924.htm.
- [34]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 and 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EB/OL]. (2021-03-25)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25/c_1127254519.htm.
- [35]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萧万长一行 [EB/OL]. (2013-10-06) [2022-08-03].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6/c_117603401.htm.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民进党打“宗教牌”谋“独” 的动向、原因及影响

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 要：2016 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针对台湾社会宗教活动盛行、信徒人数众多、宗教团体组织动员能力强的特点，试图打“宗教牌”谋“独”。民进党当局搭美“反华便车”，跟风炒作涉疆、涉藏等敏感议题；投放政经资源，与特定宗教团体构建“利益联盟”；利用当政地位，大肆推行宗教“去中国化”政策；鼓吹所谓“宗教自由”，与外部反华势力合流。民进党当局频打“宗教牌”，意在利用“宗教牌”升级“文化台独”路线；为赢得政党竞争谋取选举利益；以“宗教自由”为借口构筑所谓美台“价值同盟”。民进党当局利用“宗教牌”谋“独”的政治行径，“绿化”台湾政党政治生态，扭曲台湾民众文化认同，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势，强化美西方畸形反华社会氛围，破坏台海和平与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其消极影响与潜在危害必须高度警惕。针对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行径，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对台大政方针，既要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图谋，又要团结台湾同胞共谋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

关键词：台湾问题；民进党；“宗教牌”；“台独”；两岸关系；妈祖信仰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094-11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6.009

作者简介：韩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用格式：韩冰. 民进党打“宗教牌”谋“独”的动向、原因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94-104.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地区的宗教与政治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外来殖民者, 还是封建统治者、国民党当局和民进党当局, 都采用各种手段利用宗教信仰维护自己的统治。”^[1]目前, 台湾地区的宗教依旧保持蓬勃发展态势, 且在政治、社会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据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 台湾现有宗教类别登记在册者多达 22 种, 佛教寺庙、道教宫庙以及基督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合计 15 175 座^[2]。台湾地区有关研究机构 2019 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台湾民众没有宗教信仰者仅占 13.2%, 信仰民间宗教者占 49.3%, 信仰佛教者占 14%, 信仰道教者占 12.4%, 信仰天主教者占 1.3%, 信仰基督新教者占 5.5%^[3]。佛教、道教、妈祖信仰等在岛内宗教界占据主流地位, 为台湾民众提供精神庇护和心灵慰藉, 在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手足情谊方面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不过, 由于“台独”分子长期组织串联、宣传鼓噪, 岛内也出现了以“万佛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为代表的“台独”宗教组织。在民进党兴风作浪之时, 个别宗教团体数次走向前台, 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打手。

针对台湾地区宗教现象丰富、社会功能多元、统“独”因素交织的历史与现状, 学界对台湾宗教的考察与研究呈现视角多维化、议题精细化趋势。一是着眼台湾宗教全景的研究。卢云峰、李丁在题为《台湾地区宗教的格局、现状及发展趋势》调研报告中, 概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在台湾地区宗教多元治理结构中, 宗教界出现的新变化^[4]。魏乐博(Robert P. Weller)在《全球宗教变迁与华人社会》一文中, 考察了江苏和台湾两地宗教在全球化变迁中体现出的世俗化、理性化及“躯体化”等特点^[5]。何绵山在专著《台湾民族与宗教》中, 介绍了台湾主要宗教基本情况, 强调“宗教在台湾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6]。二是台湾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林国平主编的《当代台湾宗教信仰与政治关系》一书, 从历史视角出发, 对台湾“解严”前后一段时期, 台湾政教互动关系作出详细描述。林雄辉在文章中分析台湾主要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政治倾向, 认为台湾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7]。三是聚焦宗教与两岸关系的研究。刘智豪通过考察两岸神祇联谊会开展宗教交流的现状和成效, 讨论了如何更好发挥两岸各神祇联谊会中介作用、促进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问题^[8]。徐步军在题为《蔡英文当局推行民间信仰“去中国化”动态分析》的文章中, 对蔡英文上台后肆意推行台湾民间信仰“去中国化”的做法、危害作出阐述^[9]。易静对民进党勾连“藏独”势力, 支持纵容后者危害两岸关系的做法予以揭露^[10]。四是基于社会调查的量化研究。刘子曦以“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简称 TSCS)数据为基础, 分析台湾宗教信仰在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传递模式, 发现“台湾地区的社会变迁历史造就了不同信仰在时期、世代和年龄分布上的明显差异”^[11]。杜满、胡安宁利用 TSCS2009 的数据, 对台湾宗教信仰的阶层结构及宗教信仰与两岸关系认同的关系作出研究, 指出“相较于无信仰的教徒, 制度化宗教信仰介入政治的可能性更大, 且在两岸关系认同上更趋消极, 而民间宗教信徒则没有这种显著差异”^[12]。姜韬、易亮基于 TSCS2004 与 TSCS2014 的数据, 考察 10 年间台湾民众宗教信仰与国族认同、政党偏好、政治兴趣、抗争意识这四项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演变, 发现“天主/基督教徒长期抱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关怀, 其他群体则基本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13]。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学者在研究台湾宗教时多将关注点放在整体描述或个别微观议题

上,部分文章虽对“台独”分裂势力染指宗教、煽惑民众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与危害予以讨论,但缺少对民进党当局 2020 年以来发力打“宗教牌”推行“台独”政治图谋的系统全面研究。因此,本文以民进党当局利用“宗教牌”推动“台独”活动的动向为切入点,梳理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的主要行径,分析其背后原因和消极影响,重在从这个角度阐明“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的基本事实^[14]。

二、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动向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民进党就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合流,在岛内推动“台独”活动。2000—2008 年,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也屡借宗教为“台独”造势。2016 年,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当局针对台湾社会宗教活动盛行、信徒人数众多、宗教团体组织动员能力强的特点,在宗教领域大肆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意欲煽动岛内民粹、挑起两岸对抗、巩固自身执政基础。当前,民进党当局又以美西方操控的“民主对抗威权”意识形态斗争叙事方式为模板,打着“宗教自由是普世人权”的政治幌子,在岛内及国际社会频繁利用宗教进行“台独”活动,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一) 搭美“反华便车”,跟风炒作涉疆、涉藏等敏感议题

2021 年 1 月,拜登就任美国第 46 任总统后,接力升级特朗普时期对华强硬政策,将“中国是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极端认知作为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逻辑起点,把人权议题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屡借“新疆牌”“西藏牌”抹黑中国,企图滋扰破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美国及盟友罔顾事实,纵容政客不断抛出充斥政治偏见的谬论,支持国会密集颁布法案、发布报告,肆意扭曲中国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引导西方反华学术机构、智库、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散布涉疆、涉藏虚假新闻报道,妄图通过操纵涉疆问题、涉藏问题,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遏制打压。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为:拜登 2021 年 10 月在公开演讲中将中国治疆政策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2021 年 12 月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2022 年 4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21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诬称中国政府对新疆与西藏少数民族群体进行“系统性镇压”;等等。在此过程中,民进党当局主动配合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领域强化“反中认知战”,打着“宗教自由”旗号,紧跟美国“遏中”战略布局,利用手中执政资源黏合“藏独”及新疆分裂势力,为美西方纠集胁迫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遏中”战略布局制造借口,企图以此在台湾岛内以及国际社会进行双重“抗中”动员,为其谋“独”行径争取“国际同情”。

一是在立法机构建立“涉疆”“涉藏”次级团体勾连外部势力。2020 年 7 月,民进党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刘世芳等人在台立法机构成立所谓“西藏连线”,声称“要与国际社会共同支持西藏自由、人权、民主”。2021 年 4 月,民进党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林楚茵、范云联手 30 多名绿营政客,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成立所谓“维吾尔连线”。7 月,该团体同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人权促进会”联手举行所谓“维吾尔议题国际在线听证会”,并撺掇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和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及美共和党籍众议员佩里、美共和党籍参议

员卢比奥等人参加活动。

二是公开勾结岛内“藏独”势力高调进行分裂活动。2020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屡以视频方式让达赖喇嘛为台湾信徒“讲法”,诱使长期在台湾地区活动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等“藏独”组织趁势在岛内政坛高调亮相。2022年3月,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策划的活动中,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人权委员会”与“西藏连线”共同公开发表所谓“谴责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声明”,民进党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王定宇、范云等人,恶意攻击大陆在西藏进行所谓“宗教迫害”。6月,台湾当局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田中光、文化事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萧宗煌等参加所谓“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行的活动。田中光公然宣称“台湾坚定支持‘西藏自决’跟‘宗教自由’”,“台湾与西藏是共享宗教自由与人权民主价值的最好伙伴”。9月初,民进党当局又纵容“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等“藏独”团体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公开举办所谓“西藏民主日”,“藏独”分子边巴次仁、民进党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洪申翰、林楚茵等人,公然妄称“台藏必须坚持同一阵线,坚定维护民主、自由价值”。

三是污蔑大陆在新疆、西藏实行所谓“宗教迫害”。2019年5月,蔡英文就以美西方反华势力编造的政治谰言和虚假信息为依据,在“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上妄称“藏传佛教受管控,维吾尔族穆斯林被送进‘再教育营’”。2021年3月,随着美西方国家炒作新疆棉花议题,蔡英文跟风抹黑、诬蔑大陆,在社交媒体发文妄称“停止压迫才能化解国际质疑与对立冲突”。2022年5月,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参访新疆,批评美西方炮制谎言破坏中国内部团结。对此,民进党放话称“BBC、彭博社等多家外国媒体已掌握对岸迫害少数民族的铁证”,洪的新疆之行是“为中共搽脂抹粉、洗白辩护”。9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在与法国参议员见面时,妄称中共“迫害”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伤害自由、民主与人权”。

(二) 投放政经资源,与特定宗教团体构建“利益联盟”

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台湾佛教界、道教组织、民间宗教团体均有一定政治背景。“不论是台湾宗教团体还是地方传统宫庙,已高度政治化,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支持不同的候选人,而且信众结构也逐步从‘蓝大于绿’向‘绿大于蓝’转变。”^[15]民进党当局为推动岛内宗教力量政治光谱持续“由蓝转绿”,肆意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经济、舆论等资源,以向“亲绿”宗教团体输送利益、恐吓参与两岸民间宗教交流活动的人士的软硬两手策略,竭力扩张民进党绿色“宗教版图”,妄图侵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绑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亲绿”宗教势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台湾对外关系局势动荡影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逐渐强调对政治的“关怀”,“不仅关切岛内的政治状况,也关心台湾国际地位的问题,进而发表政治性的三大宣言”^[16]。除政治立场契合民进党“台独”路线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组织架构完整、自身管理严密,教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较一般宗教团体强,更加容易接受教会神职人员的政治动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此成为民进党当局极力争取的“台独”盟友。不过,由于台湾宗教团体多将关注点放在发展信徒、开展慈善等事务上,鲜少直接公开涉足政治活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毫不掩饰自身“激进台独”立场,积极主动介入政党政治的做法,使其深陷“醉心政治”“无力见证福音”等舆论旋涡。2020年,蔡英文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导致民进党当局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关系一度出现裂隙。民进党

当局为巩固自身“宗教基本盘”，主动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放舆论资源，积极修补双方关系。2022 年，蔡英文连续出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主办的“彭明敏教授百岁纪念礼拜”“纪念马偕来台宣教 150 周年联合庆典礼拜”等公开活动，在讲话中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唱赞歌，反复宣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等论调，竭力提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社会形象，以此博取后者支持，企图为巩固双方“台独”政治同盟基础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拉拢“一贯道”蚕食蓝营“宗教地盘”。近年来，受现实政治风向、自身诉求变化等因素影响，“一贯道”与国民党传统“同盟关系”出现松动。民进党为扩大“台独”票仓，向拥有近百万信众的“一贯道”伸出橄榄枝，企图使这股宗教力量“由蓝转绿”。蔡英文连任后，利用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频繁挑拨“一贯道”与国民党的关系，称“‘一贯道’在过去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诸般打压”，并主动对“一贯道”进行表彰、拔高其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2020 年 10 月，蔡英文出席“‘一贯道’祖师纪念馆白阳圣庙落成典礼”，在公开讲话中称“‘一贯道’是政府深化民主、促进祥和社会的重要伙伴”。12 月，蔡英文又出席了“‘一贯道’师尊师母同领天命 90 周年感恩纪念大会”，宣称“‘一贯道’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为台湾带来许多稳定的力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示好，“一贯道”亦予以积极反馈。2022 年 9 月，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成立“宗教后援会”，“一贯道总会”的“荣誉总顾问”汤文万亲自出马担任该后援会的召集人。

（三）利用当政优势，大肆推行宗教“去中国化”政策

在台湾现行选举制度下，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民间宗教团体对信众拥有较强影响力，成为岛内各种政治势力拉拢、争取的对象。近两年，民进党当局为捞取现实选举利益，竭力加强对台湾宫庙的控制，全面推行宗教“去中国化”政策，企图构建台湾宗教所谓“主体性”“自主性”，进一步“独化”台湾宗教。

一是“矮化”“丑化”来自大陆的神祇，拔高“台湾信仰”。为达到彻底切割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的政治目的，民进党当局强势利用“政治力”，栽赃两岸同胞共同祭祀轩辕黄帝做法，声称大陆“运用特定台籍人士进行政治操作与‘统战’宣传”^[17]，还污蔑郑成功屠杀台湾少数民族群体，并以此为借口不再安排台湾地区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官员主祭延平郡王^[18]。此外，民进党当局以强化台湾“本土信仰”、美化日本殖民历史等方式，侵蚀中华文化在台湾社会的主体地位，为建构所谓“台湾信仰”“台湾认同”“台湾民族”累积意识形态动能。

二是分化台湾民间宗教团体，为“台独”服务。民进党当局为抢夺岛内妈祖信仰的主导权，长线扶植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打压“亲中”的台中市大甲镇澜宫，通过前往拱天宫拜庙、进香、赠匾等方式，人为在拱天宫与镇澜宫之间制造区隔。2022 年 4 月，民进党当局对外以镇澜宫财务状况不明、颜清标董事长资格不符等为借口，拒绝参加镇澜宫组织开展的活动，创下岛内政治人物参与镇澜宫妈祖绕境活动阵容最冷清纪录。时隔仅一个月，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不顾台湾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连续第 4 年前往苗栗参加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民进党当局扶植特定妈祖宫庙，企图让宗教为“台独”政党利益服务的企图昭然若揭。

三是诋毁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宗教交流的人士。早在 2013 年，蔡英文麾下的智库“小英教育基金会”网站即转载研究报告称，“中国要借妈祖信仰串起一个概念，通过宗教告诉你：你是中国人”。2019 年，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在广播节目中公开诬称大陆利用宗教系统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

“争取台湾民心”。2020年以来,针对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宗教交流的颜清标、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等人,民进党当局动员亲绿媒体给其贴上“信仰买办”标签,并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司法”资源,以威胁、恐吓等手段实施“绿色恐怖”^[19]。

(四) 鼓吹所谓“宗教自由”,与外部反华势力合流

当前,宗教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一些政客“对所谓‘宗教自由’的关注开始渗入美国传统外交建制的文化之中”^[20]。民进党当局利用该趋势,打着“宗教自由”旗号谋求外部势力支持。

一方面,民进党当局通过“台湾普世论坛”“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等区域性宗教活动,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价值同盟”升级美台关系,充当美国宗教版“印太战略”主攻手,幻想通过打“宗教牌”推进“政治台独”^[20]。2022年8月,蔡英文参加由台湾地区对外事务主管部门、“台湾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在台协会”共同举办的“2022年区域宗教自由论坛”,声称“专制政权压迫宗教自由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台湾致力保护推进宗教自由”。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官员频繁亮相各类国际性“宗教自由论坛”,在国际社会大肆宣扬台湾“民主价值”受到大陆威胁,配合美西方进行反华政治操作。2020年11月,台湾对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参加美国务院举办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妄称“台湾要与理念相近国家和地区共同捍卫信仰自由”。2021年7月,台湾所谓“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主办的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时妄称,“台湾安全受到中国严重威胁,全世界应共同维护台湾”。2022年7月,台湾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兴·大立,在英国举行的“宗教信仰自由部长级国际会议”上,公开标榜台湾的所谓“宗教自由为区域自由、民主及和平作出了贡献”。

三、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原因

台湾与大陆分隔70余年,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同文、同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未割断,要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愿不断上升。民进党当局为破坏两岸关系,别有用心地操弄岛内民粹,妄图通过打“宗教牌”煽动台湾民众“恐中”“仇中”“反中”情绪,并以此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活动。

(一) 利用“宗教牌”升级“文化台独”路线

仔细考察台湾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在台湾长期发展且较为盛行的佛教、道教、妈祖信仰等宗教,源头皆在大陆。这些宗教信仰深深根植岛内民众的集体意识,成为规范其道德伦理、社会行为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欧美及日本等地陆续传入的基督新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信徒人数在岛内人口中所占比例始终不高,其承载传递的意义系统也没有完全融入台湾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宗教具有社会聚合功能,并且是巨大的社会资本。宗教从信徒的价值观、行为取向、群体归宿等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整合资源所需的载体和动力。”^[21]在某种程度上,台湾同胞传承、弘扬的佛教、道教、妈祖信仰等中华传统宗教文化,成为构筑其“大一统”价值理念、强化自身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台湾学者指出:“具有宗教内涵的‘道统’论,很容易过渡到政治意义的‘大一统’。‘道统’论背后所预设的‘文化中国’”,“足以发展为‘政治

中国’ ”^[22]。

同时，台湾与大陆民间开展的宗教交流也是促进两岸同胞沟通骨肉亲情、强化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两岸妈祖信仰交流即是明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严令禁止岛内民众赴福建湄洲拜谒妈祖祖庙，但仍有部分台湾同胞不顾殖民者禁令，毅然跨海前往大陆进香谒祖。1987 年，台中大甲镇澜宫信众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奔赴湄洲妈祖祖庙参加“千年祭”活动，成功打破了两岸的政治坚冰。1997 年，湄洲祖庙妈祖金身首次赴台展开为期 102 天的巡游，1 000 多万台湾信众夹道欢迎，在两岸交流史上创下多项纪录。2016 年 5 月，民进党上台后，在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加速“去中国化”。然而，其“文化去中”行径无法阻挡两岸妈祖信仰深化交流的趋势。2017 年 9 月，湄洲祖庙妈祖金身再次赴台巡安，受到岛内信众空前欢迎^[23]。

上述历史和现状清晰表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同为炎黄子孙且共享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始终图谋以突显所谓“台湾独特内容”的文化来取代中国文化。“台独”分裂势力“以为只要在主观上不认同中国文化，就可以达到在政治上不认同中国的目的”^[24]。早在成立初期，民进党即凭借所谓“本土政党”出身以及较系统的“本土论述”，不遗余力地向台湾民众灌输、散播“本土”思想^[25]。2016 年，民进党再次上台，为进一步消解中国传统宗教整合台湾社会、为岛内民众提供意义共契的重要作用，彻底否定两岸“人同根、神同源、文化同脉”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现状，变本加厉地在岛内历史、语言、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他们打着“台湾主体意识”的旗号，以所谓“台湾民族”重构台湾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企图通过宗教“去中国化”动作，进一步切断两岸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掩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文化的事实^[26]。

（二）为现实政党竞争谋取选举利益

台湾地区的部分宗教团体“以宗教观念为核心、宗教感情为纽带、宗教组织为外壳”^[27]，掌握对信仰对象与宗教实践的解释权，拥有号召信众共同参与特定宗教活动的权威，逐渐使自身成为岛内社会资本聚集地。这些宗教团体负责人在支配地方人力、物力与资金方面享有较大话语权，又因信众多累积起深厚社会影响力。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仅停留在社会生活范畴，还渗透至政党政治领域。在岛内大型选举活动中，政治人物参与地方宗教活动，成为其竞选造势、塑造自身亲民形象的重要手段。

在台湾地区为数众多的宗教中，信仰妈祖者数量庞大，妈祖信仰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量。岛内媒体观察指出，台湾民众奉祀的神明多达数百种，其中以信仰妈祖者最多，“现行登录为文化资产的 191 项民俗活动当中，至少有 32 项与妈祖信仰相关”^[28]。妈祖作为大多数台湾人信仰的神明，其政治号召力、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近年来，民进党在岛内“全面执政”，掌握丰沛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国民党在野后被清算“党产”，陷入手中“无钱、无权、无资源”的窘境，对地方势力、宗教团体的影响力急剧式微。民进党得以肆意利用“宗教牌”谋“独”，一方面通过参拜特定妈祖宫庙、大开政治支票等方式向信众示好，骗取民众认同，借以散播“台独”理念并捞取选票；另一方面又以政经利益开路，使用狠、准、稳的力道发展、收编民间宗教团体，有计划地“绿化”具有代表性的妈祖宫庙，打造属于民进党自身的妈祖信仰“品牌”，用以填补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在该领域逐渐退出后出现的影响力“真空”。

（三）以“宗教自由”为借口构筑所谓美台“价值同盟”

拜登上台后，美国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对台政策总体上仍以“以台遏华”“以台制华”为基调，并强调美国与台湾共享所谓“自由、人权、法治等民主价值”。民进党当局出于“挟洋谋独”政治私利，恶意攻击大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主动充当美国及其盟友“遏华”战略马前卒。

早在2019年，民进党当局就曾与美国合办所谓“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以此为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站台助威。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从美国第一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衍生出来的‘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将原先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扩展到宗教信仰的领域，这表示，21世纪的国际冲突，将从贸易、领土、矿产、海洋资源……的争夺，发展到信仰的、灵魂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领域。蔡英文最近的谈话，一再强调‘价值同盟’，这是战略上有意识的连结。”^[29]蔡英文开启第二任期后，民进党当局更是在“倚美谋独”道路上大步向前，配合美国在涉疆、涉藏以及宗教、人权议题上升高对抗大陆调门，充当美国及其盟友积极打造的围堵遏制中国的所谓“价值联盟”急先锋。民进党当局把“台湾国际宗教自由论坛”“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宗教信仰自由部长级国际会议”当作政治表演舞台，标榜台湾是“自由民主模范生”；积极附和西方论调，大肆渲染中国大陆“威胁世界宗教自由”；包装掩盖其宣传“台独”思想理念、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的政治祸心。

四、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影响

民进党当局利用“宗教牌”谋“独”，妄图改变台湾民众信仰结构和文化认同，抹黑大陆形象，为“台独”分裂活动制造条件，其消极影响与潜在危害必须高度警惕。

（一）“绿化”台湾政党政治生态

民进党当局主动渗透台湾宗教团体，短期目标是壮大绿营势力，赢取选民认同及手中选票，击垮国民党、民众党等主要竞争对手，继而重构岛内政党政治结构，最终为民进党长期当政铺平道路。目前来看，民进党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民党、民众党等在野党与地方宗教团体的关系，削弱了后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2022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和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的情况下，民进党直接动用“行政”“立法”“司法”手段改造、“绿化”岛内宗教团体，如打击特定宗教人士、扶植“亲绿”宗教势力和宫庙系统，等等。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形同利用执政资源进行“绑桩”政治交易，在宗教团体中培养唯民进党马首是瞻的“代理人”。在未来的“二合一”选举、“九合一”选举等岛内重大政治活动中，这些“代理人”通过发挥自身在选民动员方面的独特优势，配合民进党挤压其他政党在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势必进一步弱化在野党牵制民进党当局操弄“台独”的能力。

（二）扭曲台湾民众文化认同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从大陆传入台湾的历史，深刻揭示了两岸不可分割的人缘和地缘联系。特别是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民间宗教，在台湾地区受到不同族群的欢迎，成为他们共同的守护神，妈祖文化因此成为台湾同胞构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台湾与大陆暂时分隔的时空背景下，两岸同胞以妈祖信仰为依托，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这既增进了两岸同胞血肉亲情、手足感情，也搭建了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桥梁。2016 年 5 月，民进党上台后，以所谓“台湾主体意识”为内核，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加速进行“去中国化”动作，通过抬升“台湾主体文化”的地位，将台湾同胞定义为具有“独立”属性的“台湾民族”。民进党当局妄称台湾妈祖信仰已是“一个以台湾为主体的独特文化体系”，“与大陆完全不同”，并以此为“指挥棒”改写岛内历史、语文教科书。如果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长期受到这种论调的影响，其文化认同将遭到严重扭曲。

（三）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势

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原有沟通协商渠道被迫中断。在这种情势之下，台湾与大陆的宗教交流合作一度成为两岸民间往来的主力。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以“大陆利用宗教实施统战”为借口，“抹红”两岸宗教交流合作，利用“反渗透法”升级对岛内宗教团体的管制，竭力制造“寒蝉效应”。岛内一些宗教团体受到民进党营造和渲染的“绿色恐怖”社会氛围的影响，推动两岸交流的意愿降低、动力下降。此外，民进党当局在打“宗教牌”进行谋“独”活动的过程中，采取了取消遥祭黄帝陵仪式、降低郑成功祭典规格、美化日本殖民历史等极端做法，严重伤害了大陆民众情感。“两岸民意在网络空间发生碰撞，呈现一定程度的对抗态势。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会使得两岸民意更加对立，将不可避免地拉低两岸民间信仰交流的规模与频率，冲淡两岸交流合作氛围，破坏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进程。”^{[10] 45} 在大陆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主动权的前提下，民进党当局上述行径虽不能完全扭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势，但是个别领域交流受阻、部分群体福祉受损的风险有所上升。

（四）强化美西方畸形反华社会氛围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加速演进，热点地区冲突不断升级，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美西方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抱团对中国发起“认知战”，频繁利用媒体炒作所谓人权、宗教议题，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国制度，企图构建所谓“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竞争体系。而民进党当局为实现“台独”政治图谋，主动配合美西方，以扭曲事实、诬陷诽谤、抹黑中伤等手段散播“恐中”“仇中”“反中”政治病毒。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及其盟友伙同民进党当局，妄图在国际上搞政治认同和阵营对抗，要求媒体“只能说中国改变现状、不能说美台破坏台海和平”，“只准抹黑‘一国两制’、不准陈述民进党‘依洋谋独’的事实”。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通过鼓吹种种反华论调，打压客观评价中国的声音，企图树立起“同情台湾”的“政治正确”。这种做法裹挟大量不了解事实和真相的民众盲目加入反华行列，严重破坏相关国家、地区与中国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氛围。

五、结语

“中华民族的壮大与凝聚、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人的生活之持续、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样态的维系，等等，都曾从宗教中吸取过丰富的资源。”^[30]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台湾地域文化也从中华文明的根脉中吸收了丰富的养分。

在思想领域,台湾同胞崇敬祖先、爱土爱乡的情感,崇尚和谐、珍视和平的价值,推崇和合、尊重差异的观念,既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也鲜明体现了中国宗教文化扬善抑恶、平等宽容等积极思想。在现实层面,台湾地区盛行的佛教、道教、妈祖信仰等宗教,作为两岸同胞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长期见证并强化了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竭力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台独”布局,妄图通过打“宗教牌”把政治黑手伸向台湾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意识领域。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在岛内刻意制造两岸民意对抗,人为切割两岸历史文化联结,肆意打压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肆意攻击、抹黑大陆形象,意欲以“媚美卖台”方式换取外部势力支持,借机煽惑台湾民众接受“台独”政党长期执政。

针对民进党当局打“宗教牌”谋“独”的政治行径,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对台大政方针,既要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图谋,又要团结台湾同胞共谋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首先,充分保持实现祖国统一的战略自信 and 战略定力,不被“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带节奏”。其次,有效发挥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军事“组合拳”强大威力,痛击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及西方反华政客,展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再次,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积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宝贵思想。最后,以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有力牵引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在两岸同胞携手挫败“台独”行径、共同铲除“台独”祸根的过程中,汇聚起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 [1] 林国平. 当代台湾宗教信仰与政治关系[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13.
- [2] 宗教信仰在台湾[EB/OL]. (2019-08) [2022-09-14]. <https://www.ey.gov.tw/state/D00B53C98CD4F08F/0fe638e7-c0bf-401e-b9f2-3db11eecd508>.
- [3] 台湾社会变迁统计调查数据库[R/OL]. (2021-05) [2022-08-16].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972.
- [4] 金泽, 邱永辉. 宗教蓝皮书: 中国宗教报告(2011)[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25-252.
- [5] 魏乐博(Robert P. Weller). 全球宗教变迁与华人社会[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48-55.
- [6] 何绵山. 台湾民族与宗教[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221.
- [7] 林雄辉. 台湾宗教及其对政坛的影响[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3): 10-14.
- [8] 刘智豪. 两岸神祇联谊会交流的回顾与前瞻[J]. 现代台湾研究, 2022(2): 58-65.
- [9] 徐步军. 蔡英文当局推行民间信仰“去中国化”动态分析[J]. 现代台湾研究, 2018(2): 40-47.
- [10] 易静. 台湾地区“藏独”及援“藏独”组织的运作[J]. 统一论坛, 2021(3): 17-21.
- [11] 刘子曦. 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 基于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17(7): 193-216.
- [12] 金泽, 李华伟. 宗教社会学: 第4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90-107.
- [13] 姜韬, 易亮. 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度: 管窥10年间台湾政教关系的变迁[J]. 世界宗教研究, 2019(4):

32-42.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N]. 人民日报, 2022-08-11 (5).
- [15] 王建民. 台湾“宗教庙宇政治现象” [EB/OL]. (2019-12-19) [2022-08-27]. <https://www.huaxia.com/c/2019/12/19/530104.shtml>.
- [16] 洪辞惠. 台湾政教关系之研究——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三大宣言为中心 [D]. 台北: “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9: 2.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民进党当局污蔑两岸同胞共祭黄帝典礼令人不齿 [EB/OL]. (2022-04-13) [2022-08-27]. http://www.gwytb.gov.cn/m/fyrbt/202204/t20220413_12426353.htm.
- [18] 54 年首破例 祭郑成功规格降 [EB/OL]. (2017-04-24) [2022-08-27].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24000558-260514?chdtv>.
- [19] 张安乐率人接大甲妈銮轿爆冲突 警方将传唤说明 [EB/OL]. (2022-04-10) [2022-08-27].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204100004.aspx>.
- [20] 徐以骅. “宗教超级秀”——美国“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述评 [J]. 世界宗教文化, 2020 (1): 13-20.
- [21] 徐以骅, 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 109-116.
- [22] 杨惠南. 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 [DB/OL]. (1996-06) [2022-08-16]. <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TAIWAN/md/md03-05.htm>.
- [23] 韩冰. 两岸妈祖文化交流: 回顾与思考 [J]. 统一论坛, 2018 (3): 68-71.
- [24] 陈孔立. 台湾“去中国化”的文化动向 [J]. 台湾研究集刊, 2001 (3): 1-11.
- [25] 林劲. 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分析 [J]. 台湾研究, 2010 (5): 31-36.
- [26] 韩冰. 试析蔡英文当局“文化台独”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危害 [J]. 现代台湾研究, 2018 (1): 51-55.
- [27] 严安林, 盛九元. 台湾宗教活动之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文科版), 1997 (2): 69-76.
- [28] 黄伟强. 从政治力到民间力: 台湾妈祖绕境的时代意义 [EB/OL]. (2020-04-02) [2022-08-25].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mazu-pilgrimage-significance>.
- [29] 林深靖. 当宗教自由成为战略武器——“印太区域”的一个变局 [EB/OL]. (2019-03-13) [2022-08-2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87/article/7847>.
- [30] 孙尚扬. 宗教社会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46-247.

责任编辑: 龚静阳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于镭¹ 于飞洋²

(1.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山东 聊城 252000;

2. 北京建筑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21 世纪以来, 澳大利亚的台海政策经历了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的显著蜕变, 这种变化主要缘于其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这一立国之策在澳有着深厚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基础、长久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澳大利亚通过与超级大国结盟获取了丰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在获利的同时, 澳大利亚不得不对美效忠, 充当美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在“遏制”语境下, 澳大利亚的台海策略紧密地追随美国的外交策略。为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 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一是大肆炒作“台海危机”, 妄谈助力美国“协防台湾”的所谓“同盟条约义务”; 二是屡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 竭力拉升澳大利亚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和半官方互动层级与质量; 三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 竭力拉拢其他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崛起; 四是鼓吹“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 实质性破坏一个中国原则。鉴于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尚有不小的差距, 澳大利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紧随美国的台海政策, 加强对华干涉。我国要坚定战略定力, 不急不躁地按照既定路线稳步增强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综合国力等“硬实力”, 有力反制外部势力干扰国家统一进程。

关键词: 权力体系; 澳美同盟; 中澳关系; 台海策略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6-0105-11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6.010

作者简介: 于镭,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于飞洋,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21 世纪以来,中国同澳大利亚的经贸依存度快速攀升,两国经贸互补高于 80%^[1]。中国自 2009 年以来蝉联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商品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进口商品来源地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2]。在经贸合作屡创新高之际,两国的政治、外交和安全关系却快速下行。2015 年,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急速后退,澳军成为追随美国在南海地区开展所谓“自由航行”的少数国家之一。2016 年以降,澳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再否决中国商业并购,并持续阻挠中国对澳正常投资,致中国对澳投资呈断崖式下跌态势,由 2015 年的 150 多亿澳元急跌至 2020 年的 25 亿澳元。在我国并未对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形下,澳政界、军界却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仅废除与我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而且积极推动美、澳、日、印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流,甚至不断发出追随美国军事介入台海,阻挠两岸统一的叫嚣。中澳两国经济依存度节节攀升,两国经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本应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驱动力,但澳政府和军方为何执意恶化两国关系,甚至在台海问题上由刻意“模糊”策略快速蜕化为意图追随美国阻止中国统一?本文在着力探析这些问题的同时,运用全球权力体系与架构的理论,对澳大利亚奉行的“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展开深度剖析,揭示澳台海策略蜕变的必然性。本文强调澳台海策略蜕变有着强烈的内生性,并非全然源于美国的外部压力,也决非为澳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所左右。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判断若台海局势恶化,澳大概率会追随美国加强对华干涉。

一、澳大利亚对华关系文献梳理

冷战后,澳大利亚对台立场随着中澳关系的演变而发生显著变化。在 1996 年的台海危机中,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唯一公然表态支持美国并派遣军舰至台海地区的国家。伴随中澳经贸合作的密切和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澳大利亚政府随之调整台海策略。但是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澳经济依存的空前攀升及美国将遏制矛头转向中国,澳各界对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其蕴含的台湾、南海、民主、人权等议题的分歧显著扩大,大致可梳理为以下三派。

第一派秉持现实主义观点,对中澳关系特别是对两国经贸依存关系的深化、强化深感忧虑。该派偏执地强调中澳双边经贸关系无论是“体量”还是“有效需求”均存在着有利于中国的“不对称性”。该派人士秉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夸大复合依存中的“不对称性”将会单方面赋予中国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对澳大利亚施加影响甚至“胁迫”的能力,从而制约澳大利亚在诸如台湾、南海等涉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和政策选择范围。这派人士极力渲染“不对称性”将危害澳大利亚广义范畴中的国家安全、地区霸权以及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同盟^[3-4]。秉持该派观点的澳大利亚政界、军界和学界人士因而对于发展包括经贸合作在内的中澳关系持有深深的疑虑,认为其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弊大于利,强调应与美国保持一致,加速与中国“脱钩”并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

第二派则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在全球化和亚洲整体崛起的时代,澳大利亚必须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稳定民众的生活水准。这一主张主要源于两点考量:一是澳大利亚国土来源于对原住民的杀戮和掠夺,缺乏合法性;二是澳大利亚与印尼等亚洲邻国,由于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而一向关系紧张。因此,保持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优于亚洲邻国的军事力量以吓阻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邻国“入侵”, 始终是澳大利亚防卫政策的重中之重。安全与经济的综合考量使该派人士竭力支持对华实行“对冲”策略, 即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以获取经济实惠, 与此同时强化美澳军事同盟, 遏制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全面崛起。他们企图避免中国和亚洲发展对美国主导的地区霸权体系与秩序, 以及澳大利亚基于美国霸权所获得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构成“挑战”。该派观点在 21 世纪初深受霍华德政府的推崇^[5]。但该派也强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决不能以牺牲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为代价^[6]。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威廉·托直言: “在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 必须与美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同盟, 这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石。”^[7]可见, 该派人士显然视美澳军事同盟为“体”、中澳经贸合作为“用”。

第三派则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 澳大利亚应正视这一现实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 以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不致因大国的权力转换而蒙受较大损失。该派人士认为: “视中国崛起为‘零和’竞争”, 不仅“过于悲观, 而且极其危险”^[8]。鉴于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里较好地奉行了和平发展的方针, 有理由相信在不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情形下, 中国主导的亚太地区新秩序是包容的、能够照顾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利益。澳国立大学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休·怀特认为: “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保持军事同盟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会令澳大利亚不战自败。”鉴此, 怀特教授呼吁澳大利亚真心实意地与中国建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敦促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分权”, 因为“这最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 也最符合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9]。

中国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澳大利亚正加速实施追随美国并强化美澳军事同盟的外交策略。澳大利亚此举旨在巩固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太区域建构的“轴辐”军事同盟体系, 维护在亚太地区基于美国军事霸权赋予澳大利亚的既得利益^[10]。因此, 相关研究认为, 不排除澳大利亚有追随美国台海政策、武装介入台海的可能性。一些外交人士和学者, 如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杜起文, 认为鉴于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曾一场不落地加入美国发动的所有对外战争, 澳大利亚大概率会追随美国武装介入台海。

上述文献表明, 中澳在发展双边关系的考量上不仅在短期内无法做到“无缝对接”,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不仅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政界、军界和学界有着较强的“冷战思维”, 更是受到澳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形成的与超级大国结盟以维护既得利益和地区霸权的立国之策的驱动。

二、权力体系理论和澳“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

澳大利亚对台策略不论是在冷战期间抑或冷战后均基于“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 这一立国之策有着深刻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渊源。汉斯·摩根索是西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指出: “国际政治如同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 都是对权力的争夺。”^[11]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任何一国在全球权力体系里的地缘政治作用, 是该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功能性结果^[12]。全球权力架构既是各国“硬、软”实力的产物, 同时各国的“硬、软”实力也决定了他们在全世界体系和地区次体系中的地位。根据各国的“硬、软”实力, 西方学者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 超级大国 (全球体系的主导国家), 区域强国 (全球体

系或地区次体系中的重要国家)和底层国家(全球体系和地区次体系里的弱国)。在全球权力体系里占据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通常既拥有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超强“硬实力”,又具有全球影响的“软实力”。超级大国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软、硬”实力对不服从自己意志的国家采取形象抹黑与妖魔化、经济制裁与贸易禁运、军事封锁与入侵等手段予以惩罚,并以儆效尤,达到增强自身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威权的效果。区域强国和底层国家由于“软、硬”实力有限,不具备逆向或等量逆向作用的能力^[13]。

区域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两重性:相对于超级大国,他们通常居于“从属”地位;但对于底层国家,甚至是对于二流区域强国,他们通常又具有“主导”地位。区域强国通常会以与超级大国保持密切合作、甚至结为同盟为首要战略目标,以确保自身安全,维护并巩固其在全球权力体系和区域次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作为回报,区域强国需对超级大国表现忠心,承担协助超级大国维护全球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现状的义务。区域强国对承担这一义务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因为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有可能调整现有的权力架构体系和利益分配。因此,区域强国协助超级大国打压新兴大国,旨在维护自身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超级大国与区域强国在维护全球特别是新兴大国所在区域的权力体系和等级架构的现状上,有着颇为相似的战略利益。

基于这一理论,澳大利亚出于自身安全和称霸南太平洋地区考量,曾与超级大国英国建构同盟关系。澳大利亚的安全担忧主要源于对原住民土地的掠夺,由于国土来源缺乏合法性,因而担心其他列强会循其例,夺其地,灭其国。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雄心源于“白人至上”的偏见,以为自己的血统较亚太地区其他人种更为“高贵”,因而表现出在南太平洋地区(“后院”)以及东南亚地区(“前院”)建立区域霸权的野心。一战后英国的没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迫使澳不得不寻求与新兴强国美国结盟,并“引美入亚”,以阻止德、日对澳大利亚安全和地区霸权的挑战。二战的爆发终使美澳两国形成战时同盟。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出于和苏联争霸以及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需要,美国急于获得具有广阔战略纵深的澳大利亚的支持。澳大利亚则借机要求美国与自己结盟,为自己提供安全庇护^[14]。美、澳和新西兰遂于1951年9月缔结《澳新美安全条约》,三国同盟暨美澳同盟正式成立。可见,与超级大国结盟的立国之策不仅在澳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而且有着长期的实践基础。

冷战甫毕,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日中天,澳对美国的态度更是亦步亦趋,紧紧追随。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1996年上台伊始,就为美国于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构筑的军事同盟——所谓“轮辐体系(又称旧金山体系)”大唱赞歌,并一再坚称美澳同盟是澳对外政策的基石。为了表现对美国的忠心,霍华德不顾国内外的反对,率先在澳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霍华德对美国亦步亦趋的追随即在美国的西方盟友中也实属罕见。时任澳大利亚外长亚历山大·唐纳对《纽约时报》坦言,此举的最主要原因是体现对美国的“忠诚”,“强化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15]。1999年,“霍华德主义”走向前台,声称澳将在亚太地区扮演维护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副警长”,有权对亚洲邻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16]。澳学者认为,霍华德主义显示,澳不仅要在亚太地区捍卫美国主导下的区域秩序和美国利益,而且要不顾亚太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扩大西方价值观^[17]。霍华德主义因此被亚洲邻国认为是专门针对亚洲的澳版“新干涉主义”,遭到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广泛抨击。香港《亚洲时报》对此批评说:“霍华德主义让澳承担了没有亚洲国家

于镛,于飞洋.“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105-115.

欢迎却广受诟病的义务。”^[18]

霍华德之后的陆克文(2007年12月—2010年6月及2013年6月—9月)、吉拉德(2010年6月—2013年6月)、阿伯特(2013年9月—2015年9月)以及特恩布尔(2015年9月—2018年8月)虽然执政时间均不长,但美澳军事同盟却在不断强化。美澳与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和印太地区出现合流之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作战目标愈发具有兼顾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的特性。霍华德之后的几位总理均向美国保证,澳大利亚愿做美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堡垒,并一再增拨军费扩建美军基地,以加强美澳在两洋地区的军事攻防能力。二是美、澳、日在亚太地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机制化,冷战时期都很少出现的逾万人的大型联合军演在如今的两洋地区却是频频出现。2015年7月,美澳在亚太地区举行了有3万多名士兵参加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19]。2016年2月和4月,美、澳、日等国连续举行万人联合军演。2016年9月,美澳在两洋交汇处的达尔文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为印太区域大规模战争做准备。2017年7月,美澳两军在太平洋区域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表示演习就是要向潜在的敌人“传递一种信息”^[20]。三是尽管“印太战略”迟至2017年底才正式提出,但美、澳、日、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联合军演与军事联动早已呈现出合流之势。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强调澳必须建构“印度洋-太平洋”新的地缘概念,配合美国在两洋的军事部署,确保美国掌控联系两洋的海上航线^[21]。2016年6月,美、日、印在印度洋举行大规模军演,澳表示将于近期加入^[22]。2016年9月,美、澳、日在“印太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印度派出观察员。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澳大利亚不仅坚定地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策略,而且不断配合和推动美澳和美日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合流,并向印度洋地区扩展。澳大利亚之所以对美国如此“忠诚”,是因为美澳同盟确实为其带来了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谓“高端政治(国家安全)与低端政治(经济福利)利益”的双丰收。首先,美澳同盟为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安全保障。它不仅成功地抵御了当年日本的入侵,而且吓阻了澳臆想中亚洲邻国对其领土的觊觎,为这个生活在所谓“亚洲丛林”的白人国家提供了现实与心理的安全保障。其次,美澳同盟为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二战后,大量美资和先进技术助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为澳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奠定了基础。再次,美澳同盟也令美放心大胆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扶持澳,助澳成为亚太地区“强国”。不过,美澳同盟缔结后,澳大利亚不得不追随美国参加了所有由美国发动的战争^[23]。澳坚持奉行超级大国的“铁杆”追随者战略,并非完全是基于澳美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相似性,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量。澳大利亚的“忠心”获得了美国的高度肯定,被美誉为“最忠诚可靠的盟友”。

三、澳台海策略蜕变

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澳仍将继续扮演美国“铁杆”追随者的角色。从西方国际关系权力架构理论的视角分析,这是中美综合国力特别是现阶段军事和高科技实力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的必然结果。即便是从经济视角分析,美国目前仍是澳最大的经济伙伴,而中国仅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由于澳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高度依赖美国,澳才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对美国的“忠

诚”。澳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明证：在 1996 年的台海危机中，霍华德不仅对中国反击“台独”的行动大加批评，而且高调支持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对华“威慑”。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并没有遵照美国意愿“成为另一个日本”，即“经济繁荣、政治侏儒、军事无能”。因此，“阻止一个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传统霸权的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共识^[24]。美国政府和军方因而大肆炒作台湾问题，变本加厉地打“台湾牌”，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企图“以台制华”，遏制中国崛起。为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

一是大肆炒作“台海危机”，妄谈助力美国“协防台湾”的所谓“同盟条约义务”。澳前总理莫里森一改霍华德政府时期形成的政治共识，即台湾问题并不必然导致澳大利亚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25]，转而强调澳大利亚必须在“亚太”和“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维护现有的体系和规则。莫里森在竞选期间大打“台湾牌”，反复鼓吹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仅仅是冷漠的旁观者”，必须加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保护澳大利亚的既得利益^[26]。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阿尔伯尼斯和外长黄英贤多次向美国保证，澳大利亚将与西方国家密切合作确保台海现状稳定^[27]。澳大利亚前总理阿伯特近来不仅在澳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大陆即将“入侵”台湾，鼓吹澳大利亚应在阻止中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作用，而且还竭力挑唆美国出兵“保卫台湾”。阿伯特声称如果美国拒绝出兵保护台湾就意味着向全世界证明美国是不可靠的“晴天的盟友”^[28]。澳大利亚前防长、前外长佩恩更是毫不掩饰地声称，澳大利亚会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因台海问题而与中国开战^[29]。澳大利亚前防长达顿抓住一切时机鼓吹澳大利亚必须坚定地履行《澳新美安全条约》义务，协力美国保卫台湾^[30]。澳军总参谋长安格斯·坎贝尔声称一旦中国实施统一行动，澳军将坚决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与美国及其他盟国一道军事介入台海^[31]。面对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高官的战争叫嚣，澳大利亚媒体甚为担忧地评论说政府和军方的好战分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后再次“擂响战鼓”^[29]。

二是屡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竭力拉升澳大利亚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和半官方互动层级与质量。2021 年 11 月，阿伯特到台湾出席由蔡英文主导的“新南向政策”国际会议。阿伯特发表主旨讲话，公然宣称澳大利亚将在阻止中国大陆所谓“入侵”台湾的进程中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阿贝茨与阿伯特遥相呼应，鼓吹澳大利亚有“义务”保护台湾。阿贝茨叫嚣即使激怒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也应“废除”一个中国政策，并与台湾建立所谓“全面外交关系”^[32]。莫里森政府随后公开宣称台湾是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并与台湾当局签署“澳大利亚同台湾农业合作实施条款”。澳大利亚和台湾当局一道联合举办庆典，庆祝澳大利亚政府在台设立“办事处”40 周年，声称将增强与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合作。澳大利亚媒体分析认为澳大利亚政府的台海政策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两地将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下加强实质性合作与互动^[33]。在美国全力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加强与台湾当局勾连的意图十分明显，旨在配合美国“以台遏华”，阻止中国的全方位崛起。

三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竭力拉拢其他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崛起。澳大利亚政府、军方和智库一致认为：“中国太强大了，澳大利亚不能仅仅依靠美国遏制中国，必须尽可能多地寻找遏制中国的伙伴。”^[33]为此，阿尔伯尼斯政府继续前政府的“印太”策略，一方面积极推动美、澳、日、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印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流, 另一方面意图拉拢越南、印尼等国共同遏制中国。澳大利亚近年来一直积极主动地与日本、印度开展战略对话和联合军事演习, 意图在“印太”地区拼凑具有战略性目标的一体化军事联盟。2015 年, 日澳联手与印度构建了部长级三边会谈机制, 欲在“印太”区域实现政治与军事联动。日本随后高调宣布加入美、印联合军演, 为三方军演从印度洋延伸至太平洋做铺垫。2016 年初, 澳迫不及待地表示希望加入美、印、日三方联合军演, 以实质性地将军演区域从印度洋扩大至太平洋, 剑锋所指不言而喻。在美、日、澳、印军事合流的同时, 以美为核心的亚太区域军事联盟也在日益强化, 并呈现迅速扩大之势。以往仅由美、日参与的亚太区域联合军演“对抗北方”已扩大为美、日、澳三国军演, 显示出美、日、澳在遏制中国方面合流的趋势^[34]。鉴于目前的发展, 不排除以美、日、澳为主体的多国联合武力干涉台海的可能性。

四是鼓吹“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 实质性破坏一个中国原则。为了达到分裂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实质性支持并帮助台湾当局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自 2015 年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多次鼓动台湾当局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莫里森政府更是借口借鉴台湾“抗疫经验”, 大肆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或来宾参加世卫组织”^[35]。澳大利亚政府还一再施压世界卫生组织“必须与台湾卫生当局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此外, 澳大利亚还力挺台湾当局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等区域性经贸协定, 企图帮助台湾当局扩大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存在和影响。

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仍然奉行紧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是因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与秩序在现阶段对澳大利亚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体系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安全保障”。澳大利亚国土来源于对原住民的殖民和掠夺, 没有合法性, 澳大利亚殖民者及其后裔因此对于生活在距欧洲万里之遥的“亚洲边缘”始终缺乏安全感。两次世界大战中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德、日与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惨烈争霸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担心自己成为新旧强国争霸的牺牲品。二战后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 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与独立斗争都让澳大利亚担心自己会成为“斗争与解放”的对象。冷战结束后, 亚洲国家的整体崛起令澳大利亚将安全担忧的矛头先后指向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担心亚洲邻国的崛起会“侵入”或是帮助澳洲原住民“收复”被西方殖民者掠夺的土地。特恩布尔上台后即声称: “我们生活的亚太地区比以往更具挑战。”^[36] 尽管特恩布尔没有具体言明他心中所谓的“挑战”究竟是什么, 但随后发表的 2016 年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这就是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安”^[36]。

其次,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体系是澳大利亚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的保证, 美澳同盟则是其国家力量的倍增器。澳大利亚人口不过 2 300 万, 陆海空三军仅有 7 万人。澳大利亚以如此之小的体量, 却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拥有远超其实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美澳同盟, 显然使澳大利亚的国家力量倍增。冷战结束后, 澳大利亚凭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被美国“钦封”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副警长”, 协助美国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地位的“提升”令澳大利亚盲目自信, 频频代表美国领导地区维和重任, 俨然成为亚太地区的一支“领导

力量”。澳大利亚政府也因此向国民宣布，跻身世界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梦”已经实现。鉴于这种目的，澳大利亚产生疑问：一个崛起的中国，以及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是将延续还是“剥夺”澳大利亚“物超其值”的“权力”和“地位”？按其错误逻辑，如果是后者，澳大利亚不能不坚定地选边守成超级大国，阻止或延宕世界潮流的进程，因为这更符合它的既得利益。

最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美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据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 2016 年资料，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存量近一万亿澳元，约为中国对澳投资存量的 10 倍^[37]。美国资本早已渗透到澳大利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澳大利亚许多大型媒体、矿山、农场和企业的幕后金主。可以说，美资关系到数百万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的就业和家庭生活水准。这就是为什么澳前外长毕晓普在国会和对媒体讲话时，一再提醒议员和选民：美国才是澳“唯一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是澳对外关系的基石^[38]。

正是基于对自身安全和既得利益与地位的考量，澳大利亚才显示出对美澳同盟的坚定支持，并协助美国遏制亚太地区新兴力量的成长，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的霸权体系与秩序。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澳大利亚发生台海策略的蜕变。

四、结语

澳大利亚脱胎于英国殖民地，与英、美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国际关系指导思想上深受英、美影响。澳自联邦成立以来与英、美有着100多年的军事同盟史，澳不仅从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且借此跻身世界中等强国的行列。因此，中国应该对中澳关系有清醒认知。澳自21世纪以来对华奉行的所谓“灵活”策略，并在中美两国间寻求“平衡”，不过是澳因应中国发展、为己谋取福利的对外政策的“战术性”调整，其可行性与稳定性实质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大语境。中美关系稳定，则澳对华政策方显“灵活”，澳与中美关系才显“平衡”；反之，澳则表现出极强的偏向性，甚至出现对美“一边倒”。鉴此，对于澳政府在台海策略上的变化，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台海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军事霸权对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破坏，也是美国凭借军事力量对中国崛起的强力遏制。我们要坚定战略定力，既不懈怠，也不急于求成，不急不躁地按照既定路线稳步增强我国的经济、科技、国防和综合国力等“硬实力”。这是国家和民族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也是捍卫国家尊严、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最有效和最有力的保障。在大国博弈的语境中，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硬实力”，特别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之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国防现代化。只有夯实以经济和国防为基础的硬实力建设，才能令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霸权思维的旧势力和敌对势力知难而退，也才能促使国际有识之士与中国一道抵制霸权行为，携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参考文献：

- [1] Alex Oliver. What to Expect from Malcolm Turnbull [EB/OL]. (2015-09-16) [2022-08-0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5/09/16/what-to-expect-malcolm-turnbull-australia-tony-abbott-prime-min>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ister/.

- [2] Yu Lei. China-Austral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Grand Peripheral Diplomacy [EB/OL].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2): 740-760.
- [3] C.Mackerras.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M]. Burlington,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 [4] Mohan Malik. Australia and China: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M]. Sou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9.
- [5] Michael Wesley. Australia as an Asia Pacific regional power—Friendship in flux?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73.
- [6]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n foreig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M]. South Melbourn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Australia, 1998: 141.
- [7] W.Tow. Geopoli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Sino-Australian conundrum [M].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63.
- [8] M.Gawenda. Rise of China good for all, says Howard, Sydney Morning Herald [EB/OL]. (2005-09-13) [2022-07-08]. <http://www.smh.com.au/news/world/rise-of-china-good-for-all-says-howard/2005/09/13/1126377262936.html>.
- [9] White H. As China rises, we must look beyond the US alliance[J]. Australian, 2010: 14.
- [10] Yu Lei, Sophia Sui. China-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s Strategy to Reshape Regional Order[J].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21 (1): 81-96.
- [11] H.J.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M]. New York: Knopf, 1966: 12.
- [12] Shamsul Khan. Middle Powers and the Dynamics of Power Shift[J]. Harvard Asian Quarterly, 2012 (3): 52.
- [13] Baldev R.Nayar. A World Role: the Dialectics of Purpose and Power in India: A Rising Middle Power, ed [M]. Boulder Mellor: Lynne Rienner, 1979: 117-145.
- [14] Russell Parkin, David Lee. Great White Fleet To The Coral Sea[R]. Canberra: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08.
- [15] New York Times. Australia to join U.S. Missile-Defense System [EB/OL]. (2003-12-04) [2022-07-08]. <http://www.nytimes.com/2003/12/04/world/australia-to-join-us-missile-defense-system.html>.
- [16] W.Tow. 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J]. Pacific Review, 2004 (2): 271-290.
- [17] W.Tow.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hina growing strong: managing conflict avoidance[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1 (1): 37-54.
- [18] Asian Times. Deputy Sheriff Howard rides into town [EB/OL]. (1999-09-27) [2022-07-08]. <http://www.atimes.com/oceania/AI28Ah01.html>.
- [19] Australian. US seeks deeper military ties [EB/OL]. (2012-03-28) [2022-07-08]. <http://www.>

- 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defence/us-seeks-deeper-military-ties/story-e6frg8yo-1226311869939.
- [20] Terri Moon Cronk 2017, Exercise Talisman Saber 17 Commences in Australi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EB/OL]. (2017-06-16) [2022-07-08].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233218/exercise-talisman-saber-17-commences-in-australia/>.
- [21] Defense Depart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EB/OL]. (2016-09) [2022-07-08].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
- [22] 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Japan, and India Kick off 2016 Malabar Exercise [EB/OL]. (2016-06-17) [2022-07-08].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6/us-japan-and-india-kick-off-malabar-2016/>.
- [23] Josh Frydenberg. 2010, Washington is intergral to our region [J]. the Australian, 2010: 8.
- [24] W. Tow and B. Loke. Rules 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4): 442-457.
- [25] Yu Lei. China-Austral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Grand Peripheral Diplomacy [J].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2): 740-760.
- [26] Scott Morrison. In Our Interest, The 2019 Lowy Lecture, Sydney [EB/OL]. (2019-10-03) [2022-07-08]. <https://www.pm.gov.au/media/speech-lowy-lecture-our-interest>.
- [27] Andrew Brown. 2022, No change in status quo on China: Albanese, The Canberra Times [EB/OL]. (2022-08-03) [2022-08-08]. <https://www.canberratimes.com.au/story/7845205/no-change-in-status-quo-on-china-albanese/>.
- [28] Colin Chapman. Let's Talk About War With Taiwa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B/OL]. (2021-07-20) [2022-07-08].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lets-talk-about-war-with-taiwan/>.
- [29] Allan Behm, Melissa Conley Tyler, Bill Browne and Liam Carter, Should Australia go to war with China in defence of Taiwan? [EB/OL]. (2021-07-09) [2022-07-08]. <https://australiainstitute.org.au/report/should-australia-go-to-war-with-china-in-defence-of-taiwan/>.
- [30] Daniel Hurst. Dutton dials back language on Australia defending Taiwan in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The Guardian [EB/OL]. (2022-03-06) [2022-07-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2/mar/06/dutton-dials-back-language-on-australia-defending-taiwan-from-chinese-aggression>.
- [31] Thomas Wilkins. Australia's war drum to nowhere on Taiwan [EB/OL]. (2021-06-11) [2022-07-0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6/11/australias-war-drum-to-nowhere-on-taiwan/>.
- [32] Andrew Greene. Liberal Senator Eric Abetz calls for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an end to Australia's 'One China' policy, ABC news [EB/OL]. (2021-10-29) [2022-07-08].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10-29/liberal-senator-eric-abetz-pushes-for-taiwan-to-be-recognised/100577250>.
- [33] Sana Hashmi and Alan Yang. Moving Toward Sustainable Australia-Taiwan Ties Australia is now m

于镭, 于飞洋.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05-115.

oving away from the narrative that inching closer to Taiwan will anger China [EB/OL]. (2021-11-04) [2022-07-08].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moving-toward-sustainable-australia-taiwan-ties/>.

- [34] 于镭. 澳美同盟下澳大利亚对冲策略的建构与影响——基于权力架构理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6): 94-105.
- [35] Eryk Bagshaw and Anthony Galloway. Australia to back Taiwan's return to the WHO,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EB/OL]. (2020-04-30) [2022-07-08].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australia-to-back-taiwan-s-return-to-the-who-20200429-p54oaa.html>.
- [36] Greene, Andrew. Malcolm Turnbull sticks to Tony Abbott's defence spending pledges in long-awaited white paper,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 [EB/OL]. (2016-02-24) [2022-07-08].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2-23/defence-white-paper-turnbull-sticks-to-abbott-pledges/7194480>.
- [37]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Fact She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2016-04) [2022-07-08]. <https://dfat.gov.au/trade/resources/Documents/usa.pdf>.
- [38] Julie Bishop. US-Australia: The Alliance in an Emerging Asia,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EB/OL]. (2016-01-22) [2022-07-08]. http://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4/jb_sp_140122.aspx?ministerid=4.

责任编辑: 龚静阳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

刘林波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港澳研究所, 北京 100045)

摘 要: 要全面评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实践是否符合其对应的民主理念、民主制度设计是否落实了民主理念的要求、民主发展的进程是否处于正确轨道, 就需要建构一套体系化的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应包括内容标准、原则标准、路径标准三项子标准: 内容标准包括优质民主、实质民主两个子项, 原则标准包括不照搬西方模式、不影响安全稳定两个子项, 路径标准包括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民主、循序渐进发展民主两个子项。运用这一套评价标准检视香港回归祖国 25 年来的民主发展实践, 使我们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 应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塑造民主发展共识、平衡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兼顾民主与治理效能的基础上, 推动香港民主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 “一国两制”; 香港特色民主制度; 选举制度; 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 D676.58;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6-0116-13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政治发展的过程,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从非民主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 树立正确的民主观至关重要。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针对民主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民主观, 不同的民主观决定了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 应由各国人民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民主观和民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就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为指导,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2.06.011

作者简介: 刘林波,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 刘林波.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16-128.

民主理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确立了新民主政治观^[1]。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为“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广义上讲, 香港特区的民主发展不仅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 也包括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港澳居民对特区实行民主管理的各种制度。从狭义上讲, 特区的民主发展特指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2]。本文主要讨论狭义上香港特区的民主发展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香港特区是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虽然香港特区根据中央授权实行高度自治, 但高度自治的地方自治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制度是一种地方民主制度^[3]。中央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 中央始终坚定支持香港有序发展民主。从历史来看, 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可分为擘画和奠基(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落实和发展(1997年到2015年)、修复和完善(2020年以来)三个阶段^[4]。在1997年回归祖国后,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进入新纪元。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宪制责任, 为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作出了重大努力, 共进行了三次释法、作出了五次决定、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订案进行了一次批准和备案^①。

然而, 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多次进行阻挠和破坏。为使香港的民主发展重回正轨, 2021年3月11日,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简称“3·11决定”), 明确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基本思路等内容, 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3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案(简称“新附件一”“新附件二”), 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系统性修改和完善。关于这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有的人士仅看到其减少了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 就错误认为是一次“民主倒退”; 有的则认为, 新选举制度体现了均衡参与原则, 有利于落实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目标^[5]。作出前一种评价依据的是所谓“国际标准”, 即把民主简化为竞争性选举; 作出后一种评价依据的是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解释和决定。评价民主进步或倒退的所谓“国际标准”是站不住脚的, “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 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 本身就是不民主的”^[6]。从全球政治经验来看, 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差异很大, 这些国家在政府形式、选举制度、政党体制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制度安排, 不同国家在实践民主时总会打上本国的文化烙印^[7]。既然民主形式各异, 也就不存在统一的民主评价标准,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发展进程和质量的评价, “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经过分析又回到理论本身”^[8], 而应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分析。经过2021年的系统性修改和完善后, 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在民主理论、代表理论、主权理论方面均体现出自身特色^[9]。要客观评判香港特色民主发展情况, 就需要构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的评价标准。

① 三次释法分别是: 2004年《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4·6解释”), 2005年《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4·27解释”), 2016年《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11·7解释”)。五次决定分别是: 2004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4·26决定”), 2007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12·29决定”), 2014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 2020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8·11决定”), 2020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简称“11·11决定”)。一次批准和备案是: 2010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提交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修订案进行批准和备案。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区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进者，建立了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制定了保障、规范香港特区民主制度的有关法律，开启了“港人治港”的实践^[10]。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时，既要看到国家层面的民主评价标准对香港民主发展的深刻影响，又要分析中央关于保障、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法律文件提出的要求。我国国家层面的民主评价标准，经历了一个提出和发展完善的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标准，即能否调动人民积极性、保持高效率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对邓小平提出的民主标准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11]。2014 年 9 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民主与否的“八个能否”标准^①。2021 年 10 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再次强调了“八个能否”标准，还提出了“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的标准^②。“八个能否”和“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论述，标志着我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评价民主的中国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主评价标准，是对西方民主标准的超越，内容更为全面、具体，兼具方向性和操作性^[12]。在构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时，应全面对照国家层面的民主评价标准。此外，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全面构建了香港特区的民主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就推动香港民主发展作出了若干决定、解释，在构建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时，应仔细挖掘这些法律文件中本身就蕴含的一些标准。

本文认为，构建“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评价标准，可以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先从民主建设的内容和特点出发，构建出评价标准的一个初步框架，再在这个框架中加入具有香港特色的内容进行充实。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建设至少包括民主理念、民主制度（设计）、民主评价三方面内容。民主评价的必要性来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的实践不会像民主的制度设计那样完美；二是民主建设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13]。与民主建设的内容和特点相适应，可以勾勒出一套民主发展评价标准的轮廓：评价民主发展的具体实践是否符合民主理念，可看其是否符合“内容标准”；评价民主发展的制度设计是否落实了民主理念的要求，可看其是否符合“原则标准”；评价民主发展的过程是否处于正确轨道，可看其是否符合“路径标准”。以上提出的内容标准、原则标准、路径标准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层次清晰的民主发展评价标准初步框架，接下来还需要结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充实各项标准的具体内容。

二、评价香港民主发展的内容标准

我们在香港发展的地方民主制度，既不同于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地方民主制度，也不同

① “八个能否”，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② “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即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国家层面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是“香港特色地方民主制度”^[3]。总的来说,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优质民主、实质民主两个方面。

(一) 优质民主

民主是一种公共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质量的优劣之分。民主按其质量状况可分为优质民主、劣质民主,“民主质量的优劣不仅取决于民主体制的稳定程度,还取决于民主体制的治理绩效”^[14]。我们在香港要发展的是优质民主,这是由我国国家层面的民主观决定的。在民主发展问题上,我国一直强调民主体制的稳定性及其治理效能。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15]。邓小平针对香港问题明确强调:“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15] 267}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了制度稳定的重要性,还强调要发挥民主的治理效能。他提出“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6],“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16]。然而,在香港民主发展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影响民主体制稳定和民主治理效能的现象。比如,2014年9月,香港的反对派拒不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普选问题的“8·31决定”,发起“占领中环”非法集会,诉诸街头政治,搞政治对抗。2019年6月,香港爆发“修例风波”,反中乱港分子打着争取“民主”的旗号动辄使用暴力,街头政治被暴力与野蛮裹挟^[17]。对此类影响香港民主体制稳定性、可能导致香港民主劣质化的动向,中央和特区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随着香港高等法院发布临时禁制令以及警方采取清场行动,持续了79天的非法“占中”闹剧落幕。非法“占中”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也受到法律制裁,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均被香港法院判处监禁16个月;另一名发起人朱耀明被判处监禁16个月,缓刑两年。针对“修例风波”暴露出来的风险,中央果断出手,以“决定+立法”“决定+修法”的形式,建立健全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系统性修改完善了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为香港民主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上述香港民主发展的实践可知,中央是香港民主发展最坚定的支持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必须在中央主导下依法有序推进,建设优质民主”^{[10] 54}。

(二) 实质民主

对民主有形式民主、实质民主两种理解,形式民主强调竞争性选举程序,而实质民主强调实质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中央关于香港民主发展的基本立场是重点发展实质民主。邓小平早就指出:“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15] 284}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6],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18]。而在香港一些争取所谓“真普选”的人则坚持发展形式民主的立场^[19]。对发展何种民主的两种不同理解,也就带来了香港民主发展过程中两种力量、两条道路的斗争^[4]。2021年中央果断出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使香港民主发展重回正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在全面回顾香港特区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后也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发展,重在提升民主质量,追求实质民主^{[10] 56}。从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实践来看,在香港发展实质民主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发展协商民主。与西方以政党竞争为核心的对抗式民主不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一个重要形式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优势在于不搞对抗,强调“商量办事”和凝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6]在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也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要求,中央和特区政府遵循在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发展民主的原则,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未形成共识前不修改有关选举制度。比如,在起草基本法设计香港选举制度时就未排除协商民主的形式,在第 45 条规定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由选举或协商产生。在 2005 年作出的“4·27 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中央政府真诚地期望在香港各界人士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作出进一步的修改。在 2007 年作出的“12·29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明确行政长官普选时的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组成,这是因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是基本法起草时经过广泛咨询和讨论所形成的共识,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较强的认受性。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提出,鉴于香港社会对如何落实基本法有关行政长官普选的规定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一些核心问题作出规定,以促进香港社会凝聚共识。2021 年,中央系统性修改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在多个方面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要求。比如,在出台“3·11 决定”和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修订案的过程中,中央在多个层面广泛听取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这种在决策前听取各方意见的制度安排就是协商民主的体现。又比如,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以对选举委员会的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混合构成以及由其产生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的职能等均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具体来说:针对不同界别确立不同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方式,为各界别内部民主协商、追求共识留下了空间;选举委员会由当然委员、提名产生的委员、选举产生的委员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有助于在选举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由选举委员会产生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的制度设计也有利于在立法会内形成协商一致、共同合作的稳定力量^[9]。实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可以保障香港市民不仅在选举时享有投票的权利,在选举之后还可以持续进行政治参与。

其二,发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民主。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参加政治活动,决定和影响公共决策的行为,提高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可以确保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15] 242}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18]在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为实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目标,中央始终强调香港的选举制度要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比如,在 2004 年作出的“4·6 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基本法明确了发展香港民主制度应遵循均衡参与等重大原则。在 2004 年作出的“4·26 决定”中提出,有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改变,应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衡参与。在 2007 年作出的“12·29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实践证明,关于立法会功能团体选举的规定“有利于香港各阶层、各界别均衡参与”,“选举委员会的这种组成体现了各阶层、各界别的均衡参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中提出,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体现均衡参与。在 2021 年作出的“3·1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广泛的、均衡的政治参与。强调均衡参与,可以使香港的不同持份者表达意见和诉求,畅通民意反映渠道,有助于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以及最大限度凝聚建设香港

的积极力量。

其三, 发展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民主。强调香港的民主制度要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符合“一国两制”的宗旨, 香港基本法序言部分明确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 香港政制发展应该有利于居民安居乐业, 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20]。在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实践过程中, 中央始终强调要有利于香港的经济发展 (有时表述为有利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比如, 在 2004 年作出的“4·26 决定”中提出, 有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改变, 都应遵循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等原则。在 2007 年作出的“12·29 决定” (草案) 说明中提出, 实践证明, 关于立法会功能团体选举的规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对普选时间表作出明确, 使香港政制发展明朗化, 有利于减少疑虑和争拗,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中提出, 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 必须“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香港发展实质民主, 归根结底是要保持香港经济繁荣, 使香港居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逐步解决香港居民所忧所盼的民生问题, 增强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评价香港民主发展的原则标准

民主发展的原则标准, 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民主制度设计时, 应全面准确落实自身确立的民主理念, 为确保这一目标实现, 有必要为民主制度设计划定一些必须遵守的原则。从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 香港的民主制度设计至少应遵循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影响安全稳定两项原则。以否定式表述划定香港民主制度设计的原则, 实际上是划出了民主发展的底线, 在此范围内香港民主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 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 邓小平明确提出, 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 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如果完全照搬, 比如搞三权分立, 搞英美的议会制度, 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 恐怕不适宜^{[15] 220}。邓小平强调不照搬西方模式, 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亨廷顿一度沾沾自喜, 声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民主化的浪潮“吞没了共产主义世界”^[21]。可以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产物, 因此我国高度警惕和防范“颜色革命”,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入新时代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可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6], “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 会水土不服, 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18]。显然, 不照搬西方模式是我国进行民主制度设计时一以贯之的一项原则, 结合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有关法律文件来看, 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民主制度设计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关于香港的法律地位, 香港基本法第 12 条作出明确规定, 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这一法律地位决定了香港特区实行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地方民主制度。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有关法律文件始终强调这一要求。比如, 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 (草案) 说明中提出, 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 必须符合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2014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

皮书也指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要符合香港特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2021 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也遵循了这一重要原则,如“新附件二”规定立法会表决继续采用分组计票制度。这一制度源于多数发达国家议会实行的“两院制”制度设计,但由于“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地域狭小,不宜在立法机构中完全照搬西方的‘两院制’”^[22],分组计票制度须结合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进行创新。在实践中,部分人士把香港视为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并由这一臆想的香港地位出发来评价香港实行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无视基本法规定、拒不接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的政治现实,其关于香港民主制度的评价属于“空中楼阁”。

其二,民主制度设计要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指要“切合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10] 54}。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15] 249}当年起草香港基本法时设计香港政治体制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23]。香港基本法序言也明确规定,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既然设立特别行政区考虑了香港的现实情况,那么在香港特区实行的各项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当然也应该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这在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有关法律文件中均得到体现。

比如,在 2004 年作出的“4·6 解释”(草案)说明中就提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了发展香港民主制度应遵循从实际出发等重大原则。2004 年作出的“4·26 决定”提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提出:“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政府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2021 年作出的“3·11 决定”中多次强调要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如香港特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应当“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香港特区设立的选举委员会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也强调,要“坚定走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

实践是检验香港的民主制度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的唯一标准。2021 年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成功举办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伐”^[24]。

(二) 不影响安全稳定

不影响安全稳定始终是设计和完善香港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就强调不能因为发展民主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提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15] 285}。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民主的发展要有利于稳定,提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18]。针对香港民主发展问题,他强调香港的政制发展应该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结合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有关法律文件来看,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制度设计上要考虑安全风险。邓小平早就表达了对香港实行普选的安全忧虑。他认为,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不一定能确保选出这样的人来^{[15] 220}。然而,

在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制度的完善过程中, 从 2014 年作出“8·31 决定”时才开始公开制度设计上的国家安全风险考量。在“8·31 决定”简介会上,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表示: “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 目的是在三个方面降低普选的风险: 一是降低政治对抗的风险, 二是降低宪制危机的风险, 三是降低民粹主义的风险。”^[25] 在 2016 年作出的“11·7 解释”(草案)说明提出, 出台本解释的目的之一就是“有效打击和遏制‘港独’活动,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就更清晰显示了完善香港民主制度时对国家安全风险的考量。在 2020 年出台香港国安法对选举安全划出底线之后, 2021 年出台的“3·11 决定”“新附件一”“新附件二”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系统考虑了国家安全风险防范问题, 增加了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度, 以确保有关候选人符合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

其二, 制度执行者要安全可靠。任何制度都是要靠具体的人来执行, 执行者是否忠诚可靠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邓小平早就提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 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15] 61} 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 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 那就是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26] 港人依法治理香港, 就是要执行好各项法定制度包括特别行政区民主制度。因此, 中央在对香港民主制度进行设计和完善时, 逐步把“爱国者治港”的政治要求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以确保香港民主健康发展。比如, 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中提出, 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 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2016 年作出的“11·7 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 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规定, 贯穿着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的原则。2021 年 5 月, 香港特区制定出台了《2021 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 明晰了“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含义, 健全了特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 从特区法律层面确立了“爱国者治港”原则, 对确保香港特区管治队伍安全可靠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三, 制度完善要回应可能和现实的风险。“负责任的政府就重大事务作出决策的过程, 都是趋利避害的过程, 而且特别关注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并切实加以防范。”^[27] 中央在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对选举制度进行完善, 在制度完善时及时回应制度运行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风险。比如, 在 2004 年作出的“4·26 决定”中提出, 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员数量的大幅增加对香港社会整体运作的影响, 尤其是对行政主导体制的影响尚有待实践检验。在 2007 年作出的“12·29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 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同时进行, 波及面太大, “不利于政治改革的稳妥实施和保持社会稳定”。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 普选“必须审慎、稳步推进, 防范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在 2021 年作出的“3·1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 反中乱港分子通过香港特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 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 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的一个重点就是应对已经出现的现实风险, 比如恢复由选举委员会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 适当减少分区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 可以排除激进势力进入立法会, 使立法会恢复宪制职能。

四、评价香港民主发展的路径标准

民主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程性”，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本文提出的“路径标准”是要用来评判民主发展是否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从中央主导香港民主发展的过程来看，评价香港民主发展的路径标准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民主，这是指民主发展的路线问题；二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这是指民主发展的节奏和进度问题。

（一）在法治轨道上发展民主

民主政治实质上是法治政治，依法办事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民主发展应遵循法律规定，而不能任意突破法律。邓小平多次强调民主和法制的关联性，提出要在法制轨道上发展民主。一方面，他强调了法制对民主的保障作用。他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8]。另一方面，他强调了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提出：“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15] 249}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能否”民主评价标准，有两条提到了“依法”的问题，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18]。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香港政制发展必须依法有序进行^[20]。

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展的有关法律文件也明确了香港民主发展的法治路线。比如，在 2004 年作出的“4·6 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必须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内进行。”在 2004 年作出的“4·26 决定”中提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在 2005 年作出的“4·27 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按照立法原意明确行政长官的任期“完全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办事”。在 2007 年作出的“12·29 决定”（草案）中说明提出：“在新法没有获得通过的情况下，继续适用原来的法律规定，这是法制的一般原则。”在 2014 年作出的“8·31 决定”（草案）说明提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源于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制定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严格遵循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在 2021 年作出的“3·1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

香港特区的民主发展实际上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民主制度从文本落实为实践的过程，民主发展实践遵循法律文本的规定是恪守法治原则最起码的要求，在实践中一些人士提出的行政长官选举“公民提名”方案、组织的所谓非法“初选”活动，都缺乏宪制法律依据，都是脱离法治轨道另搞一套的做法。任何偏离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的主张和做法，都违反法治原则，损害法治权威^{[10] 56}。

（二）循序渐进发展民主

发展民主有激进、渐进两种策略，中国式民主发展选择的是渐进策略^[29]。邓小平对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5] 252}他对渐进式发展民主的认识也延伸到香港民主发展问题上。1987 年 4 月，他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提出：“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15] 220}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香港的政制发展必须依法有序进行^[20]。中央保障和规范香港民主发

展的有关法律文件也始终强调香港民主发展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比如,在2004年作出的“4·6解释”(草案)说明中提出,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附件一、附件二的规定都确立和体现了香港政制发展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2004年作出的“4·26决定”中提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在2007年作出的“12·29决定”中提出,可以按照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在2014年作出的“8·31决定”中提出,“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继续使用现行规定,符合循序渐进地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则”。2021年作出的“3·11决定”也只是修改了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确立的循序渐进原则仍然有效。在实践中,香港反对派提出的一些激进发展民主的主张,要求一下子实现全面“民主化”,本质上是孤立地看待民主发展问题,不考虑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不考虑激进发展民主给社会其他领域乃至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不符合责任政治的基本要求。

五、运用评价标准检视香港民主发展实践的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套层次清晰、系统化的香港民主发展评价标准,这套评价标准细分为内容标准、原则标准、路径标准三个子标准,每个子标准下还包含多个子项。运用这一套评价标准来检视“一国两制”下香港25年的民主发展实践,可以得出推动香港民主继续向前发展的如下启示。

(一)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中央提出“港人治港”时就明确了其界限和标准,即要由爱国者治港。只有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才能把香港特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员、资金、信息等自由流动,这种国际性特点决定了香港民主发展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香港回归后“事实上经历了后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普遍经历的民主化浪潮”^[30]。同时,由于香港扮演了东西方之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香港的政改问题蒙上了大国角力和地缘政治冲突的色彩”^[31]。越是在这种国际化因素影响下,越凸显了强调和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重要性。在之前的香港民主发展实践中,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够进入特区的治理架构,利用公职身份从事反中乱港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原则未得到全面落实。这种乱象显然不符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原则标准”。2020年出台香港国安法、2021年系统性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指明了方向。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顺利举办了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三场重大选举活动,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依法履职,确保了当选者全部符合“爱国者治港”的要求,确立了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政治规矩。香港民主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民主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32]。

(二) 塑造民主发展共识

从回归后的实践来看,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艰难,香港的民主发展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33]。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34]。这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就包括在香港发展何种民主、发展民主的路径和进度等问题。比如,在民主发展的内容上,有一

种观点认为选举程序最重要，选举结果无所谓，普选要一步到位，不必循序渐进。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内容标准”和“路径标准”，不符合中国式民主的渐进发展策略。从国家的民主发展整体格局来看，某一个地区的民主发展不能“单兵突进”，保持香港民主发展的渐进性，是使香港与内地民主发展节奏保持相对一致的需要^[35]。针对香港社会缺乏民主发展共识的问题，中央果断出手，主动塑造民主发展共识，2020 年出台香港国安法和 2021 年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系统性修改和完善，弥补了香港民主发展存在的风险漏洞，为香港社会形成民主发展共识筑牢了底线基础。2021 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对香港的民主发展问题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为香港社会凝聚民主发展共识提供了权威文本基础。鉴于香港民主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特点，对于香港社会最终形成关于民主发展的共识，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

（三）平衡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

形式民主的功能是有限的。在香港的民主发展实践中，一些人士曾出现认识上的偏差。比如，仅仅强调形式上的均衡参与，但形式上的参与并不能保障某些群体的利益最终会被代表、被照顾，这不符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内容标准”。比如，把立法会直选议席的增加作为选举制度民主成分增加的重要衡量指标，但是一些直选议席实际上被反中乱港势力利用，2020 年的非法“初选”活动显示他们企图通过操纵选举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这些教训使我们对民主发展的认识更深刻，方向更明确。我们开始从强调形式上的“均衡参与”转变为强调实质上的“整体利益”，在 2021 年作出的“3·1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要“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民主选举制度”。

作出“3·11 决定”及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选举委员会的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更能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对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如恢复由选举委员会产生部分议席、减少地区直选议席、取消区议会在立法会中的席位等，可以“更好地平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36]。突出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实质上是强调在香港要发展实质民主，实质民主要求通过民主发展提高特区治理效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2021 年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系统性修改和完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选出有治理能力的人，即选出“有能力的爱国者”^[37]。虽然我们强调在香港发展民主的重点是实质民主，但也不能因此忽视程序民主，毕竟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民主发展最终要达至“双普选”的目标，“双普选”是基本法对发展程序民主提出的要求。

（四）兼顾民主与治理效能

在之前的香港民主发展实践中，存在强调优先发展程序民主、忽略民主治理效能的现象，这显然不符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内容标准”，而 2021 年对香港选举制度的系统性修改和完善使香港民主发展重回正轨。“3·11 决定”（草案）说明中提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强调治理效能并不是此刻才提出的，在香港基本法的原初设计中就包含了这一要求，比如基本法确定香港实行行政主导制，本身就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管治效能。国家实行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在香港实行的各方面具体制度都应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中央对香港民主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配合‘一国两制’发展”，不能抽象地或孤立地来处理香港政制的民主发展问题^[31]。我们强调香港民主发展的重心是实质民主，而实质民主强调以实际治理效能作为民主质量高低的评判标准。因此，“高效

刘林波.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16-128.

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均衡发展”既是经验总结, 也是未来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35]。

参考文献:

- [1] 张伟军. 中国新民主政治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及价值定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5): 54-64.
- [2] 乔晓阳. 乔晓阳论基本法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284-285.
- [3] 陈欣新.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主制度是“香港特色地方民主制度” [EB/OL]. (2016-12-30) [2022-09-23]. <https://www.chinanews.com.cn/ga/2016/12-30/8110289.shtml>.
- [4] 王振民. 坚定把握香港特区发展民主的“人间正道”——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J]. 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2 (1): 69-73.
- [5] 宋小庄. 优化选举委员会并非民主倒退 [N]. 文汇报, 2021-03-08 (22).
- [6] 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 (2022-02-28) [2022-09-23]. <http://www.npc.gov.cn/npc/zyxxxxzk008/202202/47be1cbf4d744d5c9f84522950011259.shtml>.
- [7] 包刚升. 被误解的民主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9-14.
- [8] 杨雨林. 习近平政治制度评价观及其时代价值 [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9 (2): 20-21.
- [9] 王博闻.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特色 [J]. 港澳研究, 2021 (4): 34-45+95.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8.
- [11] 王中汝. 民主标准问题的中国方案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 (7): 60-69.
- [12] 言浩杰, 李婧. 习近平新时代民主思想探究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 (5): 16-19.
- [13] 王俊涛, 杨志刚. 论中国式民主的检验标准 [J]. 前沿, 2016 (7): 44-48.
- [14] 弓联兵. 西方民主质量研究: 理论构建与量化测评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 (2): 47-53.
- [15]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13.
- [1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1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17] 郝诗楠. 香港街头政治暴力触及两大底线 [N]. 光明日报, 2019-08-01 (13).
- [18]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5日) [J]. 中国人大, 2019 (19): 16-21.
- [19] 袁阳阳. 实质民主: 中央关于香港民主发展的立场解读 [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 15-20.
- [20] 习近平分别会见梁振英崔世安 [N]. 中国青年报, 2014-12-27 (1).
- [21]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 [M]. 刘军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3.
- [22] 王凤超. 香港政制发展历程: 1843—2015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80.
- [23] 袁求实. 香港过渡时期重要文件汇编 [G]. 香港: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1997: 84.
- [24]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 [EB/OL]. (2021-12-22) [2022-09-23]. http://www.gov.cn/xinwen/2021-12/22/content_5664030.htm.

- [25] 李飞在人大常委会决定简介会上讲话全文 [N]. 大公报, 2014-09-02 (8).
- [26] 习近平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 [EB/OL]. (2021-01-27) [2022-09-23].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7/content_5583077.htm.
- [27] 李飞. 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政治和法律内涵——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级官员简介会上的讲话 [N]. 大公报, 2014-09-02 (14).
- [28]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46.
- [29] 许耀桐. 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 [J]. 新视野, 2016 (2): 5-10.
- [30] 樊鹏. “否决玩家”与香港政治体制的“碎片化” [J]. 文化纵横, 2016 (2): 64-70.
- [31] 刘兆佳. 政改争议及两种“一国两制”理解的“对决” [J]. 港澳研究, 2015 (2): 19-28+94.
- [32] 齐鹏飞. “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必须依循的根本原则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2): 97-105.
- [33] 齐鹏飞. 香港回归 20 年来“一国两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探索 [J]. 中州学刊, 2017 (5): 1-10.
- [34] 习近平.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N]. 人民日报, 2017-07-02 (2).
- [35] 施雪华, 曹胜. 回归后五十年香港和澳门渐进政治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兼容性问题 [J]. 社会科学, 2011 (6): 18-26.
- [36]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具有十分重要深远的意义——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N]. 大公报, 2021-03-31 (6).
- [37] 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对香港民主制度的优化和发展——专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 [N]. 大公报, 2021-03-31 (7).

责任编辑: 刘涓菡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

龚静阳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重庆 400064）

摘 要：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世界权力格局快速演变，为维系霸权、打压对手，美西方国家大肆构建对华污名化框架。该框架干扰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的准确全面认知，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重大风险隐患。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及其动向值得我国高度警惕。在现实中，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在人权民主议题实施污名，打造攻击中国的枢纽话语；在涉疆议题实施污名，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在涉台议题实施污名，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在涉港议题实施污名，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在国际关系议题实施污名，丑化中国整体形象。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构建具有明显的特征，包括污名主体集团化：从美国“全政府”到联盟“全出击”；污名机制流水化：从信源到受众；污名议题系统化：从单一到复合；污名手段隐蔽化：从“文化植入”到“计算宣传”；污名动机立体化：从心理到现实；污名影响扩散化：从中国到世界。鉴于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集中在统一战线领域，瓦解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要从加强话语内容生产、提升叙事能力、完善话语与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入手。

关键词：美西方；对华污名；框架理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6-0129-18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6.012

作者简介：龚静阳，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引用格式：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129-14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面对世界权力格局快速演变，为维系霸权、打压对手，美西方加重使用话语攻击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社会动员，策动了多起“颜色革命”，颠覆了多个国家的政权。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美西方为了遏阻我国发展，在政党制度、民主人权和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统一战线相关领域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号，大行污蔑和诽谤之术。美西方长期以来为护持霸权，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地位，营造站在“道义制高点”的假象，为相关议题量身定制话语体系，形成对华污名化框架。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干扰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面貌的整体认知，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情感甚至判断。其污名化框架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重大风险隐患，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及其动向值得我国高度警惕。

国内学界已对美西方对华污名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在美西方国家的对外对内传播方面，既有研究从当前国际话语形势及美西方国家的传播战略、污名化心理、宣传规律展开。郭可等发现，西方涉华负面舆情居多^[2]。史安斌等结合“乌卡时代”背景，揭露美西方国家战略传播的转型和升维^[3]。曾向红等认为美西方对华舆论经历了猜疑、警惕和攻击三个阶段，提出污名化包括污名萌生、发展、扩散三个阶段，并对应群体焦虑、歪曲认知和话语架构的行为机制^[4]。史澎海从冷战初期美苏意识形态争夺战的历史中总结美国的话语干涉规律：在事件的动态传播中向世界传递声量，企图占据道义制高点、把握话语主动权^[5]。在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方面，既有研究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如关注美西方对涉疆议题的污名化^[6-7]，关注中美关系新常态下美西方对我国台湾问题^[8]、香港事务的干涉^[9]，关注美西方对涉华人权和民主议题的污名化^[10]等。

国内学界还对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的关系开展了研究。比如，罗振建等认为统一战线可为中国话语权提供资源供给，同时统一战线领域也是中国话语权的薄弱环节^[11]。卢勇等认为统一战线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12]。具体到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方面，既有研究聚焦历史、文本、政策话语视角。基于历史视角，赵成斐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对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的构建进程与经验^[13]。李亿等从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本书写中归纳出情感构境叙事、实践构境叙事、理想构境叙事等路径^[14]。基于文本视角，章晓英从中西语境中“话语”和“叙事”的概念出发，用叙事学视角解读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认为话语更注重对观点看法的表达，叙事则注重主体、文本、客体的展示和讲述^[15]。基于政策话语视角，童兵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论述，分析了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路径^[16]。

由上可见，关于国际话语形势最新动向的既有研究着眼宏大，对作为话语权争夺前沿阵地、重要战线的统一战线领域聚焦不足；关于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既有研究较少基于国际国内互动语境

展开。美西方对我国的污名化具有明显的框架化态势, 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通过对污名化信息的策源、生产和传播, 美西方主动构建对华污名化框架, 妄图形成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负面认知。鉴于此, 本文从政治学和传播学、国际和国内结合的视角, 引入框架理论梳理美西方对华污名化的最新动向和特征、影响, 提出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路径。

二、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 美西方国家对华污名化框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其框架构建的内容包括: 打着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幌子, 着重攻击我国政党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反复炒作涉疆、涉藏、涉港、涉台议题; 在国际关系中丑化中国形象, 挑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攻击, 形成构建人权民主污名枢纽话语, 同时匹配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具体领域污名话语的立体格局。

(一) 在人权民主议题上实施污名, 打造枢纽话语

人权和民主是美国在全球打压异己的重要话语, 起到污名他国的“枢纽”作用。美国自诩“人权标杆”“民主灯塔”, 把人权和民主当作武器, 构建所谓“侵犯人权”“民主对抗专制”等话语, 构造对华污名化框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不寻求交易”的态度使其在推进所谓人权、民主议题方面更加强硬^[17]。美西方炒作人权民主议题的策略是将其政治化, 企图达成不同阶段的战略目的。

其一, 在人权话语方面, 美西方主要污名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成效。首先, 美国发布了大量涉人权议题的所谓提案、报告、法案, 试图占据人权定义权。从1989年至今, 美国国会发布的涉华人权提案多达516项^[18], 其中相当一部分签署成法。美国连续45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 罗织我国所谓人权“罪状”。美西方攻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无理指责中国所谓“压迫”信教与少数民族人士, 诬称中国“侵害”人民自由。美西方的人权指责充满臆断, 所谓证据缺乏可信度, 通篇使用“据有关报告”“似乎”“可能”等推断性话语。美西方的人权指责充满主观色彩。例如, 美国《2021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将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提议在教育中纳入“爱国爱澳”内容解读为所谓“灌输爱国价值观”^[19]。其次, 故意设置他国的人权“敏感点”, 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 实施“人权战”。例如, 2021年底, 美西方热炒中国“人权”议题, 美国及部分盟友以“人权”借口炒作抵制北京冬奥会话题。此举妄图遮蔽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 其“人权政治”的算计显露无疑。西方媒体、非政府组织围绕在政府周围, 秉持意识形态偏见配合“人权战”炒作。美西方对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 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人权状况, 折射出美西方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

其二, 在民主话语方面, 美西方主要污名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首先, 在政党制度领域, 制造所谓“民主”与“专制”、“民主治理”与“威权治理”的话语藩篱。美西方标榜西方政党制度的“竞争性”“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为“真民主”, 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团结、合作、协商、监督等治理优势, 忽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 制造所谓“一党专政”等话语陷阱。拜登政府在《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所谓“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正在展开竞赛”, 企图通过塑造“民主话语霸权”重塑遏制中国的“价值联盟”

体系。其他西方国家紧随美国身后，也有不少对华污名化行径。比如，日本开展了专门的对华舆论战，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法”，强调日本是“先进民主国家”，渲染“中国威胁”^[20]。其次，美西方热衷于举行“民主峰会”等各色政治秀场，拉帮结派实施对华话语攻击，尤其是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21]。特朗普时期，彭斯、蓬佩奥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企图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割裂开来。拜登政府在其对中美关系的“竞争、对抗、合作”战略框架下，继续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内部各方面关系^[21]。

（二）在涉疆议题上实施污名，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

最近 3 年来，美西方高度聚焦对中国治疆政策的污名。他们通过炮制所谓“报告”制造“证据”，炮制所谓“法案”制造“依据”，渲染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宗教压迫”“强制绝育”等弥天大谎。美西方在涉疆议题上的话语炒作，旨在干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崛起。

其一，反华智库、部门、NGO 伪造证据，炮制“报告”，编造涉疆谣言，开展诸多专门污名化新疆的活动。作为新疆分裂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热衷于炒作所谓“种族灭绝”等话题。2019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收买证人、伪造证据，污蔑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利用伪造证据发布信息，在国际社会开展涉疆议题负面宣传^[22]。2020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艺术互动倡导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动境内外反华势力炒热涉疆议题；“人权倡导的文件和研究”项目构建维吾尔族“人权”数据库，炮制报告抹黑中国治疆政策^[22]。2020 年 3 月，美西方开始炒作的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则由智库报告开启，随后行业协会、国会议员发声，政府出台有关法案。至此，所谓“证据”“依据”制造完成。美西方开始频繁在报告、演讲中以所谓“可怕虐待”“强迫劳动”谬论对华施压。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惯用未经证实或虚假消息描述中国人权状况。“人权观察”虽标榜独立，但从其成员构成、对美式民主的无条件追捧、发表言论与美国政策步调一致^[23]来看，其言论毫无真实性可言。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披着学术外衣，多次发布涉疆虚假报告，反复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此类报告的参与者被曝接受美方相关机构大额资助，有的甚至与恐怖组织有联系。比如，“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和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同“东突”组织“世维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2]；海伦娜·肯尼迪中心出资人系反华极端政治团体创始人。

其二，为了掩盖涉疆虚假报告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谎言本质，美国操纵其盟国给联合国相关机构施压，妄图使相关机构成为其帮凶打手。2019 年以来，美国经常操纵其盟友在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治疆政策妄加非议，抛售所谓新疆存在“人权问题”。2022 年，美西方国家在人权理事会散布涉疆谎言谬论，炮制所谓涉疆问题决定草案，并竭力向成员国施压，企图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干涉中国内政。鉴于国际社会认清美方散布谣言、“以疆制华”图谋，该草案遭到人权理事会多数成员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美西方一手策划制造所谓“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涉疆人权评估报告”，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侵犯人权”。2022 年 7 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发表涉及新疆的所谓报告，声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存在使用“强迫劳动”的地方。该日籍专家偏听偏信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编造的涉疆谎言和虚假信息，滥用职权，公然违反特别机制行为准则，恶意指黑污蔑中国，充当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

（三）在涉台议题上实施污名，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美西方国家惯于操弄涉台议题来污名化中国，一方面使用“经济胁迫”“制造威胁”“恐吓民众”等话语来设定有关框架，妄图在两岸不断制造对立和裂痕；另一方面，玩弄话语把戏，炮制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作为美方“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在多项声明中为“一个中国”原则加上“在适用的情形下”的后缀。美西方在涉台议题上对中国进行污名，根本目的是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其一，美西方吹捧台湾地区所谓“政治发展优等生”的角色，以制造价值观对立阻碍国家统一。美国对台湾所谓“民主榜样”的话语框架设置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彼时，为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图谋，实现“以台制华”，美国官员及媒体大肆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24]。近五年，随着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全面竞争，美西方对“民主”话语的“双标工具化”使用愈演愈烈。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台湾地区被赋予所谓“民主示范”角色^[7]。美国不同层级的官员包括布林肯、佩洛西、黄之瀚、蓬佩奥、彭斯、郇英杰等均在公开场合夸大台湾的所谓“民主成功”。美西方抬高台湾地区的所谓民主成就，企图助推其站上“道德制高点”并在国际社会装弱者、博同情。美西方对台湾地区所谓“政治发展优等生”角色的塑造，实则通过贬低大陆的民主政治发展进步，人为向台湾同胞植入恐慌因素，消解台湾同胞的统一认同。

其二，美西方无视是非曲直，拉帮结派多渠道发声无理指责中国。2022 年 8 月 2 日，佩洛西不顾我国强烈抗议窜访台湾，并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公然称呼台湾为“国家”，其举动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严重政治挑衅，我国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但美西方政府和媒体无视是非曲直、不管前因后果，替美方错误行径站台，无理指责抹黑中国，把我国捍卫国家主权的防卫行动描述成所谓“武力改变台海局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中方试图将历史常态变成一场危机，是推动局势升级一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声称，佩洛西此访不违反美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电话吹风会上指责中方反应过度，试图改变现状，目的是“威胁和胁迫台湾”。日本国内一些人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时任英国外长特拉斯声称，英国及伙伴已通过七国集团外长声明等形式，对“中方在台海升级行动”予以最强烈谴责。8 月 5 日举行的东亚峰会外长会上，有个别国家对中方正当的维权举措进行无理指责。

（四）在涉港议题上实施污名，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美西方惯用“压制自由”“侵犯民主”“侵犯人权”等话语来设定涉港污名化框架，强化港英当局遗留的具有殖民色彩的话语体系，通过发布涉港报告实行常态化污名。美西方对涉港议题的操纵有明显的“事件导向”：策动香港发生暴乱事件，借机对我国进行高频、深度的污名化。在 2019 年“修例风波”前后，美西方极力围绕这一事件设置负面议题，大肆炒作，破坏“一国两制”实践。

其一，事件发生前，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通过发表各类不负责任言论向香港特区政府施压，发表煽动性言论制造恐慌和对立。2019 年上半年，围绕《逃犯条例》的修订，英国驻港总领事、英国下议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盟及其成员国驻港澳外交代表等公开表达所谓“关切”和“担忧”，污称修例会影香港自治、干扰香港法治^[25]。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有关报告，声称修例会香港的政治经济更易受中央政府影响。同时，媒体开展威吓式报道，妄称“香港

更易受到中央政府胁迫”，在社交平台炮制假新闻抹黑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社会渲染恐怖气氛，煽动香港社会的悲观情绪，破坏公众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信任。此外，还有相关非政府组织恶意为香港社会塑造“敌人”，煽动抗议行动。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极力教唆反中乱港分子从事极端暴力活动^[26]。

其二，事件发生中，美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集体切入双标滤镜，调高话语炒作的力度。美西方固守“民主双标”，对“泛政治化”和黑暴肆虐的假民主拍手叫好，而面对符合香港实际、落实“爱国者治港”的真民主却如坐针毡。一方面，他们美化包装暴力抗议活动，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一些国家驻香港的总领馆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次发表错误言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佩洛西等美西方国家的政客公然纵容和挑唆反中乱港分子采取违法暴力手段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对抗，将反中乱港分子美化为“民主斗士”。一些非政府组织扮演暴力活动“操盘手”角色，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包括舆论造势的“一条龙”服务^[8]。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官员频频用负面话语抹黑“一国两制”和中央对港政策，抹黑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处置，挑拨歪曲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关系。西方媒体针对香港警方执法行动发出大量不实报道，挑拨香港社会对立，妄图在香港社会树立“敌人”。

其三，事件发生后，美西方对我国采取的正本清源的积极措施进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负面解读。中央政府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特区政府依法履行主体责任，香港社会愈发繁荣稳定、团结奋进，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美西方无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选举制度。西方媒体公然污蔑香港国安法是所谓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还有人声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标志着‘一国两制’的终结”^[27]。西方媒体为达成污蔑目的，大量采用庞杂的民间信源（信息源自记者或普通百姓）^[28]。美西方国家的有关污名化举措持续至今。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美西方发表声明或谈话，妄称香港民主法治遭到破坏。布林肯诬称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地参加自我治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表声明，对香港立法会选举“侵犯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表示“遗憾”。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说三道四，污蔑这是对“香港政治多元化的攻击”，并再次搬出《中英联合声明》说事。2022 年 10 月，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审理黎智英涉嫌欺诈骗案，美国政客对此无端指责、恶意抹黑，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说项，诋毁特区法治。

（五）在国际关系议题上实施污名，丑化中国整体形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西方国家不断炮制和翻新“中国威胁论”“锐实力”“中国债务陷阱论”“中国挑战”“威权”“胁迫外交”“政治渗透论”“中国间谍威胁”等论调，妄图在国际社会将中国塑造为“逞凶斗恶的庞然怪物形象”。

其一，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美西方针对世界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炮制配套话语挑拨中国的对外关系。布林肯访问非洲期间，大肆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这实质是企图制造离间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干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话语陷阱”。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启动 10 周年之际，美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连续发布所谓“中共在中东欧的影响”系列报告。报告由美国国务院委托起草发布，将“合作”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充斥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诋毁和无端指责。2022 年 11 月 1 日，在越共中央总书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记阮富仲访华、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天, 美国媒体炒作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的“旧闻”, 将越南所在的东南亚和厄瓜多尔所在的南美作为挑动“非法捕捞”争端的重点区域。“非法捕捞”已经成为美国抹黑中国形象, “离间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借口”^[29]。

其二, 干扰华侨华人正常生活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美西方国家将污名话语延伸至华侨华人群体。澳大利亚不断渲染“华人威胁论”^[30], 塑造“政治渗透论”, 谎称中国利用金钱、政治利益渗透他国政治选举、政治决策, 污蔑华侨华人企业家与中国政府有接触并干涉所在国政治, 污蔑澳大利亚华人政治精英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在 2022 年澳大利亚大选前, 双方候选人争相展示对华强硬, 莫里森甚至妄称中国“操纵澳大利亚选举”。所谓“中国问题”成为澳大利亚大选新的叙事模式。美国污名化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 挥舞制裁大棒, 对我国统战部官员实施所谓制裁。此外, 随着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的实施, 美国炒作所谓“技术小偷”话语, 针对华人科学家开启系列污名和诬陷, 这使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圈形成寒蝉效应。德国有的媒体污蔑中国留学生是“科学间谍”, 窃取德国科研成果, 对德国科学家与中国接触说三道四。

其三, 在国际社会营造中国很“危险”的氛围。美西方国家用“中国威胁论”“锐实力”“中国挑战”“威权”等话语, 妄图在国际社会勾勒出一个“可怕”“格格不入”的“他者”形象。从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 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进入更高强度和更广范围^[31]。美西方将中国当成假想敌。拜登在外交政策演讲中把中国视作“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 and 英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诬称, 中国对多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最大、长期威胁。日本 2022 年度《防卫白皮书》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正常军力发展和正当海洋活动, 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美西方是国际话语霸权的既得利益者, 占据国际话语优势地位, 不断通过操纵国际舆论达到意识形态霸权目的。但在西方话语框架中, “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为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而通过“拉拢”“操纵”和“分散注意力”等手段发起的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32]。

三、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特征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行径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业已形成一套主动为之的操作模式。在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构建中, 美西方不断强化主体力量, 拉帮结伙, 实行集团化污名; 框架生产过程愈发驾轻就熟, 逐渐走向流水线作业; 在同一时期内, 框架由原本的单一议题逐渐走向复合化; 污名化的载体由原先的文化产品升级为互联网平台, 手段越发多样; 污名化的内容、动机更为复杂和立体。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不仅对中国安全发展形成干扰, 也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一) 污名主体集团化: 从美国“全政府”到联盟“全出击”

美西方不断强化主体力量, 拉帮结伙, 实行集团化污名。其一, 美国官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设置不断走向“全政府”方式。2020 年 5 月,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提出以“全政府”方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拜登政府上台后, 延续了遏华的“全政府”方式。美国对华污名化框架也呈现明显的“全政府”特征。在官方和社会层面, 美国展开了一系列污名化举措。首先是官方, 从白宫、国会到五角大楼, 美国官员不约而同地在公开场合或社交平台负面化解读中国。其中, 美国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总统政治的社会化表演特征^[33], 他们非常善

于使用新旧媒介技术。特朗普把推特作为其传播工具和表演舞台，实现对中国污名化；拜登则更多在历史和情感讲述中给中国贴上负面标签。美国通过白宫、五角大楼作为核心角色开展战略传播，以核心角色来统筹调度美国的全球战略传播^[3]。其次是社会，美国“以‘中国威胁’‘中国挑战’‘中国竞争’等为核心，塑造全社会对华认知，凝聚对华战略共识，开展‘全政府’对华思想动员”，形成“全社会”污名方式^[34]。美西方政府、媒体的污名化框架对西方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西方民众产生对华偏见。对华偏见经过群体发酵，程度可能进一步加深。

其二，美国不断拉帮结派，调动全球盟友力量织密对华污名化网络。拜登政府用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标准重新划分阵营、把中国置于美国的对立面，是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次，更是拜登政府确立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延续“特朗普主义”的结果^[35]。美国打着人权和民主幌子，在涉疆、涉港、涉台、涉藏和政党制度、民族宗教等领域，施压盟友形成对华敌意，同步展开对华污名。每逢我国取得振奋人心的成绩或面临的困难有所突破时，美国及其盟友集团如“五眼联盟”“七国集团”便先后发表各类指责、谴责、持负面态度的报告声明，内容如出一辙。美国近两年尤其注重加强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关系，不断维护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关系，形成所谓印太框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意图构成对中国舆论压制的合围之势。拜登政府虽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但“相关政策话语指向更加坚决地塑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从直面中国转为绕过中国”^[17]。拜登政府在《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要与盟友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搞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化，大力构建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目的实则对抗中国，将世界撕裂为非此即彼的两大阵营。

（二）污名机制流水化：从信源到受众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运作机制呈现流水线作业的特征：智库编码/政要发声—媒体传播—受众解码再传播。美国政要、智库、非政府组织、资本、媒介、社会，在污名框架的上下游各自充当角色，环环相扣，最终完成污名化过程。

其一，在污名信息生产阶段，通过智库编码、政要发声持续生产涉华负面信息，形成充足的对华污名语料库。根据《全球智库报告 2020》的数据，目前美国以 2 203 家智库的数量稳居全球智库数量之首^[36]。智库出具的报告往往会对公共政策制定者、媒体、民众产生影响。美国主要权威智库近年出现对华态度集体“右转”趋势，这使得美国智库对华污名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原先处于右翼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以及卡托研究所等态度依旧强硬；原先持中立立场的兰德公司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历来关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都有“右转”势头。右派智库习惯性地开展对华负面评价，且其评价并非就事论事，更多突显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差异^[37]。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一批专事反华的所谓学者。例如德国的郑国恩，依靠东拼西凑、捏造数据、曲解个案，制造涉疆反华报告。美国政要对华发声出现愈发强势负面的特点。美国政要在诸多美国国内议题上分歧较大，但对华态度趋于一致和强硬。过去，智库的声音总体更极端、负面，但现在出现政要声音逐渐和智库声音合流的趋向。

其二，在污名信息传播阶段，西方传统主流媒体、新兴社交平台展开分裂式传播。美西方的传统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均呈现明显的分裂特征：时而缄默，时而喧哗。对涉华信息自动开启负面滤镜，从议程、选题、画面、声音全方位编织涉华负面符号。对于能找到任一负面切入点的信息，无

论是否符合逻辑, 均大书特书。美西方国家的反华智库、政要发表涉华负面言论, 媒介经过新闻化处理后, 将涉华负面信息通过大数据、社交机器人等手段实现快速广泛传播。西方对华污名化的媒介传播分两个梯队: 第一梯队媒介获取智库、政客的一手信息, 经过剪辑加工形成原创文章/视频发表并协调转载; 第二梯队媒介往往是美国亲密盟国的媒体, 对第一梯队的原创文章/视频展开迅速转载或进行再加工。再加工包括对报道形式的转换 (例如由文本转换为短视频、H5 等, 由英文翻译为各类其他语言), 以及对报道内容的剪切与链接。至此, 西方媒介通过显著位置 (头条)、大量报道的堆叠、文本语言的倾向性、正面信息负面解读、对事实的选择性捏造与篡改^[38], 构建了对华污名报道框架。这种“抱团式”传播使对华污名框架居于西方话语叙事的强势地位^[36], 让西方社会产生“以假乱真”的错觉。

极具讽刺的是, 对我国澄清的信息, 西方传统主流媒体视而不见、集体不报; 国际社交平台利用话语垄断优势, 采取限流、贴标等方式, 让我国被动失语。2021 年 1 月, 面对一大批西方媒体捏造报道涉疆虚假信息, 中国驻美大使馆官方推特引述中国学者报告指出: 新疆妇女变得更有自信和独立自主。该推文随后被推特删除。推特声称删除理由是推文内容“非人性化”。而早在 2019 年 8 月 19 日, 推特就以“官方散布假新闻”为由, 关停了近千个揭露香港“修例风波”中暴徒行径的中国账号; 9 月 20 日, 推特再以“违反推特价值观和平台操作政策”为由关闭上万个账户, 其中中国账户就多达 4 301 个。西方媒介以此方式为西方社会打造了一个拟态现实, 让西方社会以为自己通过媒体的所见所闻即真相。与污名信息的广泛传播相比, 西方媒介对于实在难以作负面解读的信息则不约而同保持沉默。例如, 2022 年 8 月重庆山火发生后, 消防官兵和重庆人民用血肉和汗水铸成了“防火长城”, 最终消灭山火。对此, 西方主流媒体不予报道。西方媒体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严重的“双标”, 暴露出西方主流媒体与政府、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 与其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大相径庭。

其三, 在污名信息接收阶段, 受众解码、转发、评论引发再次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链条进一步延伸, 原先处于信息传播链条下游的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 也能成为信息再扩散的有力传播者。受众接收污名信息后, 从自身视角进行解读。西方媒介的涉华污名报道在情感方面具有极强的煽动性, 容易触动普通受众就该议题转发评论甚至再创作。社交平台中还隐匿着有行煽动之举目的的账号, 经这类账号带节奏、泼脏水, 不明真相的西方社会民众容易产生误解和对华负面情绪。中国一直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渗透颠覆活动的重点目标之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开展反华项目, 企图煽动“港独”“藏独”等。2020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官网公开数据显示, 一年中向与中国有关的 69 个项目提供 1 000 多万美元, 妄图推动各类危害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活动“落地”。为达成渗透他国目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并指导反对势力, 在社交平台捏造传播假新闻, 煽动民众反政府情绪, 推动民众参加社会运动, 以造成社会混乱。西方其他国家也存在流水线污名化中国的趋势。比如, 日本收买智库、聘请政客进行反华宣传。“近年来, 随着日本对华博弈全面加速, 其在国际社会的对华舆论战同样迅速升温。”^[20]

(三) 污名议题系统化: 从单一到复合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议题呈现从单一转向复合、系统的趋势。在过去很长时间内, 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相关议题的污名化有明显侧重, 主要体现在某一时间段集中围追堵截某一重点议题。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美国政府最为关注我国西藏事务，直接插手大行干涉主义，大力扶持西藏分裂势力，并在国际社会大肆炒作所谓“共产党对西藏地位构成威胁”等谬论^[39]。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国最为关注我国香港事务。2013 年后，香港因素在中美关系中逐渐凸显，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层级提升，反复以民主自由为幌子接触香港反对派或分裂势力，西方非政府组织加大对香港反对派和部分香港青年的资助力度^[40]。直到 2019 年，涉港议题都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污名化我国的重灾区。2019 年涉疆议题开始取代涉港议题成为最受美西方关注的领域，议题聚焦、攻击集中。2019 年，美西方以“种族灭绝”谬论开启了对我国新疆的污名化。2020 年 3 月，美西方加大砝码，炒作“强迫劳动”谬论。直到 2022 年，涉疆议题仍然是美西方反复炒作并捏造谎言的最重要领域。

近期，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的议题开始横向联动，关注点升级为所谓我国带来“系统性挑战”，试图在舆论上发起对我国的全面遏制打压。美西方对涉疆、涉台、涉港议题的污名化全线并行。在近期拜登、布林肯、佩洛西等美国政要的演讲、报告中，同时提及台、港、疆已是常态。议题联动的直接表现是涉统一战线领域的多个话题同时爆发。2022 年，美西方就同时热炒涉台、涉疆、涉港话题：一方面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上炒作中国所谓“反应过度”；另一方面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所谓涉疆人权评估报告反复渲染涉疆谬论，同时妄评香港社会人权民主状况、无理指责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美西方更加注重以人权、民主为名，全面污名化我国的各项政策，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污名化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此外，美西方原来强调我国对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等某个具体国家国内造成所谓“威胁”，现在开始加大力度炒作我国对国际秩序产生所谓“威胁”。

（四）污名手段隐蔽化：从“文化植入”到“计算宣传”

为达到污名信息传播从包围我国转移到渗透我国的目的，美西方的污名手段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已经形成一套围绕自身利益构建的“话语”和“叙事”。西方社会在政府、媒体经年累月的思想灌输下，逐步形成对中国的认知偏见。美国一直试图将这套针对中国的“话语”和“叙事”渗入我国国内，搅乱人心。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信息渗透的手段日益多元。过去，畅销全球的美国文化产品是其向全球推介美式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二战以来，美国长期占据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和叙事主导权，依靠话语强势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思想渗透。文化产品是美国宣介美式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具有“悄无声息”“润物无声”等隐蔽而又深刻的意识形态渗透效果。特别是在影视艺术娱乐方面，美国电影、电视、动漫、游乐场、音乐中往往蕴含美式价值观的渗透意图。美国复仇者联盟、钢铁侠等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面植入了美国梦、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优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借助王牌文化产品，美国宣介美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同时，以脸谱化、粗糙的形象和“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对比，贬低其假定的所谓“意识形态异类”和竞争对手。

美国不断强化自身的话语和叙事能力，不断升级污名化中国的手段，特别是潜入国际社交平台以更隐蔽的方式煽动普通民众对华情绪。美国尤其注重对推特、优兔等传播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控制权，注重传播生态的建设与维护，打压 Tik Tok、微信等来自中国的传播平台；通过元宇宙技术手段，在数字游戏等领域植入意识形态内容，宣介美式民主政治^[3]。美西方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社交机器人开展污名叙事。作为社交网络中自主运行、自动生产发布内容的算法智能体，社交机器人从

过去的传播中介跃升为传播主体, 重塑了传播生态^[41]。社交机器人参与传播, 具有主题同质化、发文趋势雷同、发文内容倾向性高等特点。在推特和脸书等西方主流社交平台上, 涉华议题是社交机器人操纵信息的重灾区。“以社交媒体涉华新冠病毒议题为例, 国际舆论中 16.5% 由社交机器人操纵, 社交机器人更倾向于在行为上通过潜伏和模仿, 利用多元路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 涉华议题操纵活动明显。”^[42] 2022 年 8 月 24 日,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下属研究机构互联网观察实验室和信息研究公司 Graphika 共同撰写的报告显示, 在脸书、instagram、推特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账户协调一致发布虚假信息, 内容主要是亲西方叙事、诋毁中国^[43]。

（五）污名动机立体化：从心理到现实

美西方污名化框架设置的动机, 既有出于政治经济、转移西方国家国内矛盾、大国博弈等现实考量, 也有出于西方世界集体“右转”、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集体焦虑等心理因素。心理动机建立在现实动机基础上, 通过内心焦虑折射形成; 心理因素形成后, 会影响其现实决策, 进而加剧现实动机。

从经济视角来看, 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美国应对其国内经济困境、打压他国优势产业。为应对国内经济困境, 拉动国内就业、促进产业回流、刺激科技研发, 美国采取意识形态攻击策略。美国近年对新疆的污名攻击, 背后就有突出的经济目的。美国以“强迫劳动”谎言为由出台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将我国新疆生产的全部产品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目的便是无底线地打压我国新疆棉花、光伏、番茄等优势产业。英国学者 James Cockayne 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 40% 的多晶硅供应来自中国新疆, 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制造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西方的所谓“强迫劳动”指控, 目的正是打压中国产品, 遏制中国发展。美国罔顾事实, 恶意攻击中国 5G 技术安全和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 胁迫干预他国 5G 建设, 背后也有经济考虑。2020 年, 美国及盟友打压作为全球 5G 技术引领者的华为, 对其施加芯片禁令, 以所谓安全为由禁用华为设备。2021 年, 华为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务实现收入同比下降 28.6%^[44]。随着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中的份额从 0 上升到 15%, 而美国的该数据从 1990 年的 37% 下降到 2020 年的 12%^[45], 美国又在芯片行业遏制中国, 组织“芯片四方联盟”围堵中国, 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政治视角来看, 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服务美西方总体对华战略, 护持全球霸权; 转移国内矛盾, 维护政府形象。首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 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变化, 大国博弈加剧, 美国将中国当作“全面竞争对手”。“投资、协同、竞争”的美国总体对华政策框架影响着美国对华决策的方方面面, 也提高了美国对华污名化框架的战略级别和动员能力。拜登政府在《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 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所谓“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 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美国为了维护利益、护持霸权, 遏制新兴国家软硬实力的全面提升, 对新兴国家展开全方位打压。污名化框架构建是其中重要一环, 是长期占据叙事主导权的超级大国护持霸权的重要手段。其次, 美国国内面临两党政治极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身份政治加剧等现状。美国国内陷入无穷追求“政治正确”的内耗, 社会严重分化。为了“提升总统执政形象、对冲国内政治因素干扰”, 美国功利性地采取继续打压中国、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美国最大外敌”的策略, 转移国内视线^[46]。此外, 美国炮制“强迫劳动”“种族灭绝”谬论, 实为混淆视听, 试图掩盖自身存在的强迫劳动等严重人权问题。美国宪

法第 13 条修正案的“惩罚条款”为美国强迫劳动的“现代奴隶制”提供了法律依据^[47]。在该法律影响下,大量被关押在美国监狱的非洲裔和少数族裔为美国各州和私营企业提供无偿或低报酬劳动。

从文化视角来看,污名化框架的动机是美国秉持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国家集体“右转”的思维惯性。中美之间存在文化起源、文明传统、制度差异,这本是自然存在的。但美国本着零和博弈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心态促使美国对他国的和平发展产生焦虑情绪,进而歪曲认知^[4],进行污名话语框架设置。在心理机制和政治动机的双重作用下,超级大国因忌惮自身地位不保,或担心崛起国的高地位带来其他不利影响,倾向于拒绝给予足够的地位承认,转而用更加于己有利的标准评价崛起国,将中国治理模式视为相对于西方治理模式的“他者”,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48]。美国鼓吹“文明冲突论”,吹捧并输出西式民主制度;将中国包装为意识形态异端,无底线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其面对类似事件时的双标态度中昭然若揭。2019 年,佩洛西曾把“修例风波”中香港街头的暴力行径称为“美丽的风景线”,美国政客、媒体将暴力示威者美化成“民主英雄”,把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称为所谓“对争取普世权利勇士的打压”。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山发生暴乱,美国官员、媒体一致转换态度,谴责这是“暴力事件”,冲击国会山的人是“暴徒”“极端分子”“恶棍”。同时,当前世界出现西方国家集体“右转”趋势。美国极右势力回潮,中右翼政党联盟在意大利选举中获胜,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 2022 年议会选举后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法国、德国、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极右翼政党近年都呈现快速崛起势头^[49]。“诉诸情绪而非具体政策是目前极右翼在一些国家发展并上台执政的主要策略。”^[49]这使得煽动情绪的污名化框架更容易设立并被社会接受。

(六) 污名影响扩散化:从中国到世界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构建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干扰我国发展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影响世界和平与团结。

其一,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首先,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最直接塑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污名化框架利用西方社会民众的历史经历和心理特点,利用带有历史指向性的符号来炒作涉中国统一战线话题,构建容易引发西方民众联想和情感共鸣的话题。诸如编造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谬论,美西方反华势力便是利用人的朴素情感,企图达到煽动西方民众敌视中国的政治目的。其次,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社会占据绝对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国际传播能力普遍较弱,对国外信息的采集一定程度上依赖西方媒体。污名化框架借由西方媒体传播开来,干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舆论。例如在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报道总体对我国持肯定态度,但部分涉疆报道转载自西方媒体,出现负面倾向,干扰了当地人对我国治疆政策的评价^[50]。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构建压制了国际社会的知华友华力量,歪曲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直接挑动了西方国家部分反华言行的发生。

其二,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美西方的污名化框架影响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美西方国家意图将污名信息从国外渗透至我国国内,连同国内分裂势力制造并传播分裂话语,妄图搅乱人心、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涉台议题上,美西方妄图阻碍我国统一事业推进,其“捧一踩一”式的割裂话语让台湾民众对国际局势和大陆产生深刻误解。在涉港议题上,美西方制造香港和内地

的割裂话语, 企图让香港同胞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误解。当下,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催生社会共同体联结不够紧密的风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体呈量子化趋势、群体联结呈离散化趋势^[51]。叙事层累形成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构建虚拟的“环世界”, 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催化下, “环世界”相互碰撞、重叠、破碎, 传统话语体系面临“无所指涉的窘境”^[52]。在此背景下, 话语叙事体系对社会舆论乃至民众价值判断、观念养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美西方的污名化框架、有针对性的话语叙事更容易对个体、群体产生负面影响, 不利于我国的大团结大联合。

其三, 影响世界和平与团结。美西方把人权和民主工具化, 用话语和叙事渗透他国, 策动“颜色革命”, 破坏他国社会稳定, 破坏公众对政权的信任, 煽动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 进而动员抗议暴乱活动^[53-54], 妄图使其他国家发展受阻、动荡不断, 严重影响世界和平。美国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划分阵营, 人为在世界制造非此即彼的两大阵营, 严重影响世界团结。美西方本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挑动矛盾、背后拱火、坐山观虎斗, 存在制造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严重危及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四、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路径

美西方实施对华污名攻击, 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甚至将面临“惊涛骇浪”的具体表现。如何扭转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形势、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 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安全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 我们必须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统一战线应更加有效有力发挥重要法宝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 话语和叙事体系承担言说和论证、驳斥任务, 是直接有力击溃美西方污名化攻击的方式。鉴于美西方的话语攻击集中在统一战线领域, 打破西方污名化舆论攻击, 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 必须站在战略谋划高度, 在加强话语内容、叙事能力、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多向发力。

(一) 加强话语内容建设

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承担重要的言说和论证任务, 应当把话语和叙事看作一个整体加以构建。话语是内容, 是本质, 相对静态; 叙事是方式, 是手段, 相对动态。话语的不断更新成为叙事传播的资源 and 内生动力; 叙事的动态堆叠、层累, 形成并活化话语。

其一, 把握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背后的思想内核。“道”是话语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把握我国统一战线的精神内核, 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发掘。要把统一战线放到更宏观的视野中加以审视, 放到“两个大局”的背景下, 放到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放到我国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长河中。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论述方法, 不断丰富统战话语的理论内涵。要不断完善对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方案的话语的理论阐释。

其二, 在学科建设角度, 鼓励学科交叉研究。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传播学、政治学、

心理学等多学科介入。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要使用中国话语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不断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知。要不断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形成一批相关课题,鼓励学界、传媒界展开深入研究,实现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传播话语的融通,助力在叙事实践中生成受众乐于接受的话语符号。

（二）加强叙事能力建设

话语需要在使用、流动中焕发活力。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严重污名,需要用中国话语把统一战线的内涵以多种形式解读出来、传播出去,并刺激话语的再生成,以话语和叙事合力应对美西方污名化攻势。

其一,在叙事主体角度,建设同心圆式全民叙事体系。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更多人员、群体、机构参与对内对外话语和叙事实践。在同心圆式全民话语和叙事体系中,最内圈是官方媒体、外宣机构,“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55]。要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三个方面加强官方媒体和外宣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中间圈是擅长讲故事的人民群众。在国际传播中,非官方、个人用户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从国际自媒体涉华舆论传播者影响力来看个人用户影响力高于组织用户影响力”^[56]。个人用户的叙事视角灵活、叙事内容有趣、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色彩,且非官方的用户身份使其叙事内容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统战和外宣部门要加强同国际社交平台中个人用户的识别和联系。在个人用户中,尤其要注重发挥华侨华人居住住国的话语优势。叙事同心圆再向外扩展,应当不断扩大朋友圈,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继续邀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国外友好人士、国外媒体走进中国,借助国际机构、人士、媒体的力量,发出客观公正的声音,对美西方的污名叙事形成有力回击。

其二,在话语实践角度,要充分使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提升叙事传播力的最佳方式是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57]使用精彩有趣、国内外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载体,既要有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也要有微观个体的经历故事。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一方面做好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主动宣传,另一方面做好对无端质疑和不实攻击的有力批驳。通过如此叙事实践,使中国统一战线话语得到活化和流动,从而实现自身的更新迭代、与时俱进。媒体机构要据实开展结合现实背景的外宣内宣方式学习,学会灵活使用亦庄亦谐、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贴近受众,不断提升叙事效果。

（三）加强话语和叙事体系的生态环境建设

要在法治、人才、技术等领域加强建设,优化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生态。

其一,要不断建立健全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法律制度。建立对中国话语和叙事数据的保护与传播机制,加强对污名话语和叙事的法律规制,明晰污名话语和叙事的民事、刑事责任划分。特别要注意加强对熟悉英美法系法律人才培养,建成一支优秀的涉外法律服务团队,便于华侨华

人以及中国的企业、组织、机构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其二, 要不断吸引培养精通内容、创新平台、熟悉国外情势的人才队伍。在媒体宣传口, 既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话语的人才队伍, 还要增强从业者灵活运用短视频、直播、vlog、影视文学作品及其衍生的二次创作、文化创意产品等话语载体的能力。在互联网科技口, 培育既有创新能力又有话语叙事知识的人才队伍, 不断创新话语叙事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在国际传播口, 加强外宣和统战领域对人才的吸引力; 加强青年人对国际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的熟悉度; 加强政治学、新闻传播学、对外汉语等学科学子对传播规律的掌握程度, 对跨文化传播、跨媒介叙事的能力, 对不同国家、地区、群体的语言表达习惯的认知度^[58]。

其三, 要打造引领时代发展的互联网生态系统。加强高校、企业、政府的合作, 以先进技术为支撑, 突破美西方垄断的国际传播平台铁幕。首先, 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模式的创新, 吸引更多来自国际社会的平台用户。例如 Tik Tok 的大数据算法和短视频模式创新, 使其在国际上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 我国官方和个人用户创作的优质短视频有机会被国际社会浏览并传播。在元宇宙背景下, 注意元宇宙技术创新、元宇宙内容创作、元宇宙产品培育和元宇宙行业应用^[59], 形成新的叙事优势。其次, 加强科技力量对我国网络安全的有力维护。2022 年 6 月, 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 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 360 公司全程开展调查和技术分析, 判明相关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要加强网络安全力量建设, 增强感知、发现、处理、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 保障我国话语和叙事优势。

五、结语

在全球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之际, 超级大国为护持霸权、强化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 对新兴大国采取全方位遏制打压手段, 污名化框架是其混淆视听、塑造“敌人”形象的重要方式。随着我国的发展崛起, 美西方的对华污名化框架仍将持续, 并且有不断加剧的态势。未来, 我们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的同时, 继续关注美西方对华污名的新动向、新特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统一战线站在应对美西方污名化中国的前沿阵地,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统一战线要坚持反分裂、反干涉, 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更好护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郭可, 杨文睿. 新战略期国际涉华舆情新特征和舆论引导新态势 [J]. 对外传播, 2016 (12): 4-6.
- [3] 史安斌, 童桐. “乌卡时代”战略传播的转型与升维 [J]. 对外传播, 2022 (6): 14-17.
- [4] 曾向红, 李琳琳.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J].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3): 78-111.

- [5] 史澎湃, 谢培. 冷战初期美苏宣传战: 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及其当代启示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 211-222.
- [6] 姜禹维, 戴继诚. 美国涉疆议题框架建构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26-135.
- [7]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 性质、解构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06-118.
- [8] 仇朝兵. 中美关系新常态下的台湾问题: 走向与评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1): 53-76.
- [9] 郭永虎, 王卓亚.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01-112.
- [10] 黄忠, 张芯瑜. 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 特征、原因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137-148.
- [11] 罗振建, 林华山. 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1): 32-40.
- [12] 卢勇, 陈思. 统一战线话语权构建的现实困境与理论求索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6): 46-51.
- [13] 赵宸斐, 李璐. 百年回望下中国共产党的叙事逻辑及体系建构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1 (3): 22-30.
- [14] 李亿, 胡立法. 构境叙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本书写 [J]. 东南学术, 2019 (4): 1-12+246.
- [15] 章晓英.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一个叙事学视角 [J]. 国际传播, 2019 (1): 1-7.
- [16] 童兵, 任桐.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学习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论述 [J]. 新闻爱好者, 2021 (8): 14-17.
- [17] 肖河. 优势认知下的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和结构分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8): 4-30+154-155.
- [18] 郭永虎, 王禹. 美国国会涉华人权立法活动的历史演进、特征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30-143.
- [19] 美国“人权报告”对澳门人权的臆断与歪曲 [EB/OL]. (2022-05-06) [2022-10-0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953515.
- [20] 刘华. 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对华舆论战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7 (1): 122-123.
- [21] 林华山, 龚静阳. 大安全与大统战: 国家治理中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74-92.
- [22] 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 [EB/OL]. (2022-05-07) [2022-10-02]. 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
- [23] 环球网. 西方针对中国庞大的“谣言工厂”里 有一个典型 [EB/OL]. (2021-03-02) [2022-10-02]. <https://news.sina.cn/2021-03-02/detail-ikftpnz0495722.d.html>.
- [24] 李兵. 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 (2): 117-121.
- [25]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 [EB/OL]. (2021-09-24) [2022-10-02].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9/73232685a4394868a74f086ecded9b10.shtml>.
- [26] 被中国点名制裁! 美国祸港 NGO 大起底 [EB/OL]. (2019-12-04) [2022-10-02].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9/1204/c1002-31489037.html>.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29-146.

- [27] 马丁·雅克: 某些西方国家对香港国安法说三道四, 是无比虚伪的 [EB/OL]. (2020-07-28) [2022-10-02]. http://m.ce.cn/gj/gd/202007/28/t20200728_35410069.shtml.
- [28] 彭卓. 框架理论视角下的中美报刊关于香港国安法报道的对比分析——以《人民日报》和《华盛顿时报》为例 [J].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3): 41-45.
- [29] “非法捕捞”, 美国想追着泼中国脏水 [EB/OL]. (2022-11-03) [2022-11-03].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2-11/03/content_78499312.shtml.
- [30] 陈奕平, 关亦佳. 澳大利亚“华人威胁论”解构: 基于媒体舆论的政治学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82-90.
- [31] 张永红. 美国新一轮所谓“中国威胁论”: 特点、根源与应对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3): 84-91.
- [32] 马丽. 境外新闻媒体关于中国“锐实力”的报道分析 [J]. 国际论坛, 2019 (6): 84-95+158.
- [33] 蒋晓丽, 郭旭东. 社会化表演的网络文本世界——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20 (1): 99-118.
- [34] 刁大明, 马嘉帅.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 概念、逻辑与现实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1 (2): 21-41+121.
- [35] 环球时报. 朱锋: 美对华意识形态战, 恶意达到新高度 [EB/OL]. (2022-08-30) [2022-10-03]. <http://m.aisixiang.com/data/136242.html>.
- [36] 黄日涵, 张丹玮. 美国智库的舆论生产与国际传播对中国的启示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4): 93-99.
- [37] 李鼎鑫, 黄蕙. 走向右倾——近年来美国主要智库政治倾向与对华立场简析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2 (4): 108-112+135.
- [38] 罗昕, 赵小飞. 西方涉疆虚假新闻的议题框架与舆论操纵——以BBC报道为例 [J]. 新闻战线, 2021 (11): 116-118.
- [39] 李晔. 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 [J]. 西藏研究, 2003 (2): 1-7.
- [40] 李环. 近年美国对香港政策变化及评估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2): 24-31+64-65.
- [41] 高山冰, 汪婧. 智能传播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兴起、挑战与反思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11): 8-11+18.
- [42] 韩娜, 孙颖. 国家安全视域下社交机器人涉华议题操纵行为探析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8): 40-49.
- [43] 国际观察: 美国炮制虚假信息添新证 [EB/OL]. (2022-09-30) [2022-09-30].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930/c1002-32538232.html>.
- [44] 环球时报. 干货! 2022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龙头企业分析——华为: “2+4+1”战略 [EB/OL]. (2022-11-01) [2022-11-03].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1101A0442Z00?refer=wx_hot&ft=0.
- [45] 环球时报. 深度解读! 拜登签署“芯片法案”, 对中国影响几何? [EB/OL]. (2022-08-11) [2022-11-03]. <http://www.shaoxing.com.cn/p/2956669.html>.

- [46] 环球时报. 朱锋: 美西方“中心主义”不会主动退场 [EB/OL]. (2022-06-28) [2022-11-03]. <https://hqt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48bGpYqjuHY>.
- [47] 张业亮. 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漏洞”为“强迫劳役”提供法律依据 [J]. 世界知识, 2022 (21): 66-67.
- [48] 温尧. 权力与偏见: 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 [J]. 当代亚太, 2022 (2): 4-33+142-143.
- [49] 观察者网. 极右势力崛起, 欧洲何去何从? [EB/OL]. (2022-09-29) [2022-11-03].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9_29_660016.shtml.
- [50] 吐尔孙·艾拜. 基于框架理论的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以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报道为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5): 136-146.
- [51] 谢静. 新媒体时代的量子化生存与离散式联结——论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3): 17-23.
- [52] 柳亦博. 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 [J]. 探索与争鸣, 2019 (5): 124-133+175-176.
- [53] H. II. 帕特鲁舍夫, 晓华. 西方发动“颜色革命”的目标和手段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 (7): 89.
- [54] A. 卢卡申科, 晓华. 美国等国家对白俄罗斯发动“颜色革命”的七个阶段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0 (9): 91.
- [55] 光明日报编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EB/OL]. (2022-09-08) [2022-11-03]. <https://m.gmw.cn/baijia/2022-09/08/36010669.html>.
- [56] 相德宝. 国际自媒体涉华舆论传者特征及影响力研究——以 Twitter 为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1): 58-69+127.
- [57] 习近平: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EB/OL]. (2021-06-02) [2022-11-03]. http://qsttheory.cn/zhuanqu/2021-06/02/c_1127522386.htm.
- [58] 庞亮, 李雅君. 创新完善学科建设 加快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后备人才 [J]. 对外传播, 2021 (10): 12-15.
- [59] 武汉出台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方案 [EB/OL]. (2022-11-05) [2022-11-05]. https://www.cnr.cn/hubei/yw/20221105/t20221105_526051695.shtml.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

徐瑞珂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加剧了英国内部分裂的风险。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表现为以新芬党为代表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寻求让北爱尔兰脱离英国, 加入爱尔兰共和国, 从而实现爱尔兰统一。在后女王时代, 英国脱欧余波、新芬党崛起以及天主教徒人口优势使得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在短暂沉寂后再度高涨, 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可能性增加。但是,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近期内难以成功, 面临四重约束性因素: 发起爱尔兰统一公投的条件依然不具备; 北爱尔兰政治分裂依然严重; 北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人口优势依然薄弱; 爱尔兰公众对爱尔兰统一依然持犹疑态度。英国中央政府在处理北爱尔兰事务上的政策失误, 值得每一个面临分裂风险的国家高度重视并认真反思。

关键词: 分离主义; 反分裂; 英国; 北爱尔兰; 新芬党; 爱尔兰统一; 贝尔法斯特协议

中图分类号: D7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2) 06-0147-16

英国在后女王时代的开端并不顺利, 伴随着俄乌冲突、经济动荡以及日益严重的国家分裂风险,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治下的联合王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团结依然是很大未知数。当前,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高涨, 对英国的凝聚力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在过去, 女王是英国统一的象征, 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备受爱戴和尊崇, 对维护英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女王故去和新王登基,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将何去何从, 近期爱尔兰统一具有多大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国内学界对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述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

DOI: 10.13946/j.cnki.jcqi.2022.06.13

作者简介: 徐瑞珂,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英‘联合制华’倾向及对策研究”(22ZGC010)

引用格式: 徐瑞珂.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 147-162.

影响。梁跃天从“欧盟维度”分析了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负面影响,认为英国脱欧加剧了北爱尔兰族群矛盾^[1]。赵志朋对英国脱欧后北爱尔兰宗派主义与分离主义的耦合趋势进行了追踪研究,认为英国脱欧强化了北爱尔兰地区族群差异和宗派差异,使得北爱尔兰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宗派化^[2]。王展鹏、张茜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关系维度分析了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英国脱欧致使北爱尔兰内部政治和族群分歧加剧,身份政治回归^[3]。本文聚焦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新态势及其对爱尔兰统一前景的影响。论文第一部分阐述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缘起,第二部分梳理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演变,第三部分探索自查尔斯三世继任王位以来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新动态,第四部分探析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面临的限制性因素,最后总结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对国家反分裂的镜鉴。

一、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缘起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其实就是 1922 年爱尔兰独立之前困扰英国历届政府的爱尔兰问题。爱尔兰问题的核心是贯穿于英国对爱尔兰殖民统治全过程的天主教徒(多为爱尔兰人)与新教徒(多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后裔)之间的宗派矛盾,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滋生则是英国在殖民爱尔兰期间对天主教徒进行系统性打压的直接结果^[4]。如今的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正是承继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这也使得如今北爱尔兰族群双方的政治认同与其宗教信仰相契合,宗教界限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族群冲突的界限,大多数天主教徒是渴望与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而大多数新教徒则是希望继续留在英国治下的联合主义者^[5]。

自从 1801 年爱尔兰并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以来,爱尔兰始终是联合王国中“不安分”的一员,寻求爱尔兰独立的力量一直存在。这当然与 1801 年之前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和高压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爱尔兰人并非真心臣服于英国统治,而是在英国的淫威之下被迫服从。爱尔兰一直是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亨利八世于 1534 年开启的宗教改革使得英国成为一个以新教徒为主的国家,但此后英国宗教改革并未在爱尔兰推行。这为此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以及后来的北爱尔兰地区的宗教和族群冲突埋下了祸根。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爱尔兰人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英国人的仇恨业已形成,并从此深深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意识之中^[6]。在 17 世纪,大量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迁徙至爱尔兰东北部的阿尔斯特省,并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成为剥削阶级,侵占大量土地,从而挤压了当地天主教徒的生存空间^[7]。在 18 世纪初,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打压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严苛法律,禁止天主教徒进入议会或担任公职,甚至剥夺了天主教徒的选举权和购买土地的权利。社会不公以及天主教徒的边缘化状态,激化了秉持民族主义的天主教徒和秉持联合主义的新教徒的族群矛盾,致使爱尔兰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8]。为寻求独立和争取公正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天主教徒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不断壮大,最终汇聚成一股洪流,令爱尔兰独立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1916 年的复活节起义被视为爱尔兰独立道路上一个重要事件,随后爱尔兰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1921 年 12 月 6 日,英国与爱尔兰签署《英爱条约》,结束了长达两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该条约允许爱尔兰成为自治领,在大英帝国内享有与加拿大自治领同等的地位,并且赋予北爱尔兰议会选择

退出爱尔兰自治领的权利。《英爱条约》在爱尔兰引起巨大争议, 最终爱尔兰议会在 1922 年 1 月 7 日以 64:57 的投票批准了该条约, 为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9]。1922 年 12 月 6 日, 爱尔兰自由邦正式成立, 次日北爱尔兰议会选择退出爱尔兰自由邦, 爱尔兰南北分治由此初步形成。此后, 留在北爱尔兰六郡的天主教徒继续扛起民族主义大旗, 从未放弃爱尔兰统一的夙愿。长期困扰北爱尔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居住在北爱尔兰“同一屋檐”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怀揣相互竞争和排斥的国家愿景。怀揣民族主义的大部分天主教徒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而非英国人, 认为爱尔兰岛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 爱尔兰统一是大势所趋。在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看来, 民族分离主义其实是民族统一主义, 专指所有爱尔兰裔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在 1952 年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君主之前, 北爱尔兰是新教徒联合主义者的天下, 政府和议会都牢牢掌握在新教徒联合主义者手中, 而天主教徒遭遇制度性歧视, 俨然是北爱尔兰的“二等公民”。阿尔斯特统一党当时是北爱尔兰最大的联合主义政党, 强烈反对天主教派民族主义者。在 1920 年《爱尔兰法案》确定的北爱尔兰权力架构下, 阿尔斯特统一党在北爱尔兰一党独大, 享有垄断性权力, 其政策严重偏袒新教徒, 无视天主教徒的基本权益和合法诉求。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倾向于联合主义的新教徒占北爱尔兰总人口的 66%, 控制着北爱尔兰政府和议会, 控制着 84.65% 的地方权力机构^[10]。正是由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人口比例大约为 2:1, 英国政府才在 1921 年决定把爱尔兰岛北方六郡划归为北爱尔兰, 以确保新划分出来的北爱尔兰不会从英国分离^[11]。这使得只占北爱尔兰总人口 1/3 左右的天主教徒处于非常不利的政治地位。1922 年, 阿尔斯特统一党主导的北爱尔兰议会通过了《特殊权力法案》。该法案成为此后阿尔斯特统一党政府滥用权力打压天主教派民族主义者的工具, 其系统性剥夺天主教徒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 压制他们的“共和主义”诉求(即“爱尔兰统一”主张)^[12]。为了防止天主教派民族主义者获得政治权力, 北爱尔兰议会先后在 1922 年和 1929 年通过法案, 分别在地方选举和地区大选中废除了比例代表制, 代之以“赢者通吃制”, 从而固化了天主教徒群体和新教徒群体之间的政治对立^[13]。

二、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演变

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 1952—2022 年期间,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52—1998 年,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呈现明显的暴力化倾向, 试图通过暴力活动快速实现爱尔兰统一。第二阶段是 1998—2022 年,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渐进式地实现爱尔兰统一。

(一) 1952—1998 年: 北爱尔兰暴力式民族分离主义

在伊丽莎白二世 1952 年 2 月登基之际, 北爱尔兰依然由执政党——阿尔斯特统一党牢牢掌控, 这是阿尔斯特统一党自 1921 年以来在北爱尔兰连续执政的第 31 年。在《爱尔兰法案》于 1972 年被英国议会废除之前, 新教联合主义在北爱尔兰处于“黄金时代”^[14]。但是对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而言, 1921—1972 年是其“悲惨时代”。在阿尔斯特统一党政府统治下, 天主教派民族主义者缺少合法的政治渠道表达和推进“共和主义”诉求, 加之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待遇, 被迫诉诸暴力, 从而酿成 1968—1998 年的三十年动乱。

在三十年动乱时期，北爱尔兰充斥着巷战、炸弹袭击、狙击手袭击以及未经审判的拘留，民族主义者准军事组织（尤其是爱尔兰共和军）、联合主义者准军事组织以及英国安全部队都参与其中，最终导致 3 600 余人被杀，30 000 余人受伤^[15]。在这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成为暴力式民族分离主义的代表，使得英国成为为数不多的遭受内部恐怖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16]。1976 年 7 月，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暗杀了英国驻爱尔兰大使克里斯托弗·伊沃特-比格斯。英国王室也是爱尔兰共和军暴力活动的受害者：1979 年 8 月，爱尔兰共和军在爱尔兰斯莱戈海岸谋杀了女王的叔叔路易斯·蒙巴顿勋爵^[17]。在动乱时期，为预防和镇压爱尔兰共和军等准军事组织跨边界开展暴力活动，英国加强了边界管控，关闭了上百条可跨越边境的小路，并沿边界设置了铁丝网、检查站和瞭望塔等安全设施。但这些安全设施和边境巡逻的军人、警察等又成为准军事组织发动袭击的目标，北爱尔兰边界因而由“经济边界”变为“军事边界”，硬边界应运而生^[18]。

（二）1998—2022 年：北爱尔兰和平式民族分离主义

1998 年 4 月，英国政府、爱尔兰政府与北爱尔兰的八个政党及团体共同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结束了三十年动乱，开启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这也标志着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从暴力模式转向和平模式^[19]。《贝尔法斯特协议》由两个协议组成：一是英爱协议，由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签署，94.4%的爱尔兰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该协议；二是多党协议，由北爱尔兰的八个政党及团体签署，71.1%的北爱尔兰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该协议。在北爱尔兰主要政党中，只有持极端联合主义立场的民主统一党弃权，拒绝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上签字^[20]。

根据《贝尔法斯特协议》的要求，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实行基于“同等尊重”原则的权力共享，议席最多的两个政党的党首可分别担任首席部长和首席副部长，拥有均等的权力^[21]。联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拥有均等的权力和机会，并对彼此的决策拥有否决权。这一政治设计有利于缓解北爱尔兰地区联合主义派政党和民族主义派政党之间的政治纷争。《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另一原则是“同意原则”，即爱尔兰统一公投发起需遵从北爱尔兰地区民意，由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发起，在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同时举行；只有过半数的北爱尔兰人和过半数的爱尔兰人在公投中分别同意，北爱尔兰才能实现与爱尔兰统一。共享政府权力的“同等尊重”原则体现了协商理念，而事关爱尔兰统一前景的“同意原则”实际上秉持了简单多数原则^[11]。

相比新教徒联合主义者，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从《贝尔法斯特协议》中收益更大。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在其自传《希望与历史：在爱尔兰创造和平》中表示：《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署是对北爱尔兰在英国的宪政地位的严重打击。在他看来，“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中加入‘由大多数北爱尔兰人投票决定北爱尔兰与英国关系’这一条款犹如在恋爱关系中的一方说‘我们关系已经结束了，但是需要等到孩子长大后再分开’”^[22]。这也是为何在 1998 年 5 月针对多党协议的公投中，分别有 96%的天主教徒和 52%的新教徒支持该协议。自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生效以来，以新芬党为代表的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和平参政的方式逐渐实现爱尔兰统一，和平式民族分离主义成为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主流立场^[23]。此外，人口结构变化呈现的有利趋势也是促使民族主义者放下暴力模式，转向和平式选举政治的重要因素。自 1998 年以来，北爱尔兰人口结构开始朝着有利于民族主义者的方向演变：2001 年，天主教徒人口比例为 43.8%；2011，天主教徒人口比例为 45%^[24]。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正是运用未来天主教徒的“人口优势”这一论据，才成功说服

爱尔兰共和军放弃军事斗争, 转向选举政治^[25]。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 1998 年以来, 联合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阵营中的温和派势力被逐渐削弱, 持更强硬立场的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在 2007 年分别取代阿尔斯特统一党和社会民主工党, 成为左右北爱尔兰政治局势的联合主义大党和民族主义大党^[26]。这意味着新芬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的走向。

《贝尔法斯特协议》在北爱尔兰的实施并未有效弥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大群体的分歧。政府权力共享机制事实上反而固化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大群体的分歧, 使得族群间和解与融合变得更加困难^[27]。在《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后的第 20 年 (2018 年), 北爱尔兰社会依然处于高度分离状态, 宛如两个“平行社会”: 60 多面和平墙将大多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隔绝在不同社区^[28], 大多数天主教徒学生和新教徒学生分别在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29]。

英国脱欧进一步激化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分歧, 主要是因为前者大多数 (85%) 反对脱欧, 而后者大多数 (60%) 支持脱欧。并且, 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天主教徒投票支持留欧的占 88%, 而自认为是联合主义者的新教徒投票支持脱欧的占 66%^[30]。这为新芬党推进爱尔兰统一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英国脱欧公投后, 新芬党便开始公开要求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2016 年 6 月 24 日, 即英国脱欧公投次日, 时任北爱尔兰副首席大臣马丁·麦吉尼斯公开呼吁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在过去 6 年来, 新芬党历任主要领导人不断呼吁开启爱尔兰统一公投。在此期间, 新芬党的优势也不断扩大: 2020 年 2 月爱尔兰大选中, 新芬党一跃成为爱尔兰议会第二大党, 打破了自 1922 年爱尔兰独立以来爱尔兰共和党和爱尔兰统一党对爱尔兰选举的垄断局面^[31]; 2022 年 5 月 5 日北爱尔兰地方选举中, 新芬党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 取代民主统一党, 成为北爱尔兰议会最大政党^[32]。5 月 7 日, 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再次呼吁在未来五年内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她认为: “爱尔兰统一公投会在未来 5 年内举行。……现在就要开始为爱尔兰统一公投做准备。对于那些把头埋在沙子里或甚至允许无序统一进程前景存在的人, 不会有任何奖励。我们看到英国脱欧混乱无序, 缺乏计划, 缺乏相互理解。我们不会在爱尔兰岛重蹈覆辙。”^[33] 麦克唐纳呼吁爱尔兰总理召开公民大会, 以商讨爱尔兰统一公投事宜。

但是, 麦克唐纳对爱尔兰统一公投的呼吁遭到了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的揶揄。5 月 9 日, 马丁公开表示: “新芬党在北爱尔兰地方选举中的竞选活动主要聚焦生活成本、健康和住房, 而爱尔兰统一公投事宜几乎从它的文件和宣言中被埋没。一旦选票清点完毕, 新芬党则又开始把爱尔兰统一公投事宜放在舞台中央。”^[34]

三、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走势

2022 年 9 月 8 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 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新一任君主, 标志着英国迎来后女王时代。之所以称查尔斯三世治下的英国进入了后女王时代, 一方面是因为此前伊丽莎白二世在位长达 70 年, 女王虽逝, 但其政治遗产对未来英国政治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是因为查尔斯三世的“统治”主要是维护和延续女王的政治遗产, 并非改弦更张。女王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政治遗产将对北爱尔兰未来影响深远。

（一）女王对英爱和解和北爱尔兰和平的积极贡献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生前确实以实际行动和言语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扮演了建设性角色。她一共访问北爱尔兰 22 次，访问爱尔兰 1 次，其中 16 次访问是在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之后，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影响最大的是其 2011 年 5 月出访爱尔兰。女王是自 1922 年爱尔兰独立以来首位访问爱尔兰的英国君主。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晚宴上发表演讲时，女王提到暴力“触及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显然指的是蒙巴顿被刺杀事件。此外，让爱尔兰人意外且感动的是，为了表达对英爱和解的善意，女王还在都柏林纪念花园向为爱尔兰独立而牺牲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敬献了花圈^[35]。当时新芬党不顾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的恳求，拒绝参加为女王举办的宴会。尽管如此，一年后，即在 2012 年访问北爱尔兰期间，女王与时任北爱尔兰第一副部长马丁·麦吉尼斯握手，这是不可想象的和解时刻，具有历史性意义。麦吉尼斯是新芬党高级成员，曾是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之一。和平爱尔兰组织领导人彼得·谢里丹认为，女王与麦吉尼斯的握手“巩固了北爱尔兰和平进程”^[36]。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认为，女王 2011 年的国事访问和他 2014 年对英国的访问不应被孤立看待，而应被视为改善英爱关系过程的一部分^[37]。麦卡利斯在女王去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女王对爱尔兰的四天访问是“神奇之旅”，担负着“宽恕的使命”^[38]。

（二）女王去世后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短暂沉寂

在 2022 年 9 月 8 日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为了表达团结，新芬党暂缓了对爱尔兰统一公投的呼吁，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在女王葬礼期间短暂沉寂。新芬党对女王在促进北爱尔兰和平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回看两个多世纪以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王室的强烈敌意，新芬党领导人此次对女王去世的反应令人瞩目，体现了新芬党对英国王室态度的巨大变化^[39]。在女王去世的当天，新芬党主席麦克唐纳公开表示“女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事实证明，女王是那些相信和平与和解的人的有力倡导者和盟友。我向她为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出的贡献致敬”^[40]。在 9 月 12 日北爱尔兰议会举行的悼念活动上，新芬党副主席米歇尔·奥尼尔表示：“在和平进程的这些年里，伊丽莎白女王为促进我们岛上不同传统之间的和平与和解，以及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和平与和解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对女王和英国政府怀揣不同的政治忠诚。我们希望在大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行使自决权，实现统一和所有人共享的岛屿。”^[41]

9 月 13 日，查尔斯三世访问北爱尔兰。在与北爱尔兰各政党领导人会晤时，他承诺将以他母亲伊丽莎白二世为榜样，致力于维护北爱尔兰和平^[42]。新芬党副主席米歇尔·奥尼尔在会见国王查尔斯三世时表示：“（女王）以身作则，促进了和平与和解，并与我们这些爱尔兰人建立了关系。”^[43]隶属于新芬党的北爱议会议长亚历克斯·马斯基在此期间发表讲话，表示“女王展示了积极且富有领导力的个人行为是如何有助于打破障碍和鼓励和解的。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一次拜访、一次握手、过马路或说几句爱尔兰语——都能在改变态度和建立关系方面产生巨大影响”^[44]。在女王去世后，《爱尔兰时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女王对英爱和解的贡献：“她在纪念花园纪念碑前向那些反抗过她祖先的人鞠躬，并且在都柏林城堡的国宴上以爱尔兰语作为演讲开场白，可能本身都是小事。但是，它们却承载着深远的象征意义，似乎将几个世纪以来的傲慢和怨恨从英爱关系中解脱出来。她用庄重和严肃的态度处理了这一切，这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臣民们对她的感情不仅是忠诚，而且是爱戴。”^[45]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伊丽莎白二世, 查尔斯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渊源更深。和他的母亲一样, 1979 年爱尔兰共和军杀害蒙巴顿勋爵也使查尔斯深受伤害。蒙巴顿勋爵生前与查尔斯王子关系密切, 是查尔斯最信任的人生导师。为了促进英爱关系和解, 查尔斯也效仿他母亲, 多次访问北爱尔兰和爱尔兰, 并与包括新芬党在内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各政党领导人会晤^[38]。查尔斯此前曾访问北爱尔兰 40 次, 并在 1995 年首次正式访问爱尔兰, 成为访问爱尔兰的首个英国王室成员。此后, 他又对爱尔兰进行了 7 次正式访问^[46]。2015 年 5 月, 查尔斯访问了其叔祖父蒙巴顿勋爵被害之地——茅拉赫莫, 成为改善英国王室与爱尔兰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被视为英国王室向爱尔兰共和军“伸出宽恕之手”^[47]。在这次访问中, 他第一次会见了时任新芬党主席的格里·亚当斯。这也是新芬党领导人第一次在爱尔兰会见英国王室成员。查尔斯此前承诺在去世前访问爱尔兰岛的每一个郡, 目前他已访问了爱尔兰岛 32 个郡中的一半以上^[48]。

(三)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再度高涨

2022 年 9 月 22 日, 英国政府公布了 2021 年北爱尔兰人口普查结果, 其中有几项数据让支持爱尔兰统一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欢欣鼓舞。第一, 就人口结构而言, 天主教徒人数占 45.7%, 新教徒人数占 43.48%, 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人数首次赶超新教徒人数, 天主教徒群体用了 100 年时间终于在人数上超越了新教徒群体。第二, 就身份认同而言, 相比 2011 年人口普查, 认为自己只是爱尔兰人的北爱尔兰人口比例 (29%) 上升了 4%, 而认为自己只是英国人的北爱尔兰人口比例 (32%) 下降了 8%。第三, 就年龄结构而言, 相比新教徒群体, 天主教徒群体的平均年龄更小, 天主教徒的人口优势将继续保持下去^[49]。这次北爱尔兰人口普查结果使得新芬党要求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的热情再次高涨。

9 月 23 日, 新芬党主席麦克唐纳公开呼吁就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制定紧急计划, 并承诺新芬党将为爱尔兰统一公投事宜举行公民大会提供资金支持。她认为: “政府不能继续视而不见, 变革正在发生。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团结和进步的未来越来越近, 一个新的爱尔兰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对于那些一直对我们说现在不是时候, 不要急于求成的人, 我想对他们说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是谈论的时候, 现在是分享想法的时候, 现在是计划的时候。”^[50]

在英国, 不少人对爱尔兰统一前景所呈现的越来越高的可能性表示担忧。英国前保守党主席诺曼·泰比特在 9 月 26 日公开表示: “看起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北爱尔兰将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会对苏格兰或威尔士的民族主义产生影响吗? 国王查理三世最终只会成为英格兰国王吗?”^[51] 英国前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肖恩·伍德沃德在 9 月 26 日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的条件将被满足。但是, 近一两年不可能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52]

10 月 1 日, 倡导爱尔兰统一的公益组织“爱尔兰未来”在都柏林筹办了一场讨论爱尔兰统一前景的会议, 为爱尔兰统一公投造势。5 000 余人参会, 大部分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参会者的主要共识是未来爱尔兰统一公投应该有序进行, 避免英国脱欧造成的混乱局面。新芬党主席麦克唐纳在大会发言中呼吁爱尔兰政府为爱尔兰统一公投做准备: “现在是政府建立商讨爱尔兰统一的公民大会, 为修宪和统一公投做紧急计划的时候了。紧急计划修宪和统一公投。我们的变革必须有序、民主、和平且有计划地进行。”^[53] 同样, 持联合主义立场的北爱尔兰演员詹姆斯·内斯比特在会上表示: “爱尔兰统一公投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举行公投, 那就在充分的辩论之后举行, 而不是等到人数占优势的时候。”^[54] 10 月 12 日, 新芬党在贝尔法斯特举办了“人民大会”, 商讨如何实现

爱尔兰统一，与会者超过 300 人，来自各行各业。大部分参会人员认为，爱尔兰政府应该建立“公民大会”。新芬党副主席奥尼尔再次呼吁爱尔兰政府成立“公民大会”，以便对爱尔兰统一前景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论^[55]。

四、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面临的制约性因素

根据《贝尔法斯特协议》，爱尔兰统一需要跨过以下三重门槛：第一，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发起爱尔兰统一公投；第二，过半数的北爱尔兰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爱尔兰统一；第三，过半数的爱尔兰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爱尔兰统一。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任一门槛都难以被跨越，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难以成功。

（一）发起爱尔兰统一公投的条件依然不具备

《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是规定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如果认为投票的大多数北爱尔兰人表示希望北爱尔兰不再是英国的一部分，而成为统一的爱尔兰的一部分时，则应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并没有明确说明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依据何种标准认为大部分北爱尔兰人是否支持爱尔兰统一。英国政府一直拒绝明确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的具体标准。这使得北爱尔兰事务大臣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反对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那么可能会在制定公投标准时“做手脚”，以条件未达到为由拒绝发起爱尔兰统一公投。

虽然英国政府没有公布具体的公投标准，但是英爱两国广为接受的看法是只有连贯的民意调查表明大部分北爱尔兰人可能支持爱尔兰统一时，才能举行统一公投。北爱尔兰民意调查机构 Lucidtalk 在 2022 年 7 月汇总并分析了 5 家民意调查机构在 2021 年 1 月—2022 年 7 月关于爱尔兰统一前景的民调数据，结果是平均 48% 的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而只有平均 37% 的北爱尔兰人选择加入爱尔兰^[56]。Lucidtalk 于 2022 年 8 月组织的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在当前举行统一公投，48% 的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41% 的北爱尔兰人选择加入爱尔兰；如果在未来 15~20 年举行统一公投，那么 44% 的北爱尔兰人将选择留在英国，51% 的北爱尔兰人选择加入爱尔兰^[57]。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并没有连贯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北爱尔兰人倾向于爱尔兰统一。

2022 年 7 月 3 日，爱尔兰副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声称：“《贝尔法斯特协议》规定的测验（民调显示大部分北爱尔兰人支持爱尔兰统一）并没有被通过。并没有连续的民调显示大部分人支持爱尔兰统一……在当前这个阶段举行爱尔兰统一公投，将会导致分裂，并遭遇失败，对任何人而言都将不是一个好结果。”^[58]在 10 月 1 日“爱尔兰未来”大会上，瓦拉德卡再次警告不要急于进行爱尔兰统一公投。他认为：“当前一个明显的危险是我们可能过分关注爱尔兰统一公投。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加强接触，建立信任，并为大多数人支持爱尔兰统一创造条件。”^[59]

克里斯·希顿-哈里斯在 2022 年 9 月 6 日被任命为新一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迄今为止，他还没有任何关于爱尔兰统一公投的公开表态。英国工党影子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彼得·凯尔在 9 月 25 日表示：“如果满足了《贝尔法斯特协议》所规定的条件，我将不会玩弄政治游戏，我会选择发起爱尔兰统一公投，不会成为爱尔兰统一公投的障碍。当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当我们接近《贝尔法斯特协议》所规定的那些条件时，我会采取行动。”^[60]凯尔的这一表态招致了北爱尔兰联合主义

者的广泛批评。持联合主义立场的北爱尔兰报纸《新闻信报》在9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中指出:“《贝尔法斯特协议》给了现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保持这种自由裁量权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凯尔选择在这个时候帮助那些想要分裂英国的人。”^[61]

(二) 北爱尔兰政治分裂依然严重

《北爱尔兰议定书》旨在防止英国脱欧后爱尔兰岛出现硬边界。但是,该议定书遭到了北爱尔兰新教徒联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担心在爱尔兰海引入新的贸易壁垒将导致北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地区渐行渐远,从而危及北爱尔兰在英国的宪政地位。为了抗议《北爱尔兰议定书》,时任北爱尔兰联合政府首席部长保罗·吉万在2022年2月辞职,第一副部长新芬党副主席奥尼尔也因此下台,联合政府再次停摆^[62]。在2022年5月北爱尔兰地方选举后,选举失利的民主统一党继续以“对《北爱尔兰议定书》做出重大修改”作为参与新一届联合政府的前提条件,拒绝与胜选的新芬党立即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63]。

9月23日,爱尔兰外长西蒙·考文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工作重点不是准备爱尔兰统一公投,而是必须首先处理好《北爱尔兰议定书》问题,并确保基于《贝尔法斯特协议》建立的北爱尔兰政府和议会重新开始运作。他认为:“北爱尔兰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任问题,存在于北爱尔兰不同政党之间,存在于北爱尔兰政党与英爱两国政府之间。必须首先修复这些关系……当然,我们必须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计划,我们必须尊重不同的观点,考虑到这种变化可能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我们不能重建信任关系,就很难以一种完全包容的方式(对爱尔兰统一公投)进行计划。”^[64]

(三) 北爱尔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人口优势依然薄弱

根据2021年北爱尔兰人口普查数据,天主教徒人数首次超过新教徒人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尔兰统一指日可待。可能还需要20年左右,天主教徒人口比例才能超过北爱尔兰总人口的50%。即便如此,也不代表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中间派的“双非”群体(非联合主义者、非民族主义者)正成为北爱尔兰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近几年北爱尔兰地方选举中,民族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的得票率都稳定在40%左右^[65]。这意味着民族主义者需要得到“双非”群体的支持,才可能通过公投实现爱尔兰统一^[66]。随着中间派“双非”群体的稳步崛起,界定北爱尔兰政治的宗派政治可能会逐渐瓦解。

“双非”群体在北爱尔兰不断壮大是过去20余年来北爱尔兰人口变化趋势的一个显著特点。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与阿尔斯特大学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开展“北爱尔兰生活与时代调查”。1998年,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双非”群体;就年龄而言,北爱尔兰65岁及以上的老人最有可能持鲜明的联合主义立场或民族主义立场,而45岁以下的人则更有可能属于“双非”群体;在18~24岁年轻人当中,59%的人属于“双非”群体^[67]。2021年,3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双非”群体,认为自己属于联合主义群体和民族主义群体的人分别占32%和26%;就年龄而言,“双非”比重最大的是25~34岁群体(51%),比重最低的是65岁+群体(29%)^[68]。

如果新芬党希望说服日益壮大的中间派支持爱尔兰统一,那么就需要制定更多的详细计划,向“双非”群体阐明何为统一的爱尔兰及其能给“双非”群体带来哪些具体利益,说服“双非”群体接受新芬党在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涉及身份认同的国歌和国旗等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和政策^[69]。这对新芬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

（四）爱尔兰公众对爱尔兰统一依然持犹疑态度

大部分爱尔兰人在原则上支持北爱尔兰加入爱尔兰，但只有少数爱尔兰人愿意为实现爱尔兰统一而承受更多的经济代价。目前英国政府每年向北爱尔兰提供大概 130 亿欧元的经费支持。经济学家预计爱尔兰统一所产生的经济成本大概是每年 67 亿~157 亿欧元^[70]。

在 1991 年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提高税负，要求每个德国纳税人支付团结税，以承担因东西德统一和重建东德而产生的经济成本。直到 2021 年，即德国统一后的 30 年后，90% 的德国纳税人才不需要再支付团结税^[71]。类似于德国统一，未来爱尔兰统一也很可能将增加爱尔兰纳税人的负担。爱尔兰整体上比北爱尔兰经济水平更高一些：2017 年，爱尔兰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爱尔兰高 14%；2018 年，爱尔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北爱尔兰高 51%，爱尔兰人均国民总收入比北爱尔兰高 34%^[72]。近年来，爱尔兰经济增长在欧盟国家中表现亮眼，有可能使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73]。

2021 年 5 月 Irish Independent/Kantar 民调显示，如果爱尔兰统一导致税收负担更重，54% 的爱尔兰人将投票反对爱尔兰统一；如果需要爱尔兰承担因统一而产生的所有费用，仅 1/8 的爱尔兰人支持统一^[74]。2021 年 11 月 Business Post/Red C 所做的民调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果需要支付更高的税收以弥补英国政府每年给予北爱尔兰数十亿欧元财政补贴的损失，那么只有 41% 的爱尔兰人支持爱尔兰统一；如果需要放弃爱尔兰国歌，那么只有 35% 的爱尔兰人支持爱尔兰统一；如果需要改变爱尔兰国旗，那么只有 27% 的爱尔兰人支持爱尔兰统一^[75]。尽管将来英国或者欧盟可能愿意为爱尔兰纳税人分担因爱尔兰统一而产生的部分经济成本，但潜在的税收负担将使部分爱尔兰人不再全力支持爱尔兰统一，从而给爱尔兰统一前景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五、结语

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根源于历史上英国对爱尔兰无情的殖民统治。数百年来受英国政府支持的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实行系统性打压，导致爱尔兰民族主义潜滋暗长，使得民族主义洪流最终冲垮了英国殖民统治。此后，爱尔兰岛南方 26 郡组建了独立的共和国，而北方 6 郡因为新教徒占大多数而最终选择留在英国。这导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无法彻底，寻求爱尔兰统一是 100 年以来盘踞在北爱尔兰的历代民族主义者一直追求的梦想。如今英国之所以面临日益严重的北爱尔兰分裂风险，主要是因为过去 100 年来英国中央政府在处理北爱尔兰事务上存在失误。这值得每一个面临分裂风险的国家高度重视并认真反思。

第一，在 1921—1972 年期间，英国中央政府纵容北爱尔兰联合主义者政府对天主教徒实行长达 50 年的制度性歧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不公平对待天主教徒，从而导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转向暴力模式，最终酿成三十年动乱。倘若英国中央政府在北爱尔兰力推民族融合与族群和解政策，在政策上优待天主教徒群体，保证他们享有同新教徒群体一样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那么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将有可能一直被边缘化，不会危及英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二，在 1998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之后，英国中央政府对北爱尔兰的“过度放权”导致所谓“权力共享”自治政府不断受困于联合主义政党与民族主义政党的党争，数度瘫痪，无法对北

爱尔兰事务进行有效治理。更严重的是,在“权力共享”机制下,北爱尔兰两大族群并未逐步实现和解与融合,反而渐行渐远,在北爱尔兰宛如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在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在不同的社区生活。一面面“和平墙”将天主教徒聚集区与新教徒聚集区相互隔离,它们不仅是两大族群的物理分界线,也是两大族群的身份和心理分界线。《贝尔法斯特协议》虽然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是和平依然十分脆弱。对英国缺乏“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始终没有放弃脱离英国的夙愿。倘若英国中央政府在《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后积极采取一系列旨在促进北爱尔兰两大族群和解与融合的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着力培育天主教徒群体对英国的“共同体意识”,那么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可能会逐渐失去群众基础。

第三,英国保守党政府被冒进主义倾向左右,举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并且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北爱尔兰边界问题,致使北爱尔兰和平危如累卵,民族分裂主义势如破竹。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英国脱欧公投的潜在破坏性影响没有充分预警,对脱欧谈判中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没有充分评估,反而热心于党内互殴和攻讦,最终陷入脱欧乱局。在英国脱欧公投后,保守党在脱欧路线问题上陷入内斗,并未在第一时间通盘考虑如何处理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也没有广泛征询北爱尔兰各行各业的意见,漠视北爱尔兰人的切身利益,最终使得北爱尔兰边界问题成为英欧谈判一度僵持不下的最大症结。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保持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的和谐稳定。我国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在国家建设与治理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反分裂、反干涉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也为世界各国反分裂贡献了中国方案。我国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参考文献:

- [1] 梁跃天. 欧盟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兼论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影响 [J]. 国别和区域研究, 2020 (2): 21-50+168.
- [2] 赵志朋. 脱欧后北爱尔兰地区宗派主义与分离主义的耦合趋势研究 [J]. 基督宗教研究, 2020 (2): 216-232.
- [3] 王展鹏, 张茜.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 [J]. 欧洲研究, 2021 (3): 115-137+7-8.
- [4] Richard English. Irish Freedom: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in Ireland [M]. Basingstoke and Oxford: Pane Macmillan, 2006.
- [5] Paul Badham. The Contribution of Religion to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1988 (1): 45.
- [6] 罗伯特·基. 爱尔兰史 [M]. 潘兴明,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28.
- [7] 葛公尚. 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05-106.

- [8] Frank Wright. Protestant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Ulster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2): 221.
- [9] Robert C. Cottrell. Northern Ireland and England: The Troubles [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50.
- [10] Patrick Buckland. A History of Northern Ireland [M]. Dublin: Gill & Macmillan, 1983: 60.
- [11] Laurence Cooley. Census politics in Northern Ireland from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to Brexit: Beyond the “sectarian headcount”?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3): 453.
- [12] Laura Donohue. Regulating Northern Ireland: The Special Powers Acts 1922—1972 [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98 (4): 1113.
- [13] Robert D. Osborne. The Northern Ireland parliamentary electoral system: The 1929 reapportionment [J]. Irish Geography, 2010 (1): 55.
- [14] Patrick Mitchell. Evangelic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Ulster 1921—1998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78.
- [15] Mark Ryan. War and Peace in Ireland: Britain and the IR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M]. London: Pluto Press, 1994: 122-124.
- [16] 李济时. 英国政党政治与苏格兰独立之争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4 (4): 92-104.
- [17] Mark Landler. Sinn Féin Leader Apologizes for 1979 Killing of Prince Philip’s Uncle [EB/OL]. (2021-04-18) [2022-1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18/world/europe/sinn-fein-louis-mountbatten-prince-philip.html>.
- [18] 曲兵, 王朔. 英国脱欧进程中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9 (7): 37-44+61.
- [19] Robert Perry. Revisionist Scholarship and Modern Irish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120.
- [20] Marc Mulholland. Northern Irelan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5.
- [21] Christine Bell. Brexit, Northern Ireland and British-Irish Relations [J]. European Futures, 2016 (96): 1-3.
- [22] Gerry Adams. Hope and History: Making Peace in Ireland [M]. Victoria: Hardie Grant Books, 2003: 403.
- [23] Matthew Whiting. Sinn Féin and the IRA: From Revolution to Modera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35-36.
- [24] Raymond Russell. Census 2011: Key Statistics at Northern Ireland and LGD level [EB/OL]. (2013-02-20) [2022-10-20]. <http://www.niassembly.gov.uk/globalassets/documents/raise/publications/2013/general/russell13013.pdf>.
- [25] Eric Kaufmann. Demographic change and conflict in Northern Ireland: Reconciling qualitative and

徐瑞珂.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47-162.

- quantitative evidence [J]. *Ethnopolitics*, 2011 (3-4): 373.
- [26] Emmanuel Dalle Mulle. The Nature of the Minority Ques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100 Years of Ethnic Conflict [EB/OL]. (2020-05-22) [2022-10-20]. <https://themythofhomogeneity.org/2020/05/22/the-nature-of-the-minority-question-in-northern-ireland-100-years-of-ethnic-conflict/>.
- [27] Andrew Finlay. Governing ethnic conflict: Consociation, identity and the price of peace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14.
- [28] Northern Ireland Foundation. Peace Walls [EB/OL]. (2019-04-25) [2022-10-20]. <https://northernireland.foundation/projects/sharedfuture/peace-walls/>.
- [29] Kevin McNicholl. The Northern Irish identity: attitudes towards moderate political parties and outgroup leaders [J]. *Irish Political Studies*, 2019 (1): 27.
- [30] John Garry. The EU referendum Vote in Northern Ireland: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 political views and behaviour [J/OL]. Knowledge Exchange Seminar Series, 2016 (17): 2. <https://www.qub.ac.uk/brexit/Brexitfilestore/Filetoupload.728121.en.pdf>.
- [31] Chris Page. Irish general election: Result marks seismic break for two-party system [EB/OL]. (2020-02-10)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51441409>.
- [32] NI election results 2022: Sinn Féin wins most seats in historic election [EB/OL]. (2022-05-08)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61355419>.
- [33] James Wilson. McDonald demands border poll after Sinn Féin win [EB/OL]. (2022-05-07) [2022-10-20]. <https://www.newstalk.com/news/mcdonald-demands-border-poll-after-sinn-fein-win-1339650>.
- [34] Marita Moloney. Taoiseach Micheal Martin "amused" over united Ireland speculation after Sinn Féin win in Northern Ireland [EB/OL]. (2022-05-09) [2022-10-20]. <https://www.irishmirror.ie/news/irish-news/taoiseach-micheal-martin-amused-over-26910158>.
- [35] Simon Schama. Elizabeth II: an appreciation by Simon Schama [EB/OL]. (2022-09-09) [2022-10-20]. <https://www.ft.com/content/7dcec97c-2b7b-41c2-80cc-38df81dab54f>.
- [36] Toby Mann. Queen Elizabeth visited Northern Ireland 22 times over a 70-year reign, dividing opinions [EB/OL]. (2022-09-13) [2022-1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9-14/how-often-did-the-queen-visit-northern-ireland-/101436462>.
- [37] Ronan McGreevy. King Charles III thanks Irish people for reaction to his mother's death [EB/OL]. (2022-09-20)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ireland/2022/09/20/king-charles-iii-thanks-irish-people-for-reaction-to-his-mothers-death/>.
- [38] Mark Devenport. The challenges for Charles: How united his kingdom will remain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EB/OL]. (2022-09-10)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world/uk/2022/09/10/the-challenges-for-charles-how-united-his-kingdom-will-remain-is-difficult-to-predict/>.
- [39] Darran Marshall. Queen Elizabeth II: Sinn Féin says tributes won't alienate republicans [EB/OL]. (2022-09-15)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62922662>.

- [40] Mary Lou McDonald. Mary Lou McDonald TD extends deepest sympathies on death of Queen Elizabeth II [EB/OL]. (2022-09-08) [2022-10-20]. https://www.sinnfein.ie/contents/64263?__cf_chl_tk=fH121KZhruEK7.PNMRIcE0qRLPW_EEbWy7xgsSX.1AU-1665739218-0-gaNycGzNCJE.
- [41] Brian Hutton. President and Taoiseach to attend Belfast service with King Charles on Tuesday [EB/OL]. (2022-09-12)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world/uk/2022/09/12/president-and-taoiseach-to-attend-belfast-service-with-king-charles-on-tuesday/>.
- [42] King Charles resolves to seek the welfare of all inhabitants of Northern Ireland [EB/OL]. (2022-09-13)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ireland/2022/09/13/crowds-gather-in-hillsborough-ahead-of-king-charless-visit-to-northern-ireland/>.
- [43] Brendan Hughes. Michelle O’Neill tells King Charles she hopes British-Irish relationship “strengthens and evolves” [EB/OL]. (2022-09-13) [2022-10-20]. <https://www.belfastlive.co.uk/news/northern-ireland/michelle-oneill-tells-king-charles-25008117>.
- [44] Cate McCurry, Jonathan McCambridge. King Charles questions DUP’s Jeffrey Donaldson over Northern Ireland Protocol [EB/OL]. (2022-09-13) [2022-10-20]. https://www.irishnews.com/news/northernirelandnews/2022/09/13/news/king_questions_dup_leader_over_controversial_northern_ireland_protocol-2827282/.
- [45] The Irish Times view on Queen Elizabeth II: the illusion of permanence [EB/OL]. (2022-09-09)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opinion/editorials/2022/09/09/the-irish-times-view-on-queen-elizabeth-ii-the-illusion-of-permanence/>.
- [46] Stephen Collins. Stephen Collins: Monarchy’s positive role in Anglo-Irish relations could have a political spillover [EB/OL]. (2022-09-16)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opinion/2022/09/16/stephen-collins-monarchys-positive-role-in-anglo-irish-relations-could-have-a-political-spillover/>.
- [47] 英王储“宽恕之旅”到访表亲遇刺地 [EB/OL]. (2015-05-20) [2022-10-20]. 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uk_life/2015/05/150520_life_charles_ira_visit.
- [48] Simon Carswell. King Charles has “profound”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Ireland [EB/OL]. (2022-09-09)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world/uk/2022/09/09/new-british-king-has-profound-personal-connection-with-ireland/>.
- [49] Mark Simpson and Darran Marshall. Census 2021: More from Catholic background in NI than Protestant [EB/OL]. (2022-09-22)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62980394>.
- [50] Michelle and Cate McCurry. Mary Lou McDonald: Time to plan for border poll on Irish unity [EB/OL]. (2022-09-23) [2022-10-20]. <https://www.irishexaminer.com/news/arid-40967933.html>.
- [51] Norman Tebbit. Is eventual Irish unification now inevitable? [EB/OL]. (2022-09-26) [2022-10-20].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2/09/26/eventual-irish-unification-now-inevitable/>.
- [52] Adam Kula. Ex-Northern Ireland Secretary suggests “there may be grounds” soon to call a referendum

徐瑞珂.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 147-162.

- on Irish re-unification [EB/OL]. (2022-09-26) [2022-10-20]. <https://www.newsletter.co.uk/news/politics/ex-northern-ireland-secretary-suggests-there-may-be-grounds-soon-to-call-a-referendum-on-irish-re-unification-3856135>.
- [53] Mary Lou McDonald. A New Ireland-A Nation Home for all' -Mary Lou McDonald's full address to Ireland's Future [EB/OL]. (2022-10) [2022-10-20]. <https://www.sinnfein.ie/contents/64394>.
- [54] David Young. Jimmy Nesbitt: Debate on NI's future should be led by people not politicians [EB/OL]. (2022-10-01) [2022-10-20]. <https://www.belfasttelegraph.co.uk/news/northern-ireland/jimmy-nesbitt-debate-on-nis-future-should-be-led-by-people-not-politicians-42032273.html>.
- [55] Michelle O'Neill. Belfast Peoples Assembly calls on Irish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Citizen's Assembly [EB/OL]. (2022-10-13) [2022-10-20]. <https://www.sinnfein.ie/contents/64474>.
- [56] Lucidtalk. Latest Update To The LT NI Border Referendum 'Poll-Of-Polls' (2021-2022) -Following The Latest Liverpool-Instofirishstudies Poll Report [EB/OL]. (2022-07-29) [2022-10-20]. <https://twitter.com/LucidTalk/status/1553037765989879808/photo/1>.
- [57] Stephen O'Brien. Majority in North back Irish unity within next 20 years [EB/OL]. (2022-08-21) [2022-10-20].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majority-in-north-back-irish-unity-within-next-20-years-fw0vqhsgw>.
- [58] Christopher Leebody. Leo Varadkar:Border poll now on Irish unity would be "divisive and defeated" [EB/OL]. (2022-07-03) [2022-10-20]. <https://www.belfasttelegraph.co.uk/news/northern-ireland/leo-varadkar-border-poll-now-on-irish-unity-would-be-divisive-and-defeated-41810053.html>.
- [59] Freya McClements. Border poll should aim for "largest majority possible" not 50% plus one, Varadkar says [EB/OL]. (2022-10-01)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politics/2022/10/01/border-poll-should-aim-for-largest-majority-possible-not-50-plus-one-varadkar-says/>.
- [60] Rory Carroll. Shadow minister's border poll remarks alarm Northern Ireland's unionists [EB/OL]. (2022-09-26) [2022-1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2/sep/26/shadow-minister-peter-kyle-border-poll-remarks-alarm-northern-ireland-unionists>.
- [61] Labour Party shadow secretary muddies water on border poll [EB/OL]. (2022-09-26) [2022-10-20]. <https://www.newsletter.co.uk/news/opinion/labour-party-shadow-secretary-muddies-water-on-border-poll-3855952>.
- [62] Damien Edgar, Eimear Flanagan. DUP: NI First Minister Paul Givan announces resignation [EB/OL]. (2022-02-03)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60241608>.
- [63] Chris Andrews, NI election 2022: DUP blocks new NI government in protocol protest [EB/OL]. (2022-05-09)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61373504>.
- [64] Harry McGee. Rebuilding relationships in NI more important than Border poll, Coveney says [EB/OL]. (2022-09-23) [2022-10-20]. <https://www.irishtimes.com/politics/2022/09/23/rebuilding-relationships-in-ni-more-important-than-border-poll-coveney-says/>.

- [65] Rory Carroll. “It’s closer now than it’s ever been”: could there soon be a united Ireland? [EB/OL]. (2022-10-06) [2022-1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oct/06/its-closer-now-than-its-ever-been-could-there-soon-be-a-united-ireland>.
- [66] Rory Carroll. How the “neithers” could decide Northern Ireland’s political fate [EB/OL]. (2019-08-15) [2022-1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aug/15/how-the-neithers-could-decide-northern-irelands-political-fate>.
- [67] NI survey suggests 50% neither unionist nor nationalist [EB/OL]. (2019-06-20) [2022-10-20]. <https://www.bbc.com/news/uk-northern-ireland-48702235>.
- [68] Katy Hayward, Milena Komarova and Ben Rosher. Political Attitudes in Northern Ireland after Brexit and under the Protocol [J/OL]. Northern Ireland Life and Times Survey, https://www.ark.ac.uk/ARK/sites/default/files/2022-05/update147_0.pdf.
- [69] Brendan Hughes. Analysis: Spectacle of Ireland’s Future event in Dublin is a statement of intent [EB/OL]. (2019-10-01) [2022-10-20]. <https://www.belfastlive.co.uk/news/news-opinion/analysis-spectacle-irelands-future-event-25152206>.
- [70] Shawn Pogatchnik. Poll shows Irish support unification but don’t want to pay for it [EB/OL]. (2021-05-01) [2022-1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l-ireland-unification-support-costs-brexite/>.
- [71] Tino Keller. Abolition of the solidarity surcharge: This is how much money you will save in 2021 [EB/OL]. (2022-05-31) [2022-10-20]. <https://www.accountable.de/en/blog/abolition-of-the-solidarity-surcharge-this-is-how-much-money-you-will-save-in-2021/>.
- [72] Adele Bergin, Seamus McGuinness. Who is Better off? Measuring Cross-border Differences in Living Standards,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J].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2): 149.
- [73] Jude Webber. Ireland’s reunification talk grows louder [EB/OL]. (2022-10-10) [2022-10-20]. <https://www.ft.com/content/c215d0d3-bce7-444c-8b92-94570a6e0338>.
- [74] Fionnán Sheahan. Majority favour a united Ireland, but just 22pc would pay for it [EB/OL]. (2021-05-01) [2022-10-20]. <https://www.independent.ie/irish-news/centenaries/centenarypoll/majority-favour-a-united-ireland-but-just-22pc-would-pay-for-it-40375875.html>.
- [75] Michael Brennan, Barry Whyte. Poll: Voters say no to new flag and anthem in a united Ireland [EB/OL]. (2021-11-28) [2022-10-20]. <https://www.businesspost.ie/politics/poll-voters-say-no-to-new-flag-and-anthem-in-a-united-ireland/>.

责任编辑：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 年总目次

（作者后面括号内，圆点前是期数，圆点后是在当期开始页码）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薛庆超 薛 静 刘伊纯（1•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三重逻辑.....孙 磊（1•16）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陈 杰（1•28）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权意涵.....程同顺 王雪珂（1•39）

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李应瑞（1•51）

统一战线的民主功能分析：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王 平 张佳敏 周旭霞（1•68）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团结与民主的辩证实践.....樊士博 徐 敏（1•78）

统一战线与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陈家刚 赵佳豪（2•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的重要论述研究.....刘学坤（2•14）

中国共产党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周 虎（2•28）

统一战线历史研究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历史演进中的人民政协.....杨东光（2•40）

因感召而汇聚：叶圣陶 1945—1949 年日记所见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

.....王莲英 袁 媛（2•57）

多党合作历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的开端探析.....张献生（4•73）

从联合到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政党协商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高晓霞 钱再见 涂 婷（4•83）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

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的互塑：基于“三维结构”比较视角陈 毅（3•1）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周明宽（3•14）

共青团青年统战工作：百年演进、现实张力与功能新塑.....叶子鹏 杨翱飞（3•27）

规律与路径：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汪文慧 何虎生	(3·36)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逻辑·····	丁时勇 崔永波	(3·48)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服务强国建设：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特征与机制·····	肖存良	(4·1)
多维团结：面向强国目标的统一战线历史方位与发展形态·····	林华山 龚静阳 刘泮菡	(4·12)
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理论逻辑、实践方式和现实启示·····	李俊 易思铭	(4·26)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对外话语建构：逻辑与路径·····	陈奕平 关亦佳	(5·1)
元宇宙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团结机制与实践图景·····	吕鹏 毕斯鹏	(5·10)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	李应瑞	(5·22)
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海外认知与中国应对·····	原晨珈 李凯林	(5·35)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共生、同构、互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与发展的统一战线机理·····	张艳娥	(4·38)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王怀强	(4·5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意涵探析：一种比较的视野·····	袁野	(4·63)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研究

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如何稳就业：机制、现状与策略·····	李磊 钱育成 马欢	(5·48)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演进与经验启示·····	陈晓仪	(5·62)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	徐理响 胡文婷	(6·1)
元宇宙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团结机理与实践图景·····	吕鹏 毕斯鹏	(6·1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	许忠明	(6·22)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	徐光木	(6·33)
融合发展：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	王浩宇 罗卓	(6·4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各民族社会资本建设视角·····	陈纪 曾泓凯	(6·57)
特约审计员制度的历史演变、现状分析与完善路径·····	贺鹏皓 宋煜	(6·67)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汪曙申	(1·86)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郭永虎 朱博	(1·95)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靳晓哲（1 • 106）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泰民安论	顾华详（3 • 59）
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关联研究	李 捷（3 • 75）
因应数字平台集团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治理挑战	陈 兵 杨臻林（3 • 91）
新经济背景下非公资本运作群体统战工作探析	李旭辉（3 • 108）
“爱国者治港”的理论证成与实践逻辑	郭天武 李 峥（3 • 117）
美国国会涉华人权立法活动的历史演进、特征及影响	郭永虎 王 禹（3 • 130）
平台经济共生发展面临的法治困境与对策	
——以共享经济服务平台治理为例	陈 兵 傅小鸥（4 • 121）
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及其影响	仇朝兵（4 • 135）
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意图、手段与特点	杜哲元（5 • 113）
美国涉疆议题框架建构与中国应对	姜禹维 戴继诚（5 • 126）
基于框架理论的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路径优化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相关报道为例	吐尔孙·艾拜（5 • 136）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历史形成与核心内涵	陈桂清（6 • 81）
民进党打“宗教牌”谋“独”的动向、原因及影响	韩 冰（6 • 94）
“遏制”语境下澳大利亚台海策略的形成与蜕变	于 镭 于飞洋（6 • 105）
平台经济治理研究	
全球视阈下数字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动态与中国方案	陈 兵 马贤茹（2 • 66）
新时代中国平台经济竞争法治的实践进路	赵 青（2 • 80）
平台经济税收监管中区块链技术赋能的法治理路	程 前（2 • 90）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专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政策论述与实践行动	张 建（2 • 109）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学生群体国家认同意识嬗变及现实镜鉴	杨亚红（2 • 119）
“一国两制”在香港：从探索型实践转向高质量实践	张 建（4 • 93）
强化政府治理能力：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重要路径	胡伟星 段聿舟（4 • 102）
系统视角下“爱国者治港”的理论逻辑、实践进展和完善路径	梁 雯 夏 泉（4 • 110）
“一国两制”的香港样本、法理要义与发展前景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 25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理论解读	田飞龙（5 • 79）
香港通识教育科的最新发展与未来展望	
——基于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视角	王 飞（5 • 91）
香港回归 25 年来英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影响	郭永虎 王卓亚（5 • 101）
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评价标准	刘林波（6 • 116）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灯塔”崩塌：美式民主的深层结构与运作逻辑·····王怀强（1·119）
- 制造断裂：美国自由民主制的三重迷思·····于 镭 于飞洋（1·129）
- 西方强化对华人权攻势：特征、原因与应对·····黄 忠 张芯瑜（1·137）
-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曾向红 田嘉乐（2·129）
- 国家建设视角下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评析：原因与镜鉴·····文龙杰（2·138）
- 现代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与政治整合
- 基于日本与印度的比较·····王浩宇 张亦潇（3·144）
- 政治国家有效性缺失：乌克兰国家建设的教训与镜鉴·····文龙杰（3·155）
- 历史与认同碎片化：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境与镜鉴·····刘显忠（5·147）
- 21 世纪以来的欧美极右势力：历史溯源、发展趋向与影响镜鉴·····俞 凤（5·158）
- 后女王时代北爱尔兰民族分离主义前景探析·····徐瑞珂（6·147）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涉华舆论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 ·····相德宝 杨月清（2·101）
-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梳理与应对·····龚静阳（6·129）

研究现状与动态

-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回顾、评析与展望·····王 衡 郭思瑶（2·150）
- 中华儿女大团结研究综述·····许 静 邵献平（3·172）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2年第6期 总第36期 第6卷

双月刊 2022年1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15.00 元